

18

1965.2

1967.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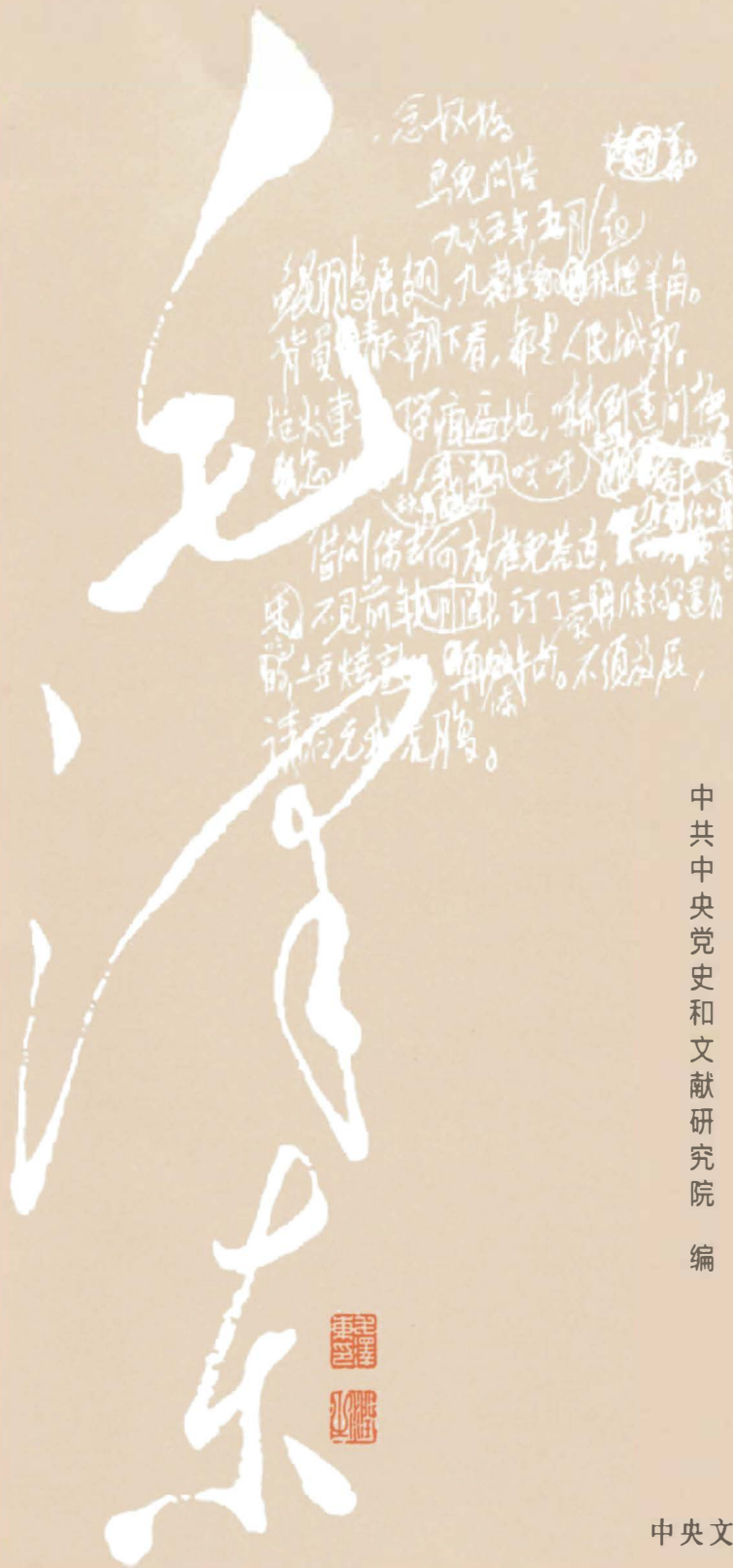
中央文献出版社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十八册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十八册

(一九六五年二月—一九六七年三月)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说明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是一部供研究用的多卷本综合文献集。选稿的范围：（一）手稿，包括文章、指示、批语、电报、讲话提纲、书信、批注、诗词、题词、修改的文件中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等；（二）经本人审定过的讲话、报告、谈话记录和新闻稿等；（三）非本人起草但经本人审定并用本人名义发出的其他文稿。未经本人审定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不编入这部文献集。

这部文献集于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八年，由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共十三册。这次公开出版，新增了一些文稿，并对原有文稿的注释作了修订，对部分文稿作了补注，订正了个别文稿的时间差错，全书共二十册。

这部文献集的编排：（一）以写作或发表的时间为序；（二）不能确定具体日期的，按照文稿的月份放在同月合适的位置或最后；（三）对在同一背景下论述同一主题的部分文稿，作了集纳，并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编入这部文献集的文稿，在本人生前公开发表的，按发表稿刊印；本人生前没有公开发表的，按手稿或其他原件刊印。每篇文稿末尾，均注明刊印根据。文稿中的错字、漏字，分别在〈〉号和〔〕号内校正，衍字加□号。文稿没有标点的，

由编者加了标点；对文稿原有的标点作了规范。文稿中的廿、卅，均规范为二十、三十。文稿中需要说明的史实，加注释补述。文稿原来没有标题或原有标题不适合本书体例的，由编者拟写或改写了标题。编者认为内容较重要的文稿，其标题在目录中用黑体字排印。

为便于读者阅读和研究，注释排在文稿的篇末，每条注释的详略根据理解正文的需要而定。正文中涉及的来文、来电、来信及其他文件，通常都作了注释，少数未能查到原件者付阙。

根据这部文献集的实际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几册中，每册附有韵目代日表和地支代月代时表。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

目 录

对余秋里关于编制长期计划工作初步议定步骤的报告 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日)	(1)
关于欢迎李宗仁回国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二月三日)	(3)
对关于北京修建地下铁道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二月四日)	(5)
祝贺哥穆尔卡六十寿辰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二月四日)	(7)
对赵尔陆《关于三线建设的动力问题》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三日)	(8)
对中央《关于正确地处理工业、交通企业中班组长 同工人群众关系问题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三日)	(10)
毛泽东等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 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三日)	(12)
对观察家评论《联合国往哪里去?》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日)	(15)
对出版《蒋介石言论集》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16)
对《赫鲁晓夫言论》第三集出版者说明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18)

对刘彬关于鞍钢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20)

在关于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建设问题报告上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三月四日） (22)

对总政举办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情况报告
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三月四日） (24)

在《后汉书》上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三月四日） (26)

在中联部一个请示报告上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日） (27)

关于《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一文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一日、十七日、十八日） (29)

毛泽东等悼念乔治乌-德治逝世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日） (34)

毛泽东等祝贺苏联“上升二号”宇宙飞船飞行成功
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36)

毛泽东等祝贺齐奥塞斯库等当选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37)

对张干来信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39)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二十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四月三日） (40)

对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三日） (42)

对罗瑞卿关于派部队帮助越南设防、修路、修机场
的部署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44)

对棉花收购、分配和战略储备情况摘报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45）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解放二十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五月八日） （47）

关于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
批语和声明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一日、十二日） （49）

对关于第二次核试验试爆时间及新闻公报稿报告的
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 （53）

祝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的电报和批语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五日、二十日） （55）

毛泽东等祝贺胡志明七十五寿辰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八日） （58）

对中央常委接见军委作战会议全体同志时指示纪要
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60）

毛泽东等祝贺《中蒙友好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日） （62）

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
（一九六五年五月） （63）

念奴娇 井冈山
（一九六五年五月） （64）

在国际关系研究所一份内部材料上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日） （65）

在《山西省农民讲习所办得很好》材料上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六月七日） （67）

对《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文
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一日） （69）

给章士钊的信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71)
关于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问题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72)
对第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两个文件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十日)	(73)
关于学校要减轻学生负担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	(76)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四十四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日)	(77)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给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的 复信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一日)	(79)
对李宗仁回国问题的报告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二日、十五日)	(81)
关于绘画使用模特问题的批语和批注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84)
给章士钊的信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87)
给郭沫若的信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89)
对刘少奇关于转发湖北九个材料及所写指示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九日)	(91)
给人民大会堂服务员高殿英的题词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	(93)
给陈毅的信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94)
给华罗庚的信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97)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国庆二十一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98）

对首批援越高炮部队开赴越南问题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100）

毛泽东等祝贺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十二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101）

给于立群的信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103）

同李宗仁和夫人的谈话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104）

关于确认毛泽民出生年月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106）

对中央转发谷牧《关于设计革命运动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107）

对一篇谈李宗仁回国问题的材料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七月） （110）

对《“四清”工作队员的一些意见》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八月一日） （112）

关于查找杜牧全集的便条
（一九六五年八月一日） （114）

对卫生部党委《关于进一步改革北京医院工作的
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日） （115）

给康生的信
（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 （117）

关于办好学校问题的意见
（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 （119）

关于查找韩昌黎全集的便条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日） （120）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二十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四日）	（121）
对李先念关于纠正一些地区粮食征购任务过重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五日）	（123）
对击沉国民党军剑门号、章江号两舰战斗经验总结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五日）	（125）
关于军队干部参加地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七日）	（127）
对中央转发谭震林所送四份材料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日）	（130）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二十一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132）
对《湖南各级社教领导机构实行革命化》材料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134）
给钟学坤的题词	
（一九六五年八月三十日）	（136）
在中组部《关于在南方各省区培养提拔本地领导干部问题的报告》上加写的文字	
（一九六五年八月）	（137）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	（139）
对胡乔木二十七首词稿的批语和批注	
（一九六五年九月五日、十五日）	（141）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九月八日）	（146）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一周年 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九月八日）	（149）
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二十周年题词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五日）	（150）
在外交部给印度政府的复照稿上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九日）	（151）
对中央高级党校关于杨献珍问题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153）
给邓颖超的信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155）
念奴娇 鸟儿问答	
（一九六五年秋）	（156）
对纪念孙中山诞辰百周年筹委会名单（草案） 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	（157）
对外交部关于陈毅出访五国概况汇报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十月）	（158）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 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十月六日）	（160）
对总政《关于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加强战备的 情况和意见（草稿）》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162）
在全国第二批城市“四清”部署情况简报上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十月三十日）	（164）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八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六日）	（165）

对《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
的反映》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167)

对林彪所提五项原则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169)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一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170)

对越南南方领导人接见我新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
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172)

给陈伯达的信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174)

在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
政治的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七日) (175)

关于通知一些负责人来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扩大会议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七日) (178)

关于机要保密、警卫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182)

关于党内印发《论十大关系》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183)

改造学校教育让学生接触社会实际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85)

手书叶剑英《七律·怀远》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87)

毛泽东等祝贺古巴解放七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89)

在《哲学研究》一九六五年第四期上的批注
(一九六五年) (191)

重读《长冈乡调查》时写的批注	
(一九六五年)	(193)
七律 洪都	
(一九六五年)	(195)
在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的批注	
(一九六五年)	(196)
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复信稿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一月六日)	(199)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 的电报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日)	(200)
给章士钊的信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	(202)
给周世钊的信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204)
对有关《海瑞罢官》问题七个材料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	(205)
对中共中央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复信稿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	(207)
关于重新印发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二月六日、十二日)	(209)
对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 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月)	(212)
听取叶剑英、杨成武汇报时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216)
对余秋里考察三线建设《汇报提纲》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219)
给人民大会堂服务员罗丽华的题词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221)

对王任重关于政治挂帅问题发言稿及中央批语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月）	（222）
同毛远新谈教学问题	
（一九六六年二月）	（224）
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信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	（225）
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批语、批注和修改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月）	（229）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	（237）
对中共代表团与日共代表团联合公报草案的修改	
（一九六六年三月）	（238）
对《记者简报》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四月）	（241）
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	（242）
对全国政协一届会议开幕词中一段话的批注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	（245）
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六年四月）	（246）
对高教部党组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运动情况简报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254）
对《毛主席诗词》（注释本）中几个问题处理意见的请示信的修改和批语	
（一九六六年四月）	（256）

对林一山关于修建长江三峡工程综合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四月）	(259)
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 给林彪的信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十四日）	(261)
对《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清样 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五月）	(265)
印发张恩慈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意见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一日）	(266)
对章士钊关于暂不出版《柳文指要》来信的批语 和批注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	(267)
关于同意派临时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日）	(270)
关于播发《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 干些什么?》大字报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	(271)
对《首都工作组会议纪要》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	(273)
对外交部关于周恩来率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请示 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	(275)
关于暂不发表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问题 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	(276)
七律 有所思 （一九六六年六月）	(279)
必须组织和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 （一九六六年）	(280)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交企业和基建单位如何
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通知稿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日) (281)

给江青的信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283)

对陶铸、张平化关于中宣部的组织和工作问题请示信
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 (288)

对北京语言学院七名学生来信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 (289)

畅游长江时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 (291)

对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稿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月) (292)

关于不要用“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八月四日) (298)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复信和批语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一日) (301)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304)

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文中加写的批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306)

对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九日、十一日) (307)

对李达来信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 (311)

在中央群众接待站会见首都群众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 (312)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 (313)

对陈伯达、康生关于李雪峰不再兼任北京市委书记 请示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	(316)
给刘少奇的信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	(318)
对林彪三篇讲话稿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	(319)
为北京大学新校刊题写的刊名和批语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	(320)
在庆祝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同林彪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	(322)
革命靠自己 (一九六六年)	(323)
为《中国妇女》杂志题写的刊名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	(324)
对薄一波来信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325)
对谢富治《关于公安部精简机关的设想》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327)
关于传阅文件问题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329)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 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330)
对李富春关于国务院八个口机关文化大革命问题 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331)
对关锋、戚本禹反映北京市文化大革命情况报告 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332)

对章士钊反映被抄家情况来信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 （334）

对林彪在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
师生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336）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月五日） （337）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 （339）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具体
问题通知稿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 （341）

对总政关于全军军以上机关暂缓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
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 （342）

对傅连璋来信的批语和复信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十二月二十八日） （344）

对中央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告西北局的两份电报
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 （346）

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 （348）

对党政干部任免审批手续暂行规定（草案）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 （351）

对四位美国专家的一张大字报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 （352）

关于驻外机构“来一个革命化”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354）

对中央关于国庆节挂像、抬像办法和口号的通知稿
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九月） （356）

关于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一事给林彪等的信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 （359）

对刘少奇《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
提纲（草案）》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 （360）

对林彪在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
师生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 （362）

对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
师生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 （364）

对《人民日报》社论《向工农兵致敬，向工农兵
学习》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 （366）

关于印发、讨论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提纲的请示
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 （367）

对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十月七日） （368）

对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月） （369）

对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初步检讨稿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372）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374）

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383）

对萧华关于大军区机关文化革命问题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 （386）

对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
和批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七日） （387）

对一些中央和其他方面负责人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 （391）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串连问题的通知稿和补充
通知稿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十二月二日） （392）

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学校师生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 （394）

对江青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 （396）

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二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400）

对中央关于刘澜涛出狱问题的复电稿和张闻天有关
证明材料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九六七年二月） （402）

对《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新闻稿
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 （405）

对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草稿）》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407）

关于不要公开引用《炮打司令部》等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410）

对李雪峰《在华北局机关的检讨要点》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 （411）

对黑龙江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413）

对黑龙江省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请示
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415）

要保护和支持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
（一九六六年） （417）

对刘少奇关于北京建工学院红卫兵要他去公开检查的
来信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418）

对《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 （419）

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
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 （420）

对《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等五份材料
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422）

对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稿等三个
文件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十三日） （424）

对《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
起来》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 （427）

关于将贵州各方代表找来北京研究问题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429）

在延边自治州党委请求中央文革小组制止冲突电报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431)

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电报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433)

对《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435)

要节约闹革命
(一九六七年) (436)

关于研究军队夺权范围等问题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438)

对《中央军委命令》稿和中央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月) (440)

在章伯森反映湖南问题报告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445)

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 (447)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 (449)

关于发表《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等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453)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新疆电报稿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455)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 (456)

关于说服红卫兵让王任重就医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 （457）

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节录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459）

在西藏军区党委一份电报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八日） （460）

对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
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 （463）

关于播发《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
基本经验》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 （466）

对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
几项规定》稿和补充规定稿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二月） （468）

对关于成立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等情况汇报
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 （472）

关于派人调查总结北京两所中学军训经验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 （474）

对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 （476）

对怀仁堂会议记录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二月） （478）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
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二十二日） （480）

对北京卫戍区关于在大中学开展军训的两个总结
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三月二十三日） （483）

对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等四篇新闻稿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 （485）

对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
信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 （487）

对中央关于改变上海人民公社名称为上海市革命
委员会复电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489）

关于了解广东省委领导干部情况等问题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二十八日） （491）

关于公开报道贵阳棉纺厂按行政系统搞联合等问题
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493）

对《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495）

对《北京政法公社在天津小站公社支持了谁？》
的材料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497）

在沈阳军区《组织机关干部到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的
情况简报》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 （498）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论革命的“三结合”》
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500）

在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
的报告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502）

关于转发渡口驻军支左经验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504）

对贵州省军区支援左派工作经验材料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506）

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三月） （508）

对北京市夺权筹备工作请示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 （509）

关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程序问题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 （511）

给章士钊的信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 （512）

关于推迟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三月） （513）

对中央转发北京卫戍区对一些厂矿实行军事管制的
布告指示稿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 （514）

对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职工、干部的信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 （517）

对《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材料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 （519）

对中央《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 （521）

对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等问题报告
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 （522）

对余秋里关于编制长期计划工作 初步议定步骤的报告^{〔1〕}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日）

已阅。退周恩来同志，照此办理。

毛 泽 东

二月二日一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一九六五年二月一日转送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余秋里一九六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关于编制长期计划工作初步议定步骤给周恩来的报告上。报告说，我们初步议定编制长期计划的步骤：第一步，先与中央各有关部门进行议论。在议论过程中，每告一个段落就向中央报告一些情况。第二步，在中央各有关部门议论中提出的设想基础上，约请六个大区及有关省市同志进行议论、修改补充。第三步，在上述议论后的基础上，拟订初步方案，报请中央审议。议论的方式，要以主席思想为指针，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从准备应付战争，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争时间的考虑出发，各部门结合各自的现有基础，对第三个五年计划及长远规划的奋斗目标、战略布局、战役重点、主攻方

向、重大技术政策等方面提出看法与做法。总之，要集思广益，多谋善断，把主要问题弄得比较清楚，要做到计划既有雄心壮志，又有科学根据。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本册中，周恩来的主要职务未发生变化时不再作注。

关于欢迎李宗仁回国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二月三日）

总理^{〔2〕}：

似应欢迎李宗仁回国。去年向美报投书问题^{〔3〕}，无关大局，不加批评，因他已自己认错了。

毛 泽 东

二月三日上午

柯西金^{〔4〕}何时到京，盼告。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调查部一九六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关于廖行健在香港谈李宗仁动态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报告说：程思远一月二十五日报告，廖行健在香港对他说，李宗仁准备从美国经欧洲回到祖国。李为表示离美决心，已登广告出卖其新泽西州的房子，预定四五月间赴欧洲。他对去年在纽约《先驱前锋论坛报》投函事，非常追悔，惜已补救不及。现在回国是李唯一可行之路。可否先指示方针，俾李有所遵循。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回国。廖行健，李宗仁的桂林同乡。李宗仁，原国民党桂系首领。一九四八年四月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引退后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国民党政权被推翻后，于一九

四九年十二月去美国。程思远，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宗仁的秘书。

〔2〕总理，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3〕投书问题，指李宗仁一九六四年二月在纽约《先驱前锋论坛报》发表文章，呼吁美国政府也像法国政府那样同中国建交，但因在朝鲜战争问题上说了错话，而在国际社会产生了不良影响。

〔4〕柯西金，当时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五年二月五日，柯西金率领苏联代表团途经北京赴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柯西金二月十日回国途中到达北京，十一日毛泽东会见柯西金和他率领的苏联代表团。

对关于北京修建地下铁道 问题的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二月四日）

杨勇同志：

你是委员会的统帅。希望你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是为至盼！

毛 泽 东

二月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彭真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日报送杨勇、万里、武竞天一月十五日关于北京修建地下铁道问题给彭真、李富春转中共中央并中央军委的报告的附信上。彭真的附信说：拟同意。这个方案是富春、成武、我同他们一起议定的。报告包括建设方针、线路方案、防护等级、工程造价、筹建工作五个部分。报告说：工程拟分三期进行，第一期长二十点八公里，力争于一九六五年下半年动工，一九六八年上半年完成第一期工程。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

杨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组长。万里，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副组长。武竞天，当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成武，即杨成武，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祝贺哥穆尔卡六十寿辰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二月四日)

华沙

波兰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哥穆尔卡同志：

在你六十寿辰的时候，请接受我对你的衷心的祝贺。你的长期的工作，是同波兰党和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密切相联的。我们热烈地祝贺，波兰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并将继续取得新的胜利。祝贺中波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必将不断地增进和加强。

祝你健康长寿。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二月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
铅印件刊印。

对赵尔陆《关于三线建设的动力问题》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三日）

总理：

此件我看了两次，觉得很重要，似可发给小计委^{〔2〕}及有关各部委和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研究，总结过去正确的和错误的经验，以利今后建设。

毛 泽 东

二月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赵尔陆一九六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报送《关于三线建设的动力问题》的报告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上。信中说：为了切实办好国防工业三线建设这件大事，我们在去年九月至十一月的踏勘选厂过程中，就三线建设的布局、厂址、动力、设计和施工等问题，展开了议论，逐步形成了一些比较具体的想法。我们打算把这些想法整理成四个专题文件，陆续送上，请予批评、指示。四个专题文件的题目是：（一）关于三线建设的布局问题；（二）关于三线建设的厂址选择问题；（三）关

于三线建设的动力问题；（四）关于三线建设的设计和施工问题。赵尔陆报送的《关于三线建设的动力问题》的报告说：动力问题是三线建设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三线地区现有发电能力很少，远不能适应工业建设日益增长的需要。为了探索一条解决工业用电问题的途径，我们结合这次三线踏勘选厂工作，对三线地区的动力资源情况和现有大小规模不同的水电站、火电站，作了一些调查，请教了一部分省、地、县的有关同志，从而受到了很大启发。经过研究，我们对三线电站建设提出下列具体意见：（一）贯彻执行“小而分”的方针，以星星点点地建设中小型水电站和火电站为主。（二）原则上有水搞水电，有煤搞火电，两者都有就采取水电、火电同时并举，但应以发展水电为主。（三）水电站的建设采取低水坝、小库容，省投资、早见效，梯级开发、综合利用，对上游不淹田不移民、对下游无危害的建设方针。（四）火电站的建设，在煤矿附近有一定水源的情况下，采取小规模、多布点、电站靠近煤矿的建设方针。煤可以出了煤窑就进锅炉（矿口电站），架设输电线路送电。

〔2〕小计委，是中共中央一九六五年一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一个工作机构，主要任务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等。组建时，成员有当时的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建筑工程部部长李人俊、浙江省委主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林乎加、北京市委主管工业的书记处书记贾庭三、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陈伯达。后来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由小计委负责同志正式主持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不再用小计委的名称。陈伯达，当时还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毛泽东的秘书。

对中央《关于正确地处理工业、交通企业中班组长同工人群众关系问题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三日）

—

同意，照发。

毛 泽 东

二月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在这次运动中，应当放手发动群众，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大多数（包括车间级、工厂级及其以上）干部，只整那些顽固不化的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极少数人。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正确地处理工业、交通

企业中班组长同工人群众关系问题的通知》稿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对中央这个通知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排印的是他加写的文字。通知稿说：目前，在工业、交通企业发现有些单位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过程中，班组长（包括一小部分小的工段长）同工人群众的关系很紧张。这个问题，在运动中必须及时地正确解决。为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正确地处理企业中班组长同工人群众的关系问题，必须注意以下几点：（一）在运动中应当满腔热情、循循善诱地帮助班组长提高觉悟，提高工作能力，自觉地克服缺点、错误，改进作风和工作方法。对于那些群众意见较多的班组长，可以在运动中的适当时期，采取同工人群众开小型交心会、民主会的方式，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消除隔阂、加强团结的目的。（二）班组长必须认真地参加劳动，一律不要脱离生产。应当明确班组长的职责和适当的生产岗位，规定合理的劳动时间和定额。（三）对于班组长，今后要结合改进领导方法和管理制度，逐步实行定期的民主选举，选出后由行政领导加以任命，连选可以连任。要在班组实行四大民主（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同时，要教育工人群众遵守劳动纪律，服从生产指挥，但不允许用任何借口去整工人群众。（四）对于班组长中极少数坏人、没有改造好的封建把头 and 蜕化变质分子，应当进行适当的批评和斗争，并根据不同情况有区别地加以处理。（五）在这次运动中，各级领导必须引导群众集中精力解决两条道路等大是大非问题，不要乱追男女关系，更不要拿到群众会上去斗争。至于极少数恶霸、流氓和其他坏分子奸污妇女和军属的罪行，应当个别处理，或者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发这个通知。

毛泽东等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三日)

莫斯科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阿·伊·米高扬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同志：

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签订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根据中苏两国人民传统的革命友谊和团结对敌的共同愿望而签订的。这个条约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伟大的中苏同盟的巩固和加强，有利于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有利于确保我们两国的共同安全，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共同事业。

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特别加紧武装日本和西德^{〔2〕}军国主义，力图把日本和西德变成为它在亚洲和欧洲发动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和核基地。现在美帝国主义正在悍然走上武装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进一步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冒险道路，轰炸越南人民的美国强盗头子大叫

扩大战争。这不仅是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也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侵犯。这不仅是对印度支那和平的挑战，也是对世界和平的挑战。当前的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美帝国主义是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主帅，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大敌当前，我们中苏两国人民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旗帜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斗旗帜下，紧密地团结起来，坚决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的反美武装斗争，坚决支援日本人民和德意志人民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和西德军国主义的斗争，坚决支援古巴人民和刚果（利）^{〔3〕}人民反对美国武装干涉的斗争，坚决支援全世界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这是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可推卸的国际主义义务。

中国人民一贯维护中苏友好团结，信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义务。不论世界上发生什么情况，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都将坚决地同伟大的苏联人民站在一起，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站在一起。

中苏两国人民之间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三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和苏联两国政府全权代表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签订。主要内容是：（一）“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二）“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三）“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四）“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条约于同年四月十一日起生效，有效期三十年。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议，鉴于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决定条约至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一日期满后不再延长。

〔2〕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简称。

〔3〕刚果（利），后改称扎伊尔，今刚果（金）。

对观察家评论《联合国往哪里去?》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日)

写得很好，照此发表。

毛 泽 东

二月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日报送的拟在《人民日报》刊登的观察家评论《联合国往哪里去?——评戴高乐二月四日的讲话》上。周恩来在报送这篇评论的信中说：“送一篇观察家评论给你看看，看有无需要增改的。此文拟在明日见报。如无甚增改，请阅后退回。”评论说：对于联合国的现状，世界上多数国家是不满意的。法国总统戴高乐二月四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批评联合国的讲话表明，即使在北大西洋集团内部，也有人认为联合国作为美国家天下的局面应该结束了。现在，从东方到西方，要求彻底改组联合国的呼声越来越高，各种各样的方案已经提了出来。不管哪种方案，一个共同之点，就是要求结束美国把持和操纵联合国的局面。联合国必须改正错误，彻底改组，已经成为当前人心之所向、大势之所趋。二月十五日，这篇评论在《人民日报》发表。

对出版《蒋介石言论集》 的报告^{〔1〕}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五千册太少，应出一万册。

毛 泽 东

二月二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六日给中央书记处的《关于出版〈蒋介石言论集〉的报告》上。报告说：蒋介石的言论，一九六一年由中华书局筹划编辑，一九六三年拟定初稿。但这个初稿只选收蒋介石有代表性的言论，而且大部分是摘录，所收资料很不完备，所以迟迟没有出版。最近，我们根据主席的指示，对出版蒋介石的言论重新作了安排，拟编辑出版全集，目的主要是提供一部比较系统的、全面的反面资料。编辑出版的计划是：（一）书名拟定为《蒋介石言论集》，按时间顺序编排，分集出版。（二）版本一般应以较早的本子为准。个别难于理解的文字，可酌加简要的题解或注释。（三）此集由中华书局和人民出版社共同编辑，以中华书局的名义出版。出版时，写一个前言，说明出版的目的。

计划在今年年底出齐。(四) 各集拟印五千册，控制发行。主要发给有关领导机关和研究工作者。

对《赫鲁晓夫言论》第三集 出版者说明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已阅。同意照办。

毛 泽 东

二月二十五日一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康生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报送《赫鲁晓夫言论》第三集出版者说明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此件如认为可用，拟于二十五日夜间广播，二十六日见报。出版者说明指出：赫鲁晓夫下台之前，我们出版了《赫鲁晓夫言论》第一、二集，收集了赫鲁晓夫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五三年期间的言论。从现在起，我们按照预定计划，把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以后，直到他一九六四年十月下台期间的公开言论，全部陆续予以出版。不批判唯心论，就不能发展唯物论。不批判形而上学，就不能发展辩证法。不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和现代教条主义，就不能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出版《赫鲁晓夫言论》，可以使人们看到什么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以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发展和破产的历史，同时

也可以把赫鲁晓夫的言论当作一面镜子，来辨别什么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以便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二月二十六日，这篇出版者说明在《人民日报》发表。《赫鲁晓夫言论》总共出版十四集。第一集于一九六四年八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第十四集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出版。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对刘彬关于鞍钢情况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已阅，退薄一波同志。此件^{〔2〕}写得很好，比王鹤寿^{〔3〕}同志过去写的报告，大有进步。

毛 泽 东

二月二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薄一波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报送在鞍山钢铁公司蹲点的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刘彬关于鞍钢情况报告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一个最大的企业（占全国钢产量的三分之一强），在干什么、怎么干的，既提出了问题，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工业交通办公室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2〕 此件，指刘彬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关于鞍钢情况给薄一波的报告。报告说：现在鞍钢的形势很好。一九六五年是争取鞍钢工作转变带有关键性的一年，在这一年对工作提出的具体要求主要有五项：（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采取积极进行、稳步推进的方针，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分期分批全面完成。（二）以搞好品种

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中心组织生产新高潮。在提高产品质量问题上，今年继续抓住生产为使用服务这一基本思想，在管理上实行两个改革：第一，把单纯按计划指标组织、考核生产，改为在计划的指导下，按合同组织生产，检查、考核生产。第二，把搞好质量的标准，由单纯用国家标准衡量，改为以用户使用满意为标准。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今年拟减少四分之一以上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百分之三十以上。（三）在基本建设工作上，今年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基本完成鞍钢厂内填平补齐的骨干工程；二是完成设备大修的大会战。这是鞍钢生产上的两个老大难问题。在基本建设方面继续进行三项改革：第一，把按金额计算工作量，改为按工程项目计算工作量。第二，取消施工单位的上交利润制。第三，改革体制，甲乙双方合并，树立大力协同的高风格，培养一支好队伍。（四）大学毛主席著作，学解放军、学大庆、学大寨，在抓活的思想的同时，揭发与克服经营管理上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苏联的错误影响，逐步实现企业管理革命化，力求按照主席的思想办企业。（五）政治工作以继续抓思想、抓积极因素、抓作风为主，促进职工思想革命化。

〔3〕王鹤寿，原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当时任中共鞍山市委第一书记、鞍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

在关于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 建设问题报告上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三月四日）

此件很好。

毛 泽 东

二〈三〉月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薄一波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报送的冶金工业部部长吕东、副部长徐驰二月二十三日关于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建设问题的报告上。报告说，自从本月九日开会决定成立攀枝花指挥部以来，我们进行了以下工作：（一）指挥部的干部班子正在调集和商办。（二）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所需大型设备三十五项已与一机部研究商定，采取措施，提前设计和制造进度，以满足提前建成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的需求。（三）组织有关的部去攀枝花进行现场设计，各部已经同意，第一批设计人员三月初可到达攀枝花现场。（四）施工力量正在安排落实。（五）攀枝花钒钛铁矿的冶炼试验正在顺利进行。（六）需由国外进口的设备清单已经提交有关部门。（七）需要陆续进入施工现场的施工设备及维修设备清单已经提出。

从现在情况看，攀钢建设的进度可能提前一到两年。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工业交通办公室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对总政举办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 展览情况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三月四日）

已看过。退林彪同志。

毛 泽 东

三月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林彪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二月二十三日关于举办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的情况报告上。报告说：这个展览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日在北京正式展出，到今年二月十八日止，共接待观众三十一万二千八百多人次。广大观众热情称赞这个展览会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生动课堂。这种展览形式好看、好记、好懂，形象具体，鲜明生动，印象深刻，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为了在今年掀起更大、更广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新高潮，尽量满足群众的要求，我们拟再采取延长展期半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等措施。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廖初江，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某部第三连副连长。丰福生，当时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空军某部汽车连炊事班班长。黄祖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某部防化连连长。

在《后汉书》上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三月四日）

—

送陈毅^{〔2〕}同志阅。

陈实〈寔〉传、黄琼传、李固传。

二

送刘、周、邓、彭^{〔3〕}一阅，《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二均是毛泽东在《后汉书》封面上的批语。

〔2〕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

〔3〕刘，指刘少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本册中，刘少奇的主要职务未发生变化时不再作注。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中联部一个请示报告上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日）

请赵毅敏同志将中文、英文各一份寄我对读。请告陈平^{〔2〕}同志：我读了他们的声明，感到很高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又鲜明又有力的声明。

毛 泽 东

三月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赵毅敏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关于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托我党将其有关国际共运的声明转交其他左派党给彭真的请示报告上。报告说：三月四日下午，在京马共中央负责同志委托我部送交中共中央的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明》，有中文、马来亚文、英文版本各一份。另送这三种文本的声明各十份，请中方代转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印尼、日本、缅甸、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十个马列主义兄弟党。报告提出了准备转交这个声明的具体意见。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明》揭露了苏共领导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仍坚持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指出：一切共产党都必须严

格遵守指导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这就是独立和平等的原则，团结和互相支持的原则。它们应当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双边或多边的会谈，通过协商求得一致，协调它们在共同斗争中的行动。我们强烈谴责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行为，例如挥舞指挥棒，鼓吹对某一个党的盲从，干涉其他党的内部事务，对其他党进行颠覆活动。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上述这类错误行径，违反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公开论战能够帮助分清是非，有助于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真正团结。四月二日，这个声明在《人民日报》发表。赵毅敏，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陈平，当时任马来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关于《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 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一日、十七日、十八日）

一

送康生同志：

作了一点修改^{〔2〕}，请考虑是否可用。

毛 泽 东

三月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苏共领导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软硬兼施，七拼八凑，总算开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会议。这个会议，充满着凄凉和零落的景象。它是一个分裂的小小的会议，它是一个很不像样子的会议。

三

苏共新领导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的某些口号接过去，

企图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们已经有了变化，似乎已经不同于赫鲁晓夫^{〔3〕}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了。

这种情况，同美帝国主义将苏共领导的一些主要口号接过去，何其相似乃尔！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缓和紧张局势，全面彻底裁军，两大国主宰世界，共同援助印度，共同支持各国反动派，共同利用联合国来整世界各地革命运动，共同反华等等口号或阴谋计划，就被美帝国主义全部接过去了！苏共领导同美帝国主义打得火热，互通情报，共同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以便共同维持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反对世界上一切革命者。

四

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赫鲁晓夫的演出不过是一支很短的插曲，比较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4〕}或者考茨基^{〔5〕}的演出要短得多。今后任何人要表演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也只能同赫鲁晓夫差不多，是一支很短的插曲。

根据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
修改件）

五

为了顺利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为了进一步巩固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就必须继续揭露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本来面目，帮助那些不明了真相的人去明了真相，帮助那些在革命道路上犹豫不定的人同革命人民一道前进，就必须

最大限度地把那些替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做帮凶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孤立起来，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根据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
手稿）

六

退康生同志：

已阅，同意。并同意你们明天回北京。

毛 泽 东
三月十七日下午九时

七

小平、彭真、康生同志：

今天，你们如能留一天，我还想同你们谈一次。请酌定。

毛 泽 东
三月十八日上午四时

再请韩先楚、陈再道^{〔6〕}两同志留两天，十九日谈一次，二十日飞京，不知是否可能？请韩、陈二同志酌定。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六、七是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稿的三次批语。这篇文章

是针对苏共中央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至五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名为“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会议和三月十日发表的会晤公报而写的。其中，本篇一写在这篇文章的三月十日修改稿上，在审改中将原标题《评莫斯科的分裂小会》改为《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本篇六写在康生三月十七日报送这篇文章修改稿的附信上。信中说：“我们回来后，又同小平、彭真同志一起，修改了一下。”“如主席今晚看，我们明天即回京；如主席明天看，我们后天回去。”本篇二至五是毛泽东对《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同邓小平、彭真、康生等再次讨论这篇文章，决定将标题改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将文章四个部分都加小标题：（一）这是一个什么会议。（二）苏共新领导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三）回答几个问题。（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的轨道上团结起来。这篇文章，在三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九六五年第三期发表。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当时毛泽东、邓小平、彭真、康生均在武汉。

〔2〕一点修改，见本篇二至五。

〔3〕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和十五日，他的这两个职务被先后解除。

〔4〕伯恩施坦，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首领、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曾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德意志帝国宰相兼普鲁士王国首相俾斯麦的政策。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后，公开篡改马克思主义。从一八九六年开始，以“社会主义问题”为题，发表一系列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修正”。反对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否定剩余价值学说，主张阶级调和，宣扬“议会道路”，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5〕考茨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早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后转向改良主义。长期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主编，编辑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二十世纪初成为第二国际“中派”首领，提出“超帝国主义论”，鼓吹社会和平主义。一九一七年，参与创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之后，出版《无产阶级专政》、《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等书，歪曲马克思主义，反对俄国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6〕韩先楚、陈再道，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

毛泽东等悼念 乔治乌-德治逝世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日）

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

惊悉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格·乔治乌-德治同志不幸逝世，我们怀着极悲痛的心情向你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格·乔治乌-德治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是罗马尼亚人民的忠实儿子、敬爱的领袖，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战士。他领导罗马尼亚人民举行了“八二三”武装起义，引导罗马尼亚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坚持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逝世不仅是罗马尼亚人民的重大损失，而且是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重大损失。

在这不幸的时刻，我们相信，罗马尼亚工人党和罗马尼亚人民将化悲痛为力量，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在胜利的道路上

继续前进。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同罗马尼亚人民团结一致，为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党、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争取世界和平、人民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日

根据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人民日报》刊印。

毛泽东等祝贺苏联“上升二号” 宇宙飞船飞行成功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莫斯科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阿·伊·米高扬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同志：

由别利亚耶夫上校和列奥诺夫中校驾驶的“上升二号”苏联宇宙飞船成功飞行和顺利着陆，中国人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这是苏联劳动人民的伟大成就。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兄弟的苏联人民、苏联科学工作者、飞船船长别利亚耶夫和宇航员列奥诺夫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们衷心地祝愿兄弟的苏联人民在征服宇宙空间的事业中，继续获得新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根据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刊印。

毛泽东等祝贺齐奥塞斯库等 当选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基伏·斯托伊卡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扬·格奥尔基·毛雷尔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高兴地获悉，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当选为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基伏·斯托伊卡同志当选为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扬·格奥尔基·毛雷尔同志当选为部长会议主席。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伟大的勇敢的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的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取得了伟大成就。罗马尼亚人民在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罗马尼亚人民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我们预祝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在光荣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的领导下，今后在各个战线上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中罗两国人民是兄弟、是战友。我们坚信，我们两党、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必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根据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刊印。

对张干来信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徐冰^{〔1〕}同志：

此人^{〔2〕}八十几了，是我的校长。他现要求他的两个子、侄，调到长沙工作，是否可行，请你酌定。

毛 泽 东

三月二十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传阅件刊印。

注 释

〔1〕 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2〕 此人，指张干，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担任该校校长。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一日，他致信毛泽东提到自己 and 老伴年老多病，身边无人照顾，要求将其幼子和侄儿调来身边工作。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 二十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四月三日）

布达佩斯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卡达尔·亚诺什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同志：

在匈牙利解放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向你们，向兄弟的匈牙利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一九四五年，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匈牙利人民，粉碎了德国法西斯奴役的枷锁，推翻了霍尔蒂二十五年的血腥统治，获得了几世纪以来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自由解放。解放后，匈牙利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和颠覆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人民对兄弟的匈牙利人民在前进道路上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感到非常高兴。

中匈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相互支持，相互合作。我们坚信，中匈两国人民将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目前首先坚决击败美帝国主义对越南人民的侵略，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而

斗争。

祝匈牙利人民在建设自己祖国的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匈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四月三日

根据一九六五年四月四日

《人民日报》刊印。

对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三日）

已阅，同意。

毛 泽 东

四月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一九六五年四月十日报送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指示说：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我们已经向全世界一再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我们绝不能置之不理，我们准备随时同越南人民一道共同战斗。我们还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火引到我们的国土上来。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加强备战工作。在全党县委以上的干部中，应当加强备战思想，密切注意越南战局的发展。要估计到敌人可能冒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应当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准备对付美帝轰炸我国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我们的国土上作战。我们必须把情况设

想得严重一些，把备战工作做得充分一些，特别是在重要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要切实做好对付敌人空袭的准备。我们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这样，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只要我们做好一切准备，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指示还对目前的具体备战措施和各级领导需要注意的事项提出了要求。四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下发这个指示。这个指示的落款时间为四月十二日。

对罗瑞卿关于派部队帮助越南 设防、修路、修机场的部署 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已阅，照办。

毛 泽 东

四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
抄件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罗瑞卿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日关于派三支工程部队帮助越南在东北群岛设防，修建、维修铁路和机场的部署问题给邓小平并报毛泽东、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上。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兼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对棉花收购、分配和战略储备 情况摘报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江青：

此件^{〔1〕}可阅。形势大好。

毛 泽 东

四月二十九日

我今日离此去别地^{〔2〕}爬山。又及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此件，指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一九六五年四月十八日编印的《文电摘要》第五十八号刊登的《关于棉花收购、分配和战略储备情况》。摘报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报告：一九六四年棉花生产在上年丰收的基础上，又获得了大幅度的增产。预计可收购三千一百万担，比一九六三年增加一千万担（百分之四十六），超过了一九五七年度（二千七百万担）的水平。由于棉花收购增多，供应上比较主动。今年安排供应纺纱用棉二千四百三十八万担，可纺纱六百三十万件，比上一年度增加百分之四十一。絮棉平均每人供应四点九两，比上一年度增加二两。国家储备二百万担外，周转库存

比原计划增加二百一十万担。拟从一九六四年度收购的棉花中拿出二百万担，作为战略储备。还打算从一九六五年度新棉中再拿出一百万担作为战略储备，要求在一九六五年底全部入库。

〔2〕去别地，指毛泽东离开湖北武昌前往湖南长沙。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解放 二十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五月八日)

布拉格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安托宁·诺沃提尼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博胡斯拉夫·拉什托维奇卡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总理约瑟夫·列纳尔特同志：

在捷克斯洛伐克解放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向你们和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一九四五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下，在苏联的援助下，赶走了德国法西斯占领者，取得了民族独立和祖国解放。我们高兴地看到，解放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成就。

中捷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兄弟友谊。维护和加强这种友谊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深信，中捷两国人民将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各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反对西德^{〔1〕}军国

主义和复仇主义，为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正义斗争，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共同奋斗。

祝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捷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五月八日

根据一九六五年五月九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简称。

关于支持多米尼加人民 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批语和声明^{〔1〕}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一日、十二日）

—

请徐秘书^{〔2〕}用电话告总理，同意发表这个声明。

毛 泽 东

五月十一日下午十一时半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最近，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了推翻卡夫拉尔卖国独裁政权的政变^{〔3〕}。美国约翰逊^{〔4〕}政府派出了三万多武装部队，进行血腥镇压。这是美帝国主义对多米尼加人民的严重挑衅，也是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严重挑衅。

目前，爱国的多米尼加人民正在同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进行英勇的战斗。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美爱国的武装斗争。我深信，只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坚持长期斗争，多米尼加的反美爱国斗争，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是

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

美帝国主义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控制、干涉、颠覆和侵略。这一次，美国政府把什么“睦邻政策”、“不干涉原则”等等骗人的鬼话一股脑儿摔在一边，对多米尼加共和国进行了赤裸裸的干涉和侵略，这就更加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强盗的原形。

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打的是“保卫自由”的旗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呢？这就是用飞机、兵舰、大炮屠杀别国人民的自由。这就是任意侵占别国领土的自由，任意蹂躏别国主权的自由。这就是江洋大盗杀人劫货的自由。这就是把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踩在自己脚下的自由。他们在多米尼加是这样，在越南是这样，在刚果（利）^{〔5〕}是这样，在其他许多地方也是这样。

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还打着“反共”的旗号。美帝国主义的“反共”，就是反对一切不愿意做美国奴隶的人，就是反对一切保卫本国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人，就是反对一切不愿意受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人。过去，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6〕}都是这样。现在，美帝国主义更是这样。

在美帝国主义眼里，什么联合国，什么美洲国家组织^{〔7〕}，什么别的玩意儿，统统都是它手掌里的工具。对于这些工具，它用得着就用，用不着的时候就一脚踢开。踢开了，还可以捡起来再用。用也好，踢开也好，都是以有利于它的侵略目的为转移。

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侵略，使多米尼加人民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必

须同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激起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新的反美浪潮。英勇的多米尼加人民，你们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在支持你们，亚洲各国人民在支持你们，非洲各国人民在支持你们，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在支持你们，全世界人民都在支持你们。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必胜！

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必败！

根据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周恩来总理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一日晚八时关于发表毛泽东《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的请示电上的批语。请示电说：北京明日召开群众大会，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斗争。我们建议以主席名义发表声明，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美爱国武装斗争。现将声明稿全文电告，请予批示。本篇二是毛泽东的这个声明的全文。毛泽东当时在湖南长沙。

〔2〕徐秘书，指毛泽东办公室秘书徐业夫。

〔3〕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多米尼加共和国青年军官发动

武装政变，在人民群众支持下，推翻了以卡夫拉尔为首的亲美独裁政权，组成了宪法政府。政变后，美军三万余人入侵多米尼加进行干涉，遭到多米尼加人民的英勇抗击。

〔4〕 约翰逊，当时任美国总统。

〔5〕 刚果（利），后改称扎伊尔，今刚果（金）。

〔6〕 希特勒，德国纳粹党党魁、法西斯德国元首、第二次世界大战头号战犯。一九三三年一月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并兼任总理，实行法西斯统治。一九三九年九月派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六月大举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苏联红军攻入柏林时自杀。墨索里尼，意大利法西斯党党魁、意大利首相、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战犯之一。一九四五年四月被意大利游击队捕获后处决。东条英机，日本战犯。曾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历任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关东军参谋长、日本陆军大臣和内阁首相，积极主张扩大侵华战争，并发动太平洋战争，把侵略战争扩大到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被捕，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并于十二月执行绞刑。

〔7〕 美洲国家组织，由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组成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其前身是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成立于一八九〇年四月，一九一〇年七月改称美洲共和国联盟，一九四八年四月改组为美洲国家组织。该组织从成立之日起，实际上即受到美国的操纵和控制。

对关于第二次核试验试爆时间 及新闻公报稿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

退总理。同意。

毛 泽 东

五月十二日上午九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总理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一日报送的张爱萍、刘西尧等关于第二次核试验预定起爆时间及新闻公报稿的报告上。报告说：从五月十二日到十三日大概有二十多小时的好天气。经与罗瑞卿、杨成武、刘杰等同志商定，已告前方准备行动。前方来电，已定明日行动。行动后的新闻公报，已经常委各同志审阅，现送上请核。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四日十时，第二次核试验成功进行。五月十五日，新华社正式发表中国进行第二次核试验的新闻公报。张爱萍，当时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西尧，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兼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国

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成武，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杰，当时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兼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

祝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 四十五周年的电报和批语^{〔1〕}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五日、二十日）

—

同意。

毛 泽 东

五月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在伟大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庆祝它诞生四十五周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中国人民，向光荣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并通过你们，向英雄的印度尼西亚人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一个富有创造性和战斗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伟大旗手，是密切联系群众、深受人民爱戴的革命党，是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中一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坚强突击队。

四十五年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始终高举反帝革命的旗帜，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印度尼西亚反帝革命的历史上，在东方革命的历史上，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近年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动广大人民，联合其他民主爱国力量，展开了粉碎美、英帝国主义合伙制造的新殖民主义产物“马来西亚”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苏加诺总统和印度尼西亚政府退出美帝国主义操纵的联合国和在国内打击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果敢行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人民一贯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正义斗争。最近，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援越抗美运动。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共同斗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向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同时也同现代教条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坚持兄弟党关系中独立和平等的原则，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以迪·努·艾地^[2]同志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善于从本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出色地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印度尼西亚化，独立地制定符合印度尼西亚人民根本利益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指引印度尼西亚的革命斗争不断地胜利前进。

中国共产党以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这样亲密的坚强的战友而感到十分自豪。我们两党的革命团结和我们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在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的斗争熔炉中，经过了千锤百炼，经受了严重考验，是任何力量都破坏不了的。这种友谊和团结必将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在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坚定不移地同你们站在一起，并肩前进，共同战斗。

我们坚信，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将进一步提高党的战斗力，巩固和扩大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爱国进步力量，把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引向新的高潮，引向新的胜利。一个完全独立、民主、繁荣、先进的印度尼西亚必将屹立在世界上。

光荣的、伟大的、英勇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日

根据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四日报送的以毛泽东名义祝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诞生四十五周年的电报稿上的批语。本篇二是这个电报的全文。

〔2〕迪·努·艾地，当时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主席。一九六五年印度尼西亚“九三〇”事件后被捕，同年十一月被害。

毛泽东等祝贺胡志明 七十五寿辰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八日)

河内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亲爱的胡志明同志：

在你七十五寿辰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你，亲爱的主席同志，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你是越南劳动党的创始者和久经考验的领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老战士，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几十年来，你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革命的旗帜，领导越南人民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进行了英勇顽强、坚韧不拔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你对越南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尊敬。

目前，英勇的越南人民正在越南劳动党和你的英明领导下，以决战决胜的英雄气概进行着气壮山河的抗美救国正义斗争。越南人民的这场斗争，不仅是为了捍卫越南自己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而且也支援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

解放斗争，支援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国人民坚决同你们站在一起，全世界一切革命的人民也都站在你们一边。伟大的越南人民必胜，万恶的美国侵略者必败。

亲爱的主席同志，我们衷心祝你健康、长寿。祝越南人民在保卫北方、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伟大的抗美救国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加辉煌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八日

根据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九日

《人民日报》刊印。

对中央常委接见军委作战会议 全体同志时指示纪要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此件已阅，退林彪同志。所提各项意见，都同意。所谓十三项物质准备工作^{〔2〕}，如有文件，盼送给一阅。

毛 泽 东

五月二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林彪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五月二十一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常委《在接见军委作战会议全体同志时的指示纪要》上。这次会议是为贯彻执行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在十三陵谈话中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一系列指示而召开的。这次谈话的地点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大楼。指示纪要说：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九日下午，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等同志接见了军委作战会议的全体同志。在听取罗瑞卿和几位小组长汇报时，他们分别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主要意见是：（一）要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从各方面来打，我们准备好了，敌人就不敢轻易来打，就有可能争取推迟战争，甚至使战争打不起来。

(二) 要从战略上考虑问题，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对增加兵员，要从全局来考虑，军队搞得太多，就要影响国家经济建设。(三) 备战工作要有重点，现在必须搞好工事，搞好部队的武器装备。可以先从部队抽一点力量去搞工事。(四) 要从军事思想、物质基础和军队的政治工作三方面做好打仗的准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朱德，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本册中，朱德的主要职务未发生变化时不再作注。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兼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指林彪报送的指示纪要中说的“再一种就是军事上物质基础的准备，就是把十三项战备工作搞好”。

毛泽东等祝贺《中蒙友好互助条约》 签订五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日)

乌兰巴托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友好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蒙古人民革命党、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祝中蒙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友好合作关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日

根据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人民日报》刊印。

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

（一九六五年五月）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
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
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
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根据《毛泽东诗词集》刊印。
（有毛泽东手稿）

念奴娇

井冈山

（一九六五年五月）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根据《毛泽东诗词集》刊印。
（有毛泽东手稿）

在国际关系研究所一份 内部材料上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日）

江青阅。这是一个研究所〔的〕分析，可一看。他们认为有可能马上打仗。我看也许如此，也许暂时还不会。一、二、三〔年〕之后才打，我们就有准备了。但我〔们〕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中央已作了决定^{〔2〕}了。

毛 泽 东

六月二日于杭州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一九六五年五月三日编印的《帝国主义动向》第十五期刊登的《从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越南问题上的争吵看美国扩大战争的动向》一文上。文章说：约翰逊政府在越南问题上所策划的各式各样的和谈阴谋已经一一破产，逐步扩大轰炸北越的战争讹诈一手也未收到预期效果。现在，是否要把轰炸扩大到河内、海防一线，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争吵大大地加剧起来。他们的争吵表明，约翰逊政府确确实实是在积极准备进一步扩大战争，打算同中国进行一场较量。但这一政策在国

内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也受到统治集团内部的很大压力，因此，约翰逊政府将加强“和谈”攻势，企图以此争取舆论，摆脱困境，为进一步扩大战争创造“政治资本”。同时在“和谈”攻势的掩盖下，继续加紧扩大战争的各种准备。估计美国目前暂时还不会把轰炸扩大到河内、海防一线，但对目前轰炸区域空袭的强度将进一步增加。

〔2〕决定，指一九六五年四月十四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四月十二日《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见本册第42页注〔1〕。

在《山西省农民讲习所 办得很好》材料上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六月七日）

江青阅。共四件^{〔2〕}，如精神好可以一看。

毛 泽 东

六月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九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一七三号刊登的《山西省农民讲习所办得很好》的材料上。材料说：去冬到今春，山西省为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贫农、下中农，进一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自觉性，发现和培养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积极分子和基层组织的骨干力量，在各县比较普遍地举办了农民讲习所。现在看来，举办这种讲习所效果很好。省内先后举办这种讲习所的县（市），有九十七个。截至今年三月底，共训练了九万二千九百零一名学员，每期学习时间为二十天左右。学习内容，是以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九评”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等十二篇文章为基本教

材。在春节以后，还普遍增加了“二十三条”的学习内容。学习方法是从学员的思想实际和当前阶级斗争实际出发，搞思想运动。整个思想运动分五个步骤：第一，报告当前国内外形势，明确学习目的，解除思想顾虑，调动学习积极性。第二，结合学习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文件，发动学员回忆诉苦、讲三史、议三史，明确阶级观点，调动阶级感情。第三，结合学习有关社会主义性质和树立贫下中农优势的文件，揭发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破坏活动及其危害，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界限，明确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提高认识，增强信心。第四，结合学习有关思想革命化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文件，照镜子，找差距，批判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提高争当革命接班人的自觉性、积极性。第五，总结学习收获，进行小组鉴定，巩固与扩大学习成果。学员主要是贫农、下中农，其他中农出身的学员约占百分之二左右。这种讲习所，在县里一般有一名县委常委领导，他们抓的关键，一是抓挑选学员，二是抓办学人员革命化。经过学习，学员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自觉性普遍有了很大提高，他们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已成为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成为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三大革命运动，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史，指家史、村史、社史。

〔2〕除《山西省农民讲习所办得很好》一件外，另外三件不详。

对《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文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一日）

康生、冷西同志：

此文^{〔2〕}已经看过，写得很好，照此发表。

毛 泽 东

六月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康生、吴冷西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报送《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这篇文章，我们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今天又作了一次修改。此文拟在十三日晚广播、十四日见报。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冷西，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和十五日，他的这两个职务被先后解除。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此文，指《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为纪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两周年写的《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文。文章说，两年来，中苏两党的公开论战和激烈斗争，主要是围绕着三个问题进行的：第一，是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反对革命的修正主义。第二，是联合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还是联合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对全世界人民。第三，是团结，还是分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历史上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从理论上的背叛发展到行动上的背叛，从在政治上搞分裂发展到在组织上搞分裂。赫鲁晓夫的下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胜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已经消失，并不意味着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可以结束。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四日，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和同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五年第七期发表。

给章士钊的信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行严^{〔1〕}先生：

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2〕}。今奉上桃杏各五斤，晒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之^{〔3〕}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行严，即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见《诗·卫风·木瓜》。

〔3〕含之，即章含之，章士钊的长女。当时是北京外国语学院老师。曾受邀在一九六四年任毛泽东的英语教师。

关于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问题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同医务人员谈话中的一句话。

对第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 两个文件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十日）

一

谢部长：

此两件^{〔2〕}都已看过，照此办理。会议如有好的意见，可以吸收。

毛 泽 东

六月二十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改了几句^{〔3〕}。退谢富治。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三

少数改造好、对生产建设有特殊贡献的犯人或刑满留场人员，像锦州电机厂搞出真空冶炼和电子轰击炉的工程师王灿文

(留场人员)这种人,可以减刑、提前释放或摘帽子,还可以给以工程师待遇或者其他适当的经济待遇。

四

主席讲,“天下太平,很好。天下大乱,也不见得是坏事。乱(指战争)有乱的极大好处,例如我党经历过二十五年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不算在内),还不是都打胜了。”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谢富治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报送他六月十一日在第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时所附信上的批语。信中说:会议期间,汪东兴同志曾两次传达主席对我们工作的指示,这是对我们这次会议的关怀,给全体到会同志的极大鼓舞。本篇二是毛泽东在谢富治一九六五年七月十日为送审中共中央转发第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两个文件的通知代拟稿给彭真的信上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对公安部党组七月九日的会后报告的第二个问题“加强改造工作”中的一段文字的修改。本篇四是毛泽东对谢富治的讲话记录稿第二个问题“备战”中的一段文字的修改。文中用宋体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谢富治的讲话就下列四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一)依靠群众专政,少捕,矛盾不要上交问题。(二)公安工作备战问题。(三)教会和反动会道门问题。(四)公安队伍的“四清”和政治工作问题。公安部党组的报告提出需要中央正式批准的几个具体问题:(一)关于捕人、拘留和劳动教

养的控制问题。（二）加强改造工作问题。（三）关于民警建设中的几个问题。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公安部党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内务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长。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谢富治的讲话和公安部党组的报告。

〔2〕此两件，一件指谢富治在第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另一件指中共中央防空委员会办公室整理的南宁、个旧、湛江三市动员群众挖防空洞、壕效果很好的材料。

〔3〕改了几句，修改内容见本篇三、四。

关于学校要减轻学生负担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

陆定一^{〔2〕}同志：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共青团中央办公厅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编印的《团的情况》（增刊）总第一五五期刊登的《北师大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一文上。文中说：据共青团北京市委反映，最近他们对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二年级一个班的调查发现，学生由于学习负担过重，体育锻炼运动量过大，课余活动过多，严重地影响了学生的身体健康。七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这年第五十一期《宣教动态》刊登了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和这篇文章。

〔2〕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 四十四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日）

乌兰巴托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在蒙古人民革命四十四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蒙古人民、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蒙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今后仍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同蒙古人民一起，为加强中蒙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

祝兄弟的蒙古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日
根据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一日
《人民日报》刊印。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给苏共中央、 苏联部长会议的复信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一日）

康生、冷西同志：

此件已阅，写得很好。

毛 泽 东

七月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康生、吴冷西一九六五年七月十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日给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的复信上。复信据理驳斥了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七日来信中对中方不同意举行越、中、苏三国最高级会晤所进行的攻击和诬蔑，指出：我们细心地观察了你们几个月来在越南问题上所进行的种种活动，认为你们在越南问题上，对美国实行绥靖主义，企图在政治上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交易，出卖越南人民解放事业的利益；对兄弟国家实行大国沙文主义，企图实行军事上的控制，把我们套在你们的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马车上。你们四月三日提出的举行越、中、苏三国最高级会晤的建议，就是贯彻你们这条路线的一个重要步骤。

复信还对苏方提出把分歧撇在一边、采取联合行动的说法进行了批驳，指出：你们所说的“联合行动”，就是要兄弟党服从你们老子党的命令，就是要兄弟党、兄弟国家成为你们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的工具。我们同你们的分歧，最根本的恰恰是要不要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支持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分歧。这样根本性质的分歧，怎么能撇在一边呢？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冷西，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对李宗仁回国问题的报告 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二日、十五日）

一

总理：

似以第二方案^{〔2〕}为较好，稿子^{〔3〕}事前商好，并无坏处。
请再酌。

毛 泽 东

七月十二日

二

总理：

你去上海是否多留几天，同李面商声明稿，并同机回北京。李回国，你似应到机场欢迎。^{〔4〕}

毛 泽 东

十五日早

根据手稿刊印。

三

可在上海住几天，商量好简短声明后，再来北京。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周恩来总理一九六五年七月九日报送的中共中央调查部同日《关于李宗仁回国有关问题的意见》上的批语。意见说：程思远于六月二十八日抵达瑞士，向李宗仁转达了在京所谈内容。李表示将在七月二十日偕其妻郭德洁同程思远一起经巴基斯坦回国。根据中央、主席指示，程思远劝李不要在欧洲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书面声明，可在回国后再考虑。李同意这个意见，但程思远建议，李一进国门就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并接见记者，说明回国原因和反帝爱国立场。我们意见，对此可考虑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李不必一进国门就发表声明，待回国商量后再发表声明；第二个方案，同意李一进国门就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并接见记者，但声明稿应事先报国内商妥。我们倾向采用第一方案。周恩来七月九日旁批，表示拟同意第一方案。本篇二、三分别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四日报送的中央调查部关于李宗仁回国后发表声明问题给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的电报稿上的批语和加写的话。其中，本篇三写在电报稿以下一段文字之后：“李回国后的简短声明稿，仍请李拟定告国内。如李认为需要抵沪商量后才好拟稿，也请李决定。”电报还要丁国钰转告李宗仁，国内原建议他不要在国外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发表声明，是为了他的安全。李宗仁，原国民

党桂系首领。一九四八年四月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引退后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国民党政权被推翻后，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去美国。程思远，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宗仁的秘书。

〔2〕第二方案，指中共中央调查部一九六五年七月九日《关于李宗仁回国有关问题的意见》中提出的第二个方案。参见本篇注〔1〕。

〔3〕稿子，指李宗仁的书面声明稿。

〔4〕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到达上海，周恩来在虹桥机场迎接。七月二十日李宗仁、郭德洁乘专机抵达首都机场时，先行返回的周恩来到首都机场迎接。李宗仁在首都机场发表声明说：“我已经从海外回到人民祖国的怀抱里来了。此行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方照顾，感激良深。当飞抵北京机场之际，又受到热烈的欢迎，内心激动，尤难自己。谨借此先向党和国家领导人表示由衷恳切的谢意，并述个人愿望和感触以告国人。”“十六年来，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我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高举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成功地爆炸了两颗原子弹。这都是我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成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今后惟愿尽人民一分子的责任，对祖国革命建设事业有所贡献，并望能在祖国颐养天年，于愿已足，别无他求。谨布荅忱，敬祈垂察。”七月二十一日，这个声明题为《李宗仁声明》，在《人民日报》发表。

关于绘画使用模特问题 的批语和批注^{〔1〕}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一

定一、康生、恩来、少奇、小平、彭真^{〔2〕}同志：

此事应当改变。画男女老少裸体 Model^{〔3〕} 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齐白石、陈半丁^{〔4〕}之流，就花木而论，还不如清末某些画家。

中国画家，就我见过的，只有一个徐悲鸿^{〔5〕}留下了人体素描。其余如齐白石、陈半丁〔之〕流，没有一个能画人物的。徐悲鸿学过西洋画法。此外还有一个刘海粟^{〔6〕}。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央美术学院教师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关于美术院校使用模特问题给江青的信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在这封信末尾处的批注。信中说，关于使用模特问题，我们从油画专业出发，提出几点意见：（一）资产阶级艺术教育体系必须彻底批判。模特写生是资产阶级艺术教育体系中技术训练体系的核心。因此，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废除模特制的决定的基本革命精神是可以理解的。（二）在党的文艺教育方针指导下，必须逐渐完备无产阶级艺术教育体系，建立一套新的和它相适应的技术训练体系。模特写生，作为解决美术基本功的初步训练方法，是可以批判地继承的。（三）美术创作是以表现工农兵斗争生活、表现人物为主的。对真人（模特）写生是美术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方法。它不只解决描写人物的写生能力，而且也可以有助于解决一般的写生规律。在新的技术训练体系中，不宜排斥人物写生，不宜排斥课堂作业，不宜排斥少量的人体写生。男女人体都应该在技术训练中占少量的比例。（四）从废除模特制以后，在教学活动中，已经遇到了不少困难，应届毕业生的创作质量有可能因此受到影响。据我们所知，美术学院不少教员和学生也都为此而担心。因此，我们建议在美术学院“四清”运动第四阶段中，用毛泽东思想、用真正彻底革命的精神，用和旧传统决裂的精神，发动群众对使用模特问题进行民主讨论，以求得妥善的解决，把新的艺术教育体系稳步地建立和完备起来。

〔2〕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恩来，即周恩来。少奇，即刘少奇。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市长。

〔3〕 Model，英语单词，汉语一译“模特儿”。

〔4〕 齐白石，画家。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一九五七年九月去世。陈半丁，画家。当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中国画院副院长。

〔5〕 徐悲鸿，画家、美术教育家。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一九五三年九月去世。

〔6〕 刘海粟，画家。当时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

给章士钊的信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行严^{〔1〕}先生：

各信及指要^{〔2〕}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3〕}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4〕}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5〕}上部，盼即寄来。敬颂
康吉！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行严，即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指要，指章士钊所著《柳文指要》。这是一部专门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文集的著作。一九七一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3〕评郭文，指江苏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这篇文章，对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

〔4〕郭老，指郭沫若，历史学家、文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毛泽东的秘书。

〔5〕柳文，指章士钊所著《柳文指要》。

给郭沫若的信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郭老^{〔1〕}：

章行严^{〔2〕}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3〕}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4〕}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敬颂安吉！并问立群^{〔5〕}同志好。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郭老，指郭沫若，历史学家、文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2〕章行严，即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3〕一文，指江苏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文章对郭沫若在《文物》杂志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发表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提

出不同意见。同年七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发表高二适的驳议文章。随后，郭沫若又在《文物》杂志同年第九期发表《〈驳议〉的商讨》、《〈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篇文章，对高二适的驳议提出反驳。

〔4〕信，指毛泽东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复章士钊的信。见本册第87页。

〔5〕立群，即于立群，书法家。郭沫若的夫人。

对刘少奇关于转发湖北 九个材料及所写指示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九日）

少奇同志：

九件材料^{〔2〕}及你所写指示^{〔3〕}，都已看过，很好，照发。

毛 泽 东

七月十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刘少奇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一日关于转发湖北孝感的九个材料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王任重从孝感寄来九个材料，每个材料都不长。我看都很重要，对“四清”运动后县、区、社、队如何进行工作、如何精简机构和人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具体做法。是否可以转发各地参考，以便各地党委都来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附在后面，请主席批示。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2〕九件材料，指湖北孝感县县直社教分团、卧龙区区直工作队和卧龙公社群益大队工作组一九六五年五月至七月分别总结整理的九个材料：（一）《湖北孝感县组织县委工作队的情况和作法》。

(二)《湖北孝感县卧龙公社配备半脱产干部的情况和作法》。(三)《湖北孝感县卧龙区区、社干部实行轮流值班、轮流蹲点的情况和作法》。(四)《湖北孝感县卧龙区直精简机构的初步方案》。(五)《湖北孝感县卧龙区清理区、社干部带家属住机关的情况和作法》。(六)《湖北孝感县卧龙公社群益大队实行大队干部轮流值班的情况和作法》。(七)《湖北孝感县卧龙公社群益大队建立贫下中农核心小组的情况》。(八)《湖北孝感县卧龙公社群益大队财务公开的情况和作法》。(九)《湖北孝感县卧龙公社群益大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

〔3〕指示，指刘少奇为转发湖北孝感的九个材料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改进领导方法问题的指示——批转王任重同志报来的九个材料》稿。指示稿说：“在‘四清’运动后，县、区、社、队如何进行工作，如何精简机构和减少脱产人员，是普遍存在的重要问题，必须认真地切实地加以解决。王任重同志从孝感县寄来的这九个材料，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具体作法，现将这九个材料发给各地参考，望各地党委都来认真地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领导干部到基层单位蹲点，了解真实情况，取得解决问题的经验，然后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解决面上的问题。这是领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方法，也是领导其他各项工作的重要方法。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今后的各项工作中，经常地坚持这种领导方法，改变主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为了改进领导方法，各级领导干部应当重新学习毛主席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那篇文章。现在联系实际来学习那篇文章，会有更深刻的体会。”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印发这个指示和湖北孝感的九个材料。

给人民大会堂服务员 高殿英的题词^{〔1〕}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

好好学习，努力为人民服务。

毛 泽 东

高殿英同志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在高殿英学习雷锋的笔记本上的题词。

给陈毅的信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陈毅^{〔1〕}同志：

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2〕}善七律，董老^{〔3〕}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西 行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
海酿千钟酒，山裁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其余不能改了。

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4〕}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5〕}，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6〕}，“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7〕}。韩愈^{〔8〕}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

《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又，李白^{〔9〕}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10〕}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祝好！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他写了很多诗词。其中，一九七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毅诗词选集》，一九九三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陈毅诗词全集》。

〔2〕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他写了很多诗词。其中，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远望集》，一九九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叶剑英诗词选集》。

〔3〕董老，指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他写了很多诗。其中，一九

七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董必武诗选》。

〔4〕杜甫，唐朝诗人。

〔5〕见朱熹《诗集传·周南·葛覃》。

〔6〕见朱熹《诗集传·周南·螽斯》。

〔7〕见朱熹《诗集传·周南·关雎》。

〔8〕韩愈，唐朝文学家、哲学家。

〔9〕李白，唐朝诗人。

〔10〕李贺，唐朝诗人。

给华罗庚的信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华罗庚^{〔1〕}同志：

来信及《平话》^{〔2〕}，早在外地收到。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听说你到西南视察，并讲学，大有收获，极为庆幸。专此奉复。

敬颂

教安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华罗庚，数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兼应用数学系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2〕《平话》，指华罗庚一九六五年六月六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统筹方法平话》一文。随后经修改补充成书，书名定为《统筹方法平话及补充》，由中国工业出版社一九六五年出版。这是一本数学普及读物。书中介绍的统筹方法应用范围广泛，是一种科学利用时间、提高工作效率、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数学方法。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国庆 二十一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华沙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爱德华·奥哈布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

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二十一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向你们和波兰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一向关怀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和平所进行的斗争，对于波兰人民在这一斗争中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感到无比高兴。我们把你们的成就看作是自己的成就。

我们两国人民一向存在着深厚的友谊，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保持着不断的发展。我们希望，中波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们愿借此机会重申，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地坚决支持波兰人民反对西德^{〔1〕}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

祝波兰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祝中波两国人民的友谊与日

俱增。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根据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简称。

对首批援越高炮部队 开赴越南问题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瑞卿同志：

此信看过，照办。

毛 泽 东

七月二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罗瑞卿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关于首批援越高炮部队开赴越南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说：援越部队两个高炮师拟应越方请求，于八月一日由两个方向进入越南。另，为增强越南北方北线铁路的防空力量和锻炼部队，在北线加了一个五七高炮团。报告最后说：此事已报告刘主席、总理并彭真同志，他们同意。主席如有指示，请批示。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兼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刘主席，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总理，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毛泽东等祝贺古巴人民 武装起义十二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哈瓦那

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

古巴共和国总统奥斯瓦耳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同志：

在古巴人民庆祝武装起义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兄弟的古巴人民、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和古巴革命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

十二年前古巴人民发动的七月二十六日武装起义，开辟了古巴人民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革命胜利以后，古巴人民坚持斗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政策，保卫了自己的祖国和革命的果实，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古巴人民的革命和胜利，两个哈瓦那宣言^{〔1〕}的革命精神，鼓舞了拉丁美洲人民争取解放的斗志和信心。现在，拉丁美洲人民反美帝、反独裁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正在走向新的高涨。

中古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是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锻炼成长的，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基础上的，是经得住考验的。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中，中国人

民将永远同古巴人民相互支持，共同前进。

祝古巴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祝中古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根据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两个哈瓦那宣言，一个是，针对美国控制的美洲国家组织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八日第七次外长会议通过企图扼杀古巴革命和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的《圣约瑟宣言》，古巴政府于同年九月二日在哈瓦那举行全国人民大会通过的《哈瓦那宣言》。这个宣言谴责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干涉和控制，谴责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并宣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另一个是，针对美国强迫美洲国家组织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第八次外长会议通过把古巴排除在泛美体系之外的决议，古巴政府于同年二月四日在哈瓦那举行第二次全国人民大会通过的《第二个哈瓦那宣言》。第二个宣言谴责美国对拉丁美洲人民的奴役、掠夺和武装侵略，号召拉美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革命的胜利。

给于立群的信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立群^{〔1〕}同志：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六日你给我的信^{〔2〕}，以及你用很大精力写了一份用丈二宣纸一百五十余张关于我的那些蹩脚诗词，都已看过，十分高兴。可是我这个官僚主义者却在一年之后才写回信，实在不成样子，尚乞原谅。你的字好，又借此休养脑筋，转移精力，增进健康，是一件好事。

敬问暑安！

并祝郭老^{〔3〕}安吉！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立群，即于立群，书法家。郭沫若的夫人。

〔2〕 于立群在信中说：“今年是建国十五周年。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国庆节日，我把主席诗词三十七首用大字写了一份，计用丈二宣纸一百五十余张，打算作为向党和主席的献礼。”

〔3〕 郭老，指郭沫若，历史学家、文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同李宗仁和夫人的谈话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 毛泽东主席今天中午接见李宗仁^{〔1〕}先生和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

毛主席同李宗仁先生及其夫人热烈握手。

毛主席说：你们回来，很好，欢迎你们。

李宗仁先生说：我们回来后都为祖国的强大感到高兴。

毛主席说：祖国是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还得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李宗仁先生对毛主席说，在海外的许多人士都怀念祖国，他们渴望回到祖国来。

毛主席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毛主席建议李宗仁先生到全国各地去看看。

根据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人民日报》新闻稿刊印。

注 释

〔1〕李宗仁，原国民党桂系首领。一九四八年四月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引退后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国民党政权被推翻后，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去美国。李宗仁偕夫人郭

德洁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三日飞离美国到欧洲，再经中东到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于七月十八日回国到上海，二十日到达北京。

关于确认毛泽民出生年月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质忠同志：

你想错了。毛泽民是我的二弟，少我两岁。

毛 泽 东

七月二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质忠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我在新疆看了烈士陵园，其中毛泽民同志出生年月是一八九五年六月。在我的记忆中泽民同志比主席大一点。是否有误，请主席指示。毛泽民，毛泽东的大弟弟。生于一八九六年四月三日。一九二一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银行行长、闽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曾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厅长、民政厅厅长。一九四三年九月，被盛世才杀害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对中央转发谷牧《关于设计革命运动的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退彭真。

已经看过，此件^{〔2〕}很好。但似应发到地委、中等工业〔城市〕市委以及重要工厂党委。各大小设计院都要印发。请酌定。^{〔3〕}

毛 泽 东

七月二十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彭真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批转谷牧《关于设计革命运动的报告》的通知上。彭真在附信中说：这份报告批发的时候，你正害感冒，未专送阅。不知已否阅过。通知说：设计是基本建设一个决定性的环节。只有实现设计工作的革命化，认真做好设计工作，才能更好地完成日益繁重的基本建设任务。全国各设计单位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展了群众性的设计革命运动。半年多来，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并且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设计革命运动的做法是：放手发动群众，

充分发扬民主，领导带头检查，主动承担责任，启发设计人员自觉革命；并且运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总结经验教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同时组织设计人员下楼出院，深入现场，联系实际，同工农群众相结合，促进思想革命化，改进工作作风，最后把思想革命落实到设计工作的改革上去。中央认为，在知识分子集中的部门，采用这种办法来进行“四清”运动，是一个比较好的、成功的经验。这种做法可供文化、教育、卫生、科学研究等部门参用。这个通知和谷牧的报告，中共中央发至省军级党委。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谷牧，当时任中共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书记、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2〕此件，指谷牧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六日在全国设计工作会议上作的《关于设计革命运动的报告》。报告讲了四个问题：（一）当前设计革命运动的情况。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日，毛主席发出关于开展群众性的设计革命运动的号召，这是我国设计工作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情。毛主席的号召，调动了全国二十多万设计人员的积极性，很快就在全国各设计单位形成了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的高潮，设计工作战线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1）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2）正在形成一种革命化的新作风。（3）开始进行规章制度的改革。（4）设计革命已经取得初步成果。（二）设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1）贪大求全；（2）许多建筑设计不符合勤俭建国的方针；（3）因循保守，不重视采用新技术；（4）缺乏战争观念；（5）设计方法繁琐，效率低，周期长，影响了建设进度。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有苏联的“框框”问题、有资产阶级设计思想的“框框”问题、有设计队伍的作风问题，也有我们领导上的问题。从领导工作的角度看，有以下几条经验教训：（1）我们过去对设计

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没有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重要战线。(2)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认识到用毛泽东思想去占领设计工作阵地的深刻意义，使设计工作严重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3) 没有认真总结设计工作的经验教训，至今还没有开创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设计工作的道路。(4) 设计部门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对于这一特点认识不足，领导工作一般化。(5) 对各设计院的具体领导也很不够。(三) 这次设计革命运动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1) 政治挂帅问题，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的问题。(2) 设计工作的作风问题，也就是树立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革命化的作风问题。(3)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4) 整顿设计队伍问题。(5) 健全领导班子问题。(四) 设计革命和“四清”运动的关系，以及运动下一步的做法。

〔3〕根据毛泽东的批语，中共中央一九六五年十月三日发出关于扩大印发中央批转谷牧同志《关于设计革命运动的报告》的通知，要求将中央六月十四日的通知和谷牧三月十六日的报告印发给所属地委、中等工业城市市委、大城市区委、各大中工厂党委和各大设计院学习和研究执行。

对一篇谈李宗仁回国问题的材料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七月）

此人谈得不错，海人〈外〉许多人都想回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调查部一九六五年七月三十日编印的《调查通报》第八七二号刊登的台湾一位人士认为李宗仁回国是毛泽东“爱国不分先后”号召的胜利的材料上的批语。材料说：这位人士曾就李宗仁回国事，私下与人长谈。他说，李宗仁回国，是共产党统战政策的一次胜利，是毛泽东“爱国不分先后”这个动人号召的胜利，影响无疑是很巨大而又深远的。李宗仁这个抉择，聪明而正确。他的勇气是应该佩服的。从个人出处说，“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做给蒋介石看，也可以泄一下多年的积恨。从大处看，中共政权坚如磐石，回去还有什么不安全？就是个人的身后历史，最后还可以得到弃暗投明的褒扬。老实说，我是同情李宗仁的，他下此决心并不容易。据我观察，李宗仁这次回去，是他多年苦闷、徘徊、观望、等待的结果。香港、台湾都有许多不得意于蒋家王朝的人，这些都是大大小小的李宗仁，他们看到李的行动及北京的反

应，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不过条件未熟、时机未至，不能有所表示而已。这些不得意的人，因李回去引起不同程度的动摇，“李能为之，我亦能为之”。不过，台湾人士不易有所行动，非待蒋死后不可。香港则不同，他们动摇之后，就会有新的想法。下次章士钊来港时，可做的文章就多了。李回去影响大且深远，其意义即在此。我一向骂共产党，但现在内心也不得不佩服共产党。共产党有办法，是留港许多朋友的公论。数天下人物，毛泽东确是第一人。李宗仁，原国民党桂系首领。一九四八年四月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引退后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国民党政权被推翻后，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去美国。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三日飞离美国到欧洲，再经中东到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于七月十八日回国到上海，二十日到达北京。

对《“四清”工作队员的 一些意见》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八月一日）

少奇^{〔2〕}同志阅后，寄福建省委叶飞^{〔3〕}同志：

这个问题值得注意，你们是如何部署的，盼告刘少奇同志和我。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八月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五十一期上。这一期刊登的《“四清”工作队员的一些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点：（一）运动时间拖得太长。福建南安县一个队员反映，他们那里的运动已有九个多月。经过运动，该县面貌已根本改观，生产形势很好，新的领导核心也建立起来了。但是省委有些领导人还说，搞运动不要受时间限制，似乎时间拉得越长，运动就越彻底，使工作队员感到遥遥无期。（二）工作队员体质普遍下降。福建南安县一些工作队员反映，由于长期生活比较艰苦，最近两个月来工作队病号突增，约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

十以上。许多人已躺倒不能工作了。大部分是水肿、肝病、胃病，营养极度缺乏。（三）农忙季节不宜搞“四清”。浙江省委工作团一队员反映，目前已到夏季大忙季节，可是这里的“四清”运动还在进行。群众不止一次地向工作组反映：“农忙时间，生产这么紧张，夜晚哪里熬得了！”“最好农忙季节不要搞，到农闲再搞。”工作队员也很疲劳，入夏以来，大家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来信建议，农忙时期不要搞“四清”运动，要关心工作队员的劳逸结合，准许体弱有病的同志回去调换。

〔2〕少奇，即刘少奇。

〔3〕叶飞，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关于查找杜牧全集的便条^{〔1〕}

（一九六五年八月一日）

找唐人杜牧之全集给我为盼。

毛 泽 东

八月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便条是写给身边工作人员的。杜牧，字牧之，号樊川，唐朝文学家，著有《阿房宫赋》、《樊川文集》。

对卫生部党委《关于进一步改革北京医院工作的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日）

请书记处处理。

毛 泽 东

八月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卫生部委员会一九六五年八月一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关于进一步改革北京医院工作的报告》上。报告说：今年六月二十六日，主席对卫生部提出了严格的批评。目前，我们正在根据主席的批评和刘少奇、周恩来等的指示，检查我们的错误，并研究制定把卫生工作重点转向农村的措施。现就北京医院的进一步改革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一）彻底改变北京医院的性质，取消北京医院的名称，改称东单医院。取消该医院专门承担高级干部及高级干部家属医疗的任务。今后，该院和市内其他医院一样，完全向群众开放，并负责划区公费医疗任务。（二）集中在原北京医院的高干及高干家属医疗任务，今后根据划区原则，分别由包括东单医院在内的各个划区医院负担。今后，还拟加强和增设市区门诊部，

负责群众和干部的医疗工作。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报告转发给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门并告总政治部，要求各地区对于类似北京医院的这种老爷医院，必须同样进行改革，纠正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

给康生的信

（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

康生^{〔1〕}同志：

章士钊^{〔2〕}先生所著《柳文指要》^{〔3〕}上、下两部，二十二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大抵扬柳^{〔4〕}抑韩^{〔5〕}，翻二王、八司马^{〔6〕}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7〕}而颂阳湖^{〔8〕}，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八十五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章士钊，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3〕《柳文指要》是一部专门研究柳宗元文集的著作。一九七一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4〕柳，指柳宗元，唐朝文学家、哲学家。

〔5〕韩，指韩愈，唐朝文学家、哲学家。

〔6〕二王，指王叔文、王伾。王叔文在唐顺宗时任翰林学士，联合翰林学士王伾等人进行政治改革。改革失败后，王叔文被杀，王伾遭贬。八司马，指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他们支持唐顺宗进行政治改革，失败后八人均被贬为远僻地方的司马，故有八司马之称。

〔7〕桐城，指桐城派，清朝散文流派。由方苞开创，其后，刘大櫆、姚鼐等又进一步加以发展。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名。他们主张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古文家韩愈、欧阳修等人的作品，讲究“义法”，要求语言“雅洁”。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初期一直绵延至清朝末年；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全国。

〔8〕阳湖，指阳湖派，清朝散文流派。由恽敬、张惠言等开创。恽为江苏阳湖（今武进）人，后继者亦多同县人，故名。他们源于桐城派，但对桐城派古文的清规戒律有所不满；作文取法儒家经典，而又参以诸子百家之书。文学史家有把阳湖派看作是桐城派的旁支。

关于办好学校问题的意见^{〔1〕}

（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

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样，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来决定。

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会见以教育部部长贡特·塞杜为首的几内亚教育代表团和几内亚总检察长法迪亚拉及夫人时谈话的一部分。

关于查找韩昌黎全集的便条^{〔1〕}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日）

韩昌黎全集找来一阅。

毛 泽 东

八月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便条是写给身边工作人员的。韩昌黎，即韩愈，唐朝文学家、哲学家。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后人编有《昌黎先生集》，共四十卷，计诗赋十卷、文三十卷。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 二十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四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
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
健同志：

在朝鲜解放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
和中国人民，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
人民，致以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二十年前，英雄的朝鲜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终于摧毁了
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获得了民族解放。二十年来，朝鲜人民
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
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保卫祖国独立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
利；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高举千里马运动的旗帜，坚持自力
更生的革命精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民对于兄弟的朝鲜人
民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感到无比的高兴。

中朝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和战斗友谊，是在长期革命的共同斗争
中用鲜血凝成的。这种团结和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

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是久经考验、牢不可破的。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朝鲜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争取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共同斗争，携手前进。

祝朝鲜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祝中朝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和战斗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四日

根据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五日

《人民日报》刊印。

对李先念关于纠正一些地区 粮食征购任务过重问题 的报告^{〔1〕}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五日）

先念同志：

“还须下一番苦功夫”，你的意见^{〔2〕}很对。请你在这几年内抓紧检查督促，务必达到藏粮于民的目的，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彭真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编印的《群众反映》第五十二期刊登《有些地区粮食征购任务过重》的材料上。这个材料说：最近，我们收到吉林、黑龙江、陕西、河南、江苏等省十封群众来信，反映今年夏粮虽然丰收了，但是有些地方由于国家粮食征购任务年年增加，增产增购，增产不能多留，还下达了预增夏粮顶秋粮的任务，使部分社员生活

发生困难，以致影响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彭真在报送的这个材料上批示：请中央办公厅或农办派人去了解一下，果系事实必须坚决纠正。李先念看到彭真的批示和这个材料后，一九六五年八月二日写了关于纠正一些地区粮食征购任务过重问题的意见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的报告。报告说：《群众反映》第五十二期反映某些地区粮食征购任务过重问题，我们即按照彭真同志的批示，立即协同中央办公厅或农办派人下去了解，查明情况，坚决纠正。主席关于藏粮于民的指示，我们坚决贯彻执行，具体办法正在研究中。“初步打算今后几年内把粮食征购任务稳定下来。”“今年五月全国财贸工作会议上已经议了一条：‘在具体分配各专县、各生产队粮食征购任务的时候，各省、市、自治区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畸轻畸重的，要进行调整，做到公平合理。’看来，要达到公平合理的要求，还须要下一番苦功夫。”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财政部部长。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你的意见，指李先念一九六五年八月二日在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的报告中提出的关于纠正一些地区粮食征购任务过重问题的意见。参见本篇注〔1〕。

对击沉国民党军剑门号、章江号 两舰战斗经验总结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五日）

已阅。退林彪^{〔2〕}同志。

毛 泽 东

八月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李作鹏、吴瑞林、方正平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关于击沉国民党军剑门号、章江号两舰战斗经验的总结报告上。报告说：这次战斗是近几年来海上作战最大的一次胜利，取得胜利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军委、总参和广州军区首长正确的指挥，决心果断，兄弟部队的大力支援、民兵的密切配合。参战部队充分发挥了人的因素，发扬了我军英勇顽强，近战、夜战的优良战斗作风，贯彻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的思想。这次战斗的胜利也证明了小艇不仅能够打大舰，而且也能够击沉敌舰。同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接见了这次战斗的有功单位、有功人员的代表。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打得好。”“蚂蚁啃骨头，我们向来就是用这种方法消灭敌人的。”李作鹏，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

令员。吴瑞林、方正平，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司令员、政治委员。

〔2〕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关于军队干部参加地方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七日）

少奇^{〔2〕}同志阅后，退还罗瑞卿同志。

请军委讨论一下：（一）此件可否发到全军参考；（二）全军从排长以上，除年老、重病者外（像郭化若^{〔3〕}那样的病人，也去浙江搞了一期社教，大有好处，他给了我一个报告，总结了十条经验^{〔4〕}，现送给你们一阅。我看也可以转发一下，以供老同志参考。这位同志的思想，几十年来，同我总是有些格格不入。现在我看他是通了），一律分期，在两年内（可分四期，每期半年，全军搞完），都到地方参加社教工作。以上是否可行，请你们研究决定。

请用电告林彪^{〔5〕}同志。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罗瑞卿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三日报送的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七月二十二日给罗瑞卿并报总政治部、

国防科委、黑龙江省委的《关于学员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上。报告说：遵照毛主席关于必须学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的指示，我院组织应届毕业学员和干部一千零七十二人，于去年十一月下旬至今年六月底，参加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地区阿城县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中，大家坚持“三同”、“四清”，认真完成各项任务，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绝大多数同志表现很好，无论在自我思想改造还是在开展工作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通过运动，学员们不仅增强了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阶级感情上有了鲜明的变化，而且在思想方法、政策水平、群众工作和社会活动能力上也都得到了提高。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兼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少奇，即刘少奇。

〔3〕郭化若，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4〕十条经验，指郭化若一九六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关于在浙江萧山县靖江人民公社黎明大队参加五个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总结的十点体会。主要内容是：（一）听主席的话，照主席的指示办事，主席号召下乡就下乡，改正过去不大听话的错误。（二）看看十五年来农村新面貌，向接近实际迈出第一步。（三）接近贫下中农群众，复热了阶级感情，稍减些脱离群众的危险。（四）走上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前线，参加一次阶级斗争，在斗争中得到锻炼，有助于自己的思想改造。（五）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一个普通劳动者身份同贫下中农一起在农田里愉快地劳动，亲切地交谈，群众把我们看成自己人了。从中真正理解到劳动不但是愉快的，也是生活所必需。（六）可以学到生产斗争的经验，“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处处向贫下中农请教，可以学到许多生产

知识。(七) 得到一次实习机会，参加人民公社五年建设规划的草拟工作，这里面有许多是坐在办公室里想象不到的问题。(八) 可实地向地方同志学习，这次学到地方工作同志许多优良作风，也初步了解一点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情况。(九) 对干部好作交代，取得了发言权，不是“空口讲白话”。由各单位调来编写战役学的同志听到我下乡蹲点都很关心，他们说：“他能下乡蹲点，我们更应该去。”蹲了点回去，对部队社会主义教育也将有帮助。(十) 好向子女交代，以身作则，对他们也有了发言权。学了一点阶级斗争，好在家庭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以补学校教育不足之处。

〔5〕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对中央转发谭震林所送 四份材料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日）

退少奇同志，照办。

毛 泽 东

八月二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刘少奇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三日报送的谭震林关于要求转发四份材料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上。谭震林要求转发的四份材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九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四十七期刊登的《有些地方违反“六十条”的规定》；一九六五年八月二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五十五期刊登的《有关违反“六十条”的情况》；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四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二四五号刊登的《部分地区夏荒情况》；中国农业银行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整理的《关于部分地区在筹集水电资金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材料摘登了辽宁、河南、河北、浙江、福建、甘肃、新疆、黑龙江、江西、山东等地的群众来信，主要反映有些县、区、社和生产大队违反“六十条”的规定，随便

没收社员的自留地、开荒地，强行砍掉开荒地的庄稼，没收社员的自留牲畜，有的地方还提出将生产队核算改为大队核算或联队核算，有些地方在筹集水电建设资金上硬性向社员摊派集资任务等，已引起部分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思想混乱。刘少奇在附信中说：谭震林要求将这几份材料转发各地，我意可以同意，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后，这四份材料加上中共中央的批语（题为《关于当前农村工作问题的指示》）作为中央文件，于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发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委、地委、县委。中央指示指出：这些材料，都是反映当前农村工作在一个方面发生的一些问题的。请你们检查一下，如有这类情况，迅即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和防止这类现象的继续发生。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主任。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 二十一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基伏·斯托伊卡同志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扬·格奥尔基·毛雷尔
同志：

在罗马尼亚解放二十一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罗马尼亚人民、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罗马尼亚政府的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以高涨的热情，团结一致，辛勤劳动，在工业、农业、科学和文化各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最近，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进一步繁荣罗马尼亚的五年计划和十年电气化计划，展示了罗马尼亚发展的光辉前景。我们深信，罗马尼亚人民在实现新的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中，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从胜利走向胜利。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罗马尼亚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罗马

尼亚政府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捍卫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进行了巨大的努力。

中罗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战斗友谊。我们两国的关系，是符合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则的，是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的、平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关系。我们高兴地看到，我们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深信，中罗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根据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人民日报》刊印。

对《湖南各级社教领导机构实行革命化》材料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少奇^{〔1〕}同志：

此件^{〔2〕}有些新鲜办法，可以纠正过去一些缺点（如一个大省的各级社教办公室，竟有一万工作人员），大概各地也有类似情况。请你考虑，是否可以通知一下。

毛 泽 东

八月二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少奇，即刘少奇。

〔2〕 此件，指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二九九号刊登的《湖南各级社教领导机构实行革命化》的材料。材料说：湖南省第二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要开始了。这一期铺开的面大，工作队员相对地减少了，包括企事业单位的工作队和各级社教办公室在内，平均每个大队只有八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避免烦琐哲学，使工作队集中精力做好工作，省委农村社教办公室经与各地同志研究后，提出如下几点意见：（一）取消一切

不必要的表报。(二) 不要抽工作队的人员参加各部门的会议。(三) 尽量压缩社教简报。(四) 简化报批、立案手续。(五) 大力减少社教办公室的人员和事务。今后支援社教地区的粮食、棉布、化肥、农药、款物等一律由各级政府部门办理，日常经济工作应由省、地、县、区、社原有机构去领导。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批语和《湖南各级社教领导机构实行革命化》的材料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各重点县社教工作团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党委，军委总政治部，要求他们参照湖南的办法，纠正各级社教领导机构所存在的一些缺点。

给钟学坤^{〔1〕}的题词

（一九六五年八月三十日）

学习白求恩^{〔2〕}，
学习雷锋^{〔3〕}，
为人民服务。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八月三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钟学坤，原是庐山疗养院护士。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曾在毛泽东处做保健工作。毛泽东的题词写在她的日记本上。

〔2〕 白求恩，即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员、医生。一九三八年初来中国帮助抗日战争，三月底到达延安，不久赴晋察冀边区工作。因给伤员施行急救手术受感染，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河北唐县逝世。

〔3〕 雷锋，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工程兵第十团运输连班长。一九六二年八月因公牺牲。

在中组部《关于在南方各省区培养 提拔本地领导干部问题的报告》 上加写的文字^{〔1〕}

（一九六五年八月）

北方老干部在南方的革命和建设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这点必须肯定。但在提拔新干部问题〔上〕注意不够，现在应当改变这种情况。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彭真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报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八月二十一日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上加写的文字。报告说：最近，中央和毛主席指出，南方好多地委和县委书记都还是南下的北方老干部，新生力量提拔得很慢，已经十五六年了，还提拔不起来，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应该把这些南下的北方老干部分期分批地调整一些到其他适当的工作岗位上或者调一部分回北方。应该坚决地放手地逐步提拔那些本地的优秀干部到县、地以及省的领导岗位上来加以培养和锻炼。在最近召开的各中央局组织部长座谈会上，我们讨论了南方各省区培养提拔本地领导干部的问题，提出了

以下几点意见：（一）各级党委要认真讨论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正确领会主席指示的精神，大力培养、大胆提拔本地干部中的新生力量。要制定培养提拔的具体计划，并且要一个一个地落实到人。（二）培养提拔本地领导干部，要同“四清”运动、同调整领导班子结合起来。提拔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地、县委正副书记和正副专员、县长。首先解决县一级的的问题，争取在两三年内基本完成。地专一级时间可放长一些。（三）在培养提拔本地领导干部的时候，对北方籍的领导干部要作适当调整。（四）对南下的北方籍干部中一些年老体弱、长期患病、丧失或基本丧失工作能力的，需要予以妥善安排。他们多数应当就地安排，少数必须回北方的，可以回北方妥善安排。（五）各有关地区党委必须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和组织工作。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做，不要搞突击，不要呼拉拉一下换，避免影响工作、影响团结。本篇加写的这段文字，写在中央组织部这个报告中以下文字之后：“应该坚决地放手地逐步提拔那些本地的优秀干部到县、地以及省的领导岗位上来加以培养和锻炼。”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 成立二十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

河内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兄弟的越南人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二十年前，英雄的越南人民，在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斗争，赢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越南历史上没有过的人民自己的国家——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以后，越南人民高举革命的旗帜，继续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并在越南北方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民从兄弟的越南人民的胜利斗争中获得巨大鼓舞，并为他们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目前，越南人民正在抗击着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英勇地进行着抗美救国的伟大斗争。这场斗争，不仅是为了保卫越南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也是全世界

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共同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越南人民坚强地屹立在反美斗争的最前线，狠狠地打击、削弱和牵制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力量和战争力量，从而也就有力地支持了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保卫和平的革命斗争。

现在，在越南战场上，英勇善战的越南人民越战越强；美帝国主义不断遭到失败。美帝国主义的纸老虎面目已经被英雄的越南人民进一步戳穿。越南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衷心赞扬和钦佩。全世界人民都站在越南人民一边，同情和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坚信英雄的越南人民必能击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社会主义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情同手足的亲密战友。越南人民的斗争是对中国人民的巨大支持。中国人民坚决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中国人民已经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决心同越南人民一道，为挫败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并肩斗争到底。

祝越南人民在保卫北方、解放南方、争取祖国统一的伟大斗争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祝中越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

根据一九六五年九月二日

《人民日报》刊印。

对胡乔木二十七首词稿 的批语和批注^{〔1〕}

（一九六五年九月五日、十五日）

一

康生^{〔2〕}同志转乔木同志：

这些词^{〔3〕}看了好些遍，是很好的。我赞成你改的这一本。我只略为改了几个字^{〔4〕}，不知妥当否，请你自己酌定。先登《红旗》，然后《人民日报》转载^{〔5〕}，请康生商伯达、冷西^{〔6〕}办理。

毛 泽 东

九月五日

二

康生同志转乔木同志：

删改得很好，可以定稿。我又在个别字句上作了一点改动^{〔7〕}，请酌定。另有一些字句，似宜再思再改^{〔8〕}。如不妥，即照原样。唯“南针仰”一句须改^{〔9〕}。

毛 泽 东

九月十五日上午三时

根据手稿刊印。

三

有些地方还有些晦涩^{〔10〕}，中学生读不懂。

唐、五代、北宋诸家及南宋每〈某〉些人写的词，大都是易懂的。

四

要造新词，天堂、霓裳之类，不可常用。^{〔11〕}

五

改得好^{〔12〕}。

六

好句^{〔13〕}。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胡乔木送阅、经康生修改的二十七首词稿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在胡乔木一九六五年九月十日为送阅诗词二十六首给康生的信上的批语。信中说：词二十七首本多仓卒之作。经主席修改后，我又作了一些修改，并拟删去其中的《定风

波·读报》四首（平淡而又过时，改不好）和《生查子·家书》六首中的后两首（有些酸气）。另外，最近写了律诗五首，想补在后面，虽也有些晦涩，但在时间上较新鲜些，不知可用否？请一并阅正，并代转主席为荷。本篇三是毛泽东一九六五年九月五日在《六州歌头·一九六五年新年》两首词旁的批注。本篇四是毛泽东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五日在《小重山·赠海岛战士》一词旁的批注。本篇五是毛泽东九月十五日在《念奴娇·重读雷锋日记》一词旁的批注。本篇六是毛泽东九月十五日在《七律·七一抒情》一诗其四旁的批注。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3〕这些词，指胡乔木写的二十七首词。

〔4〕改了几个字，指毛泽东这次对胡乔木词稿的几处修改。这几处修改是：将《六州歌头·一九六五年新年》一词其二中的“兔死狐悲”改为“兔死狐伤”，并在旁批注“伤字较好”，将“万国舞霓裳”改为“万国换新装”；将《江城子·赠边防战士》一词其一中的“为保金瓯风景美，鞋踏破”改为“为保金瓯颠不破，鞋踏烂”；将《江城子·赠边防战士》一词其二中的“猎猎军旗意气共飞扬”改为“猎猎军旗天际看飞扬”；将《念奴娇·重读雷锋日记》一词其四中的“细观摩满纸珠光宝气”改为“细观摩满纸云蒸霞蔚”；将《生查子·家书》一词其二中的“铁要炼成钢，烈火投群众”改为“化为百炼钢，只有投群众”；将《生查子·家书》一词其三中的“不耐雨和风，纵美何堪数”改为“如此嫩和娇，纵美何足数”。

〔5〕作者后来将二十七首词中的六首删去，另外加上律诗五首，定名为《诗词二十六首》，在《红旗》杂志一九六五年第十一期和同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

〔6〕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毛泽东的秘书。冷西，即吴冷西，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7〕作了一点改动，指毛泽东再次对胡乔木词稿的修改。这次所作的修改是：将《江城子·赠边防战士》一词其二中的“胜天堂”改为“胜家乡”；将《七律·七一抒情》一诗其四中的“休向健儿夸核弹，欣欣犹是比基尼”改为“休向英雄夸核弹，欣荣试看比基尼”。

〔8〕指胡乔木《七律·七一抒情》一诗其二和其四中三处文字：对其二中“春玉碎”三字，毛泽东阅后批注：“宜改。”作者在发表时将它改为“春汛怒”三字。对其二最后一句“沧海云天长浩荡”，毛泽东阅后批注：“此句宜改。因承上句，不解所谓。”作者在发表时将它改为“一入沧溟喜浩茫”。对其四中“装饰造”三字，毛泽东阅后批注：“三字酌，又不明朗，宜改。”作者在发表时将它改为“兄弟难”三字。

〔9〕毛泽东将《六州歌头·一九六五年新年》一词其二中的“南针仰”改为“方针讲”，并在旁批注：“不使人误以为仰我南针，故改”。

〔10〕指胡乔木词中以下两处：一是，《生查子·家书》一词其二“斗争如海洋，早晚云霞涌。好水不长流，毒菌纷传种。青春只一回，转眼能抛送。铁要炼成钢，烈火投群众”中后两句，毛泽东阅后将它改为“化为百炼钢，只有投群众”，并写批注：“这几句好。但下二句较晦，故改之。”二是，《生查子·家书》一词其四中“刮骨去脓疮，剝脚争良玉。风险为人民”三句，毛泽东阅后批注：“此三句宜改，方免晦涩。”随后，作者将这三句和第四句“方是江山

主”，改为“顺水好行船，终向下游去。若要觅英雄，先到艰难处”。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再阅胡乔木修改后的这三句和第四句时，在左旁批注：“好。”

〔11〕胡乔木在《江城子·赠边防战士》和《六州歌头·一九六五年新年》词中分别用了“胜天堂”和“万国舞霓裳”，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注。

〔12〕改得好，指胡乔木将《念奴娇·重读雷锋日记》一词其一中的“堪恨利锁名缰，蝇营狗苟，也混英雄汉。天下尚多奴隶血，何日乐园同建？不锈螺钉，投身伟业，有限成无限”，改为“君试共我高翔，人间尽看，何往非前线？四海尚多奴隶血，小我何堪迷恋？身是螺钉，心怀天下，有限成无限”。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注。对这首词其四的“如君红透，羞杀营营辈。花落结为千粒子，一代红巾争继”几句，毛泽东阅后批注：“好。”

〔13〕好句，指胡乔木《七律·七一抒情》一诗其四中的“头颅不向寇仇低。自由合洒血成碧，胜利从来竿作旗”。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九月八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
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
健同志：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的时候，我们代
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兄弟的朝
鲜人民、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最
热烈的祝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朝鲜历史的新纪
元。十七年来，英雄的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
动党的领导下，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和建设社会主
义的事业中，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今天，朝鲜人民一手拿镰
刀、锤子，一手拿武器，继续以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和千里马
的豪迈步伐，为实现七年计划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同时，同
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强地保卫着革命果实。朝
鲜人民的斗争和胜利，对于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
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人民像对待自己的成就一样，为朝鲜人民

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和成就感到欢欣鼓舞。

朝鲜人民为反对美国侵略军霸占南朝鲜、实现祖国统一和粉碎《韩日条约》^{〔1〕}，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最近，南朝鲜人民，再次掀起了反美爱国斗争的怒潮，有力地冲击着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深信，美帝国主义终有一天要被赶出南朝鲜，朝鲜三千里锦绣河山一定能够统一。

中朝两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正在日益发展。我们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战斗团结和兄弟友谊是牢不可破的。这种团结和友谊必将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支援民族解放、争取社会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祝朝鲜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争取祖国统一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祝中朝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和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九月八日

根据一九六五年九月九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韩日条约》，《韩国和日本基本关系条约》的简称。这个条约，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日韩日两国在汉城草签，六月二十二日在东京正式签字，十二月十八日在汉城交换批准书，并宣布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条约规定：南朝鲜当局是“朝鲜半岛的唯一合法政府”；双方尽早举行谈判，建立双方贸易、海运及其他商务关系，缔结关于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等。《韩日条约》签订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此发表一系列声明，郑重宣布《韩日条约》是非法的、卖国的，朝鲜人民不予承认，完全无效。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 革命二十一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九月八日）

索非亚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托·日夫科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格·特莱科夫同志：

在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向你们，向兄弟的保加利亚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保两国人民的友谊有着深厚的基础。维护和加强这种友谊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为加强中保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而继续努力。祝保加利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保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九月八日

根据一九六五年九月九日

《人民日报》刊印。

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 二十周年题词^{〔1〕}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五日）

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毛 泽 东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九日，这个题词在《人民日报》发表。

在外交部给印度政府的 复照稿上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九日）

总理：

只限一天，太匆促了，事实上印度方面办不到，也难得到各国和印度人民同情。改为限两天内折〈拆〉掉如何？或者改为在三天内，即二十一日午夜^{〔2〕}。这样可能获取各国和印度人民的同情，更好些。请酌定。

毛 泽 东

十九日四时半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是在审阅周恩来总理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九日晨四时报送的外交部对印度政府外交部九月十七日给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照会的复照稿时的批语。印度政府外交部的照会说：“印度人员从未越过锡金边界到中国领土进行任何骚扰和袭击。”“一九六二年九月，在中印边界的锡金一侧修建了一些防御工事。自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停止敌对行动以来，这些工事并未加以占据。”“虽然印度政府深信它的军队没有在西藏境内修筑工事，它并不反对对锡金—西藏边境上

据说印度人员在西藏境内修筑了工事的那些地点进行一次联合调查。”“如果发现在边界的西藏一侧有任何工事，不会有人反对拆毁它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九日草拟的给印度驻中国大使馆的复照稿说：“关于印军在中国、锡金边境越界修筑工事的事实，中国方面掌握有大量的、充分的证据，足以向全世界证明这一点，印度政府心里也是明白的。现在已经没有必要进行调查。印度政府来照也承认不排除在中锡边界的中国一侧可能有印方的工事，并且不反对对可能有的这种工事加以拆除。这就实际上表明印度方面确实有侵略工事设在中国境内和边界线上。中锡边界是确定了的边界。中国边防部队对于印军在哪些地方越界建筑了工事是了如指掌的。中国政府坚决要求印度政府拆除这些侵略工事。”复照稿还强调指出：“中国政府最后重申：印度政府必须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九日午夜以前拆除它在中锡边界中国一侧和跨中锡边界线上的所有侵略工事，立即停止在中印边界和中锡边界的一切入侵活动，送回被劫走的中国边民，归还被抢走的牲畜，保证今后不再越境骚扰。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这个复照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

〔2〕外交部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九日给印度驻中国大使馆的复照，将限期拆除所有侵略工事的时间改为“二十二日午夜以前”。

对中央高级党校关于杨献珍问题 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彭真^{〔2〕}同志：

都看过了。此件^{〔3〕}尾页（十六页）上，列举附件四份，去掉侯、孙两份，剩下两份，漏掉杨的“说明”一份，应添上。^{〔4〕}

毛 泽 东

九月二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关于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校委会委员杨献珍问题和处理意见给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说：送上《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和附件四份，还有杨献珍的书面说明一份。从一九六四年七月到十月，我们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发动全校学员和工作人员对杨献珍的错误进行揭发和批判。一年来，我们同他开过多次座谈会和个别谈话，对他进行耐心帮助，希望他认识错误，自觉革命。但他的态度一直很坏，毫无悔改之意。由于他错误严重，至今仍不回头，我们

认为他不适宜再继续在中央党校担任领导工作，建议中央撤销他的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和校委会委员职务。随后，中共中央同意了这个建议，将高级党校校委会的原报告以中发〔65〕592号文件发至全党。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作出关于杨献珍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认为原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的报告是错误的，建议中央撤销中发〔65〕592号文件，对杨献珍错案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复查报告说：杨献珍在主持高级党校工作期间，虽有某些缺点错误，但他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干部教育和办党校的方针，成绩是显著的。康生等人给他扣上的反动帽子及诬陷他的各种罪名和强加给中央高级党校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等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平反。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这个复查报告。

〔2〕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3〕此件，指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给中央的《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报告叙述了自一九六四年七月以来中央党校全体学员和工作人员揭发批判杨献珍的情况，列举了杨献珍的十条所谓“主要错误”。

〔4〕《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尾页上列举的四个附件是：（一）关于杨献珍包庇反革命分子和安插同乡亲属的调查材料；（二）关于侯维煜同志问题的材料；（三）关于孙定国问题的材料；（四）杨献珍的书面检讨。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报告时去掉了其中的（二）、（三）两个材料，即关于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第二书记兼副校长侯维煜问题的材料和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问题的材料。将原来的附件四改为附件二，另外加上附件三杨献珍的书面说明。

给邓颖超的信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邓大姐^{〔1〕}：

自从你压迫我写诗^{〔2〕}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3〕}。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

毛 泽 东

九月二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邓大姐，指邓颖超，当时任中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党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2〕邓颖超曾写有以下说明：“一九六五年夏毛主席接见女外宾时，我作为陪见人，曾问主席是否作有新的诗词？我很久未读到主席的新作品，很希望能读到主席的新作品。故在主席批送我的词二首的批语中用‘压迫’二字。”

〔3〕两首词，指一九六五年填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这两首词一九七六年在《诗刊》一月号公开发表时有所修改。见本册第63、156页。

念奴娇 鸟儿问答

(一九六五年秋)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1〕}。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2〕}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根据《毛泽东诗词集》刊印。

(有毛泽东手稿)

注 释

〔1〕三家条约，指苏联、美国、英国三国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在莫斯科签订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2〕原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一九六四年四月曾在一次演说中说，“福利共产主义”是“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

对纪念孙中山诞辰百周年筹委会 名单（草案）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

没有陈云^{〔2〕}，似应加入。

毛 泽 东

九月三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关于孙中山诞辰百周年纪念会的有关问题给毛泽东、刘少奇等的报告上。报告提议筹备会在辛亥革命纪念日召开，请刘少奇主席讲话，讲话稿已由彭真告钓鱼台（指住地在钓鱼台的起草班子——编者注）准备。报告还附有纪念孙中山诞辰百周年筹委会的名单（草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云列入了纪念孙中山诞辰百周年筹委会名单。

〔2〕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

对外交部关于陈毅出访五国 概况汇报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十月）

江青阅。

可以明了亚非各国当前形势。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印发的外交部文件第九三〇号关于陈毅出访五国的概况汇报上的批语。汇报说：陈毅副总理于一九六五年九月四日应邀访问马里，顺道访问了巴基斯坦、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几内亚等四国，于九月十八日回国。途中经过喀布尔时，还曾应邀与阿富汗首相进行了会谈。所经各国，态度友好，礼遇很高。访问中，除同马里领导人着重研讨了马里经济形势外，主要就当前国际形势，向这些国家领导人阐明了我们的立场和主张，并同对方交换了意见。现在报告以下几个问题：（一）这些国家经济困难、政局不稳是普遍现象。（二）他们同情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但对越南人民能否打败美国缺乏信心，均认为以和平解决为上策。（三）除阿尔及利亚外，对召开二次亚非会议一般都不积极，对会议的基调、开法、会址等也是态度各异。（四）普遍认为中

苏争论削弱了世界反帝力量，不分是非地要求中苏和解。（五）在印巴冲突问题上，巴基斯坦要求我给予有力的军事支援，但又怕我支援“过于有力”。其他国家一般都同意克什米尔实行民族自决，但又主张印巴停火、和平解决。（六）政治会谈的初步印象是，他们对我采取反帝、反修立场，以真正国际主义的态度和方式支持，并在经济上援助新独立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坚定立场表示钦佩、重视，但又认为我过于革命，不讲究策略，怕引起中美大战，担心于他们自身不利。（七）对马里的经济困难问题，既提出了增产节约、开源节流等治标措施，也着重指出了政治问题是解决经济的根本问题。（八）关于今后工作的若干意见：（1）环绕着是否召开亚非会议的情况愈趋复杂，加以印巴冲突尚在继续，勉强开会，不可能开好。不如无限期推迟至形势转为顺当时再开，较为有利。（2）对亚非特别是非洲工作亟需加强，如何在经济、外交、宣传三方面密切配合，灵活运用，尤为当务之急。（3）应大力开展争取非洲知识分子的工作。（4）对亚非国家，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还须给予经济援助，但似应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国家作为重点，着重在经济建设方面做出样板。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成立十六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十月六日）

柏林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维利·斯多夫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教授博士

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柯伦斯教授博士：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的时候，我们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一向关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并为你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植下，西德^{〔1〕}已经变成欧洲新战争的策源地。西德军国主义正在加紧扩军备战，千方百计地谋求核武装，妄图孤立和吞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着欧洲和世界和平。中国人民一贯坚决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西德军国主义、争取缔结对德和约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

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西德军国主

义、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德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日益增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周恩来

全国委员会主席

一九六五年十月六日

根据一九六五年十月七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简称。

对总政《关于突出政治、 落实四好、加强战备的情况和 意见（草稿）》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退林彪同志。此件已阅，很好。

毛 泽 东

十月二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林彪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十月十四日《关于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加强战备的情况和意见（草稿）》上。这个意见草稿的主要内容是：（一）今年前九个月全军政治工作的概况。主要是执行林彪副主席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着重抓了十件大事：（1）大抓学习毛主席著作。印发选读本一百一十四万册，语录五百多万册。学习方法多样化（天天读，经常读，小整风，讲用会，上政治课，干部半日学、集训等）。（2）大抓战备政治工作。（3）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4）进行院校整风。（5）进行文艺队伍整风。（6）军队干部参加地方社教

运动和贯彻民兵工作“三落实”。(7) 抓紧培养选拔革命接班人。(8) 进行几项制度改革。(9) 狠抓基层骨干轮训,进行四好初评。(10) 整顿机关作风和克服连队忙乱。(二) 对今冬明春全军政治工作的意见。总的要求仍然是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加强战备。主要工作是:(1) 大学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从根本上加强战争准备。(2) 抓好部队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工作,搞好部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3) 继续狠抓四好运动,搞好四好初评。(4) 整顿机关。(5) 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接班人的工作。四好,指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在全国第二批城市“四清” 部署情况简报上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十月三十日）

江青阅。大有希望，明冬后春可完。

毛 泽 东

三十日上午五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六五年十月三十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三六五号上。简报说：（一）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西藏）第二批开展城市“四清”运动的单位共有一万六千一百多个，职工六百九十五万五千余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二）参加第二批城市“四清”运动的工作队共计二十八万二千多人。新老队员的比例，有的地区老队员占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有的地区只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工作队员与参加运动职工人数的比例，据两个大区的统计，中南为一比二十，东北为一比二十六。简报还附有部分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负责同志蹲点名单。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四十八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六日)

莫斯科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阿·伊·米高扬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同志：

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八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兄弟的苏联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四十八年前，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伟大的列宁和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四十八年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蓬勃发展，取得了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各国人民沿着十月革命的光辉道路胜利前进。

伟大的苏联人民从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一天起，就经受了种种严峻的考验，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苏联人民战胜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叛乱，并

且在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期内，把自己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团结一致，不怕牺牲，粉碎了希特勒法西斯的疯狂进攻，保卫了和巩固了苏维埃政权。苏联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给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中国人民一向为兄弟的苏联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中国人民衷心地祝愿苏联人民今后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荣道路，继续前进，并且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结成的。这种友谊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同兄弟的苏联人民一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为维护和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为反对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共同奋斗。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六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七日

《人民日报》刊印。

对《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我都已看过^{〔1〕}。一夜无眠。这些都送江青一阅。看后，扎〈着〉人送杭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我都已看过，指毛泽东已看过《光明日报》总编室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编印的《情况简编》第三六二期刊登的《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的材料。《光明日报》记者在所写的材料中反映了十一月十四日他去看吴晗的一些情况，谈起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吴晗激动地说：我不准备写答辩文章，正在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只要领导了解就行了。我不怕。这个剧本是有缺点的，但不能说是毒草。我写海瑞是有根据的。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 谁还敢谈历史?!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将《海瑞罢官》剧中的“退田”、“平冤狱”，牵强附会地同一九六二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这反映了剧作者

吴晗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要代表国内外敌人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这篇文章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吴晗，历史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兼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姚文元，当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文艺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内部理论刊物《未定文稿》主编之一。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

对林彪所提五项原则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此件已阅。同意五项原则。

毛 泽 东

十一月二十日

退林彪同志。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林彪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给毛泽东的电话报告记录上。报告说：我根据海、空军最近的情况，提出了五条原则，拟作为明年全军工作的方针，用以统率各种业务和任务。随电话报告记录还附送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通讯。通讯报道了林彪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对当天凌晨击沉击伤美制蒋军军舰各一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部队颁布的嘉奖令中提出的五项原则，即：（一）要更加加紧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联系实际，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二）更加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特别是要大抓狠抓活思想。（三）领导要深入基层进行面对面的领导。（四）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五）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 二十一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在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一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节日祝贺。

二十一年来，勤劳勇敢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久经考验的领导下，英勇顽强，艰苦奋斗，不断地把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阿尔巴尼亚人民即将胜利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并且正以更高的热情和信心准备迎接明年开始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中国人民为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并且预祝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今后取得新的、更加伟大的成就。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坚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积极支援亚洲、非洲和拉

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反帝革命运动，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为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正在与日俱增。

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始终不渝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坚定不移地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为促进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愧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支坚强队伍，赢得了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尊敬和赞扬。

中阿两党、两国、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中，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中，结成了亲密的友谊。我们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是牢不可破的。我们深信，这种革命的友谊和团结必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祝中阿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报》刊印。

对越南南方领导人接见 我新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

江青阅，退毛存。

二

要送蚊帐、布匹、罐头、肉松、药品、雨布、吊床等物资去。并要大量地送。^{〔2〕}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外交部办公厅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六日印发的《越南南方领导同志接见我赴南越新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上的批语。本篇一写在谈话纪要首页上。本篇二写在记者附注二上。这个纪要有三件：一、越南南方中央局书记长山一九六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接见中国赴越南南方新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二、越南南方中央局副书记、中部地区书记武志公一九六五年三月和四月两次接见中

国赴越南南方新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三、武志公接见中国赴越南南方新闻工作队的谈话全文（一九六五年六月整理）。武志公的谈话全文包括十二个问题：（一）总况；（二）最近敌情；（三）政权问题；（四）建立平原地区根据地；（五）平原地区农村局部起义；（六）目前我军主力和地方武装；（七）对美帝国主义扩大战争阴谋的看法；（八）美帝国主义为什么首先出兵岬港；（九）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十）土地和土改问题；（十一）总起义和总进攻；（十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两个附件：一、南方革命的目标和基本方向；二、人民武装力量情况。最后是记者附注的情况，其中讲了部队的编制、装备、战斗力和供应情况等。

〔2〕本篇二是毛泽东针对谈话纪要记者附注二中所说的以下情况而写的：“中部中区山区主力部队供应比较困难，山区地广人稀，当地少数民族生活不富裕，很少副食品，不种蔬菜，战士们一般没有副食吃，白饭加盐巴（盐每月每人供应半公斤，从平原运盐进山全靠人力背，很困难），有时吃些野菜（……因为部队多，这些野生东西很快也吃光了），营养不足。战士们常年露营森林，雨多潮湿，日夜温差颇大（白天三十多度，夜间十度左右），没有房屋、吊床、雨布过夜，蚊子特别多（许多战士没有蚊帐）。由于营养不良，蚊虫猖獗，战士们发疟疾的很多（预防疟疾药和医治药也很少）。按规定战士每年供应一套衣服，但有些部队不能保证。据我们在各地所见，除平原地区外，供应山区战士的副食、营养药、医药、布匹、日用品等很缺乏，使战士们的健康受到了一定影响。”

给陈伯达的信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伯达^{〔1〕}同志：

乔木^{〔2〕}修改的那九篇文章^{〔3〕}，不知看了没有？请交来人带回，我想查一件事。如未看完，改日送上，再请斟酌。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3〕 九篇文章，指《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后写的一篇长达五万多字的批判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九个文件的文章。文章分九个部分，也称九篇文章。参见本书第十七册第226页注〔1〕。

在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 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 报告》上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七日）

—

林彪同志：

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2〕}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何，请酌定。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此件如转发时，请先给少奇、恩来、彭真^{〔3〕}同志一阅。

二

林彪同志：

将此信^{〔4〕}一同印发。

毛

十二月七日

彭真同志暂不来此，可以不送阅了。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在林彪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报送的中共兰州军区委员会十一月七日《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上的批语。林彪的报告写道：“主席：从这份文件中可看出，如果战争爆发，其他部队情况可能是与这个部队近似。”本篇二是在林彪十二月三日给毛泽东的信上的批语。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2〕此件，指中共兰州军区委员会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七日《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报告说：九月中下旬，五十五师奉命紧急备战，向中印边境出动，后因情况变化，转而进行了为时一周的摩托和徒步行军演习。从备战和演习中看到，部队贯彻执行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比较落实的方面有：（一）几年来部队由于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强阶级教育，开展四好运动，特别是今年贯彻执行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在各方面产生了巨大效果，从根本上提高了部队的阶级觉悟，增强了贡献于革命战争的决心。（二）进一步树立了常备不懈的思想，养成了快速、紧张的战斗作风。接受任务后，部队集结快，零散人员收拢快，思想发动、组织调整、物资发放快。（三）对部队的活思想抓得较深较细。抓住有代表性的问题，能较快地弄清事实，耐心说服，加以解决。（四）狠抓政策纪律。基本上做到了“部队走

到哪里，把毛泽东思想宣传到哪里，把好事做到哪里，把好影响留在哪里”。在备战和演习中暴露出的主要问题有：（一）部分干部坚信突出政治的根子还扎得不牢，在工作多、时间少的情况下，“转向”的苗头时有出现。（二）平时战备思想不够落实，战备形势教育有片面性。（三）平时对基层新干部的培养工作还抓得不紧，领导指挥能力低，办法少，在这次战备中表现得很突出。（四）政治工作本身还有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图形式，走过场，乱提口号，乱要统计数字。

〔3〕少奇，即刘少奇。恩来，即周恩来。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4〕此信，指林彪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十二月二日主席有关五十五师突出政治一文的批示已经收到，主席的批示对于即将召开的政工会议与明年和今后的政治工作将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军队如不加强政治工作，不但打仗经不起考验，而且投敌事件还会更多地发生。其他如破坏军民关系等坏事还会增加。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批示，决遵照主席指示送北京少奇、恩来、彭真同志阅和军委常委阅，然后发师以上党委。

关于通知一些负责人 来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扩大会议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七日）

—

曲琦玉^{〔2〕}同志：

请用电话，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在杭州）、谢富治^{〔3〕}四位同志，于本日下午到上海一谈。

毛 泽 东

十二月七日早

二

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4〕}三同志：

请于本日或明日到上海一谈。

毛 泽 东

十二月七日（一九六五年）

在四川，由成都转告。

根据手稿刊印。

三

宋任穷、陈锡联（东北）、李雪峰、杨勇、廖汉生（北京）、杨得志^{〔5〕}一架飞机共七（六）人，于八日上午来此。

四

贺龙、董必武、王尚荣、李天佑、张爱萍、雷英夫、徐向前、刘伯承^{〔6〕}（如卧病，不可来）、朱德，共八（九）人，于十二月八日上午来此。

五

许世友、韩先楚、陈毅、陶铸、王任重、李井泉、刘澜涛^{〔7〕}七人于十二月八日来上海。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至五是毛泽东关于通知一些负责同志来上海出席将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一组批语。当时毛泽东已在上海。这次会议讨论所谓罗瑞卿问题。会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人罗织罪名，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对罗瑞卿进行突然袭击。之后，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

与彭、黄（指彭德怀、黄克诚——编者注）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会议于十二月十五日结束。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兼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叶群，林彪的妻子。当时任林彪办公室主任。吴法宪，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李作鹏，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会后，罗瑞卿被调离军事领导岗位，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

〔2〕曲琦玉，当时任中共中央警卫局警卫一处一科副科长。

〔3〕叶剑英，当时任中央军委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萧华，当时任中央军委委员兼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杨成武，当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内务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长。

〔4〕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工业交通办公室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这时，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正在云南考察三线建设情况。

〔5〕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陈锡联，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司令员。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

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杨勇，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廖汉生，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杨得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司令员。

〔6〕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国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王尚荣，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李天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雷英夫，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徐向前，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7〕许世友，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关于机要保密、警卫工作的指示^{〔1〕}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会出来破坏。要把这个意思告诉中央机要局、机要室，还要告诉军队的机要局、广播事业局的负责同志都要注意。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
原件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质忠谈话的一部分。这段话后来编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毛主席关于机要保密工作的指示》。在毛泽东批示同意的中发〔1972〕33号文件《中央警卫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引用了这段话的第一句。

关于党内印发 《论十大关系》的批语^{〔1〕}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送交小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

毛 泽 东

十二月十八日

此件^{〔2〕}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3〕}中。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刘少奇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给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论十大关系》一文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此件我又看了一遍，觉得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将此件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昨天见主席时，主席已同意这样。望主席再看一遍，并批交小平、彭真同志办理。”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此件，指刘少奇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报送毛泽东审阅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记录整理稿。

〔3〕中央批语，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印发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批语。批语内容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作的《论十大关系》，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件，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作了很好的论述，对现在和今后的工作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为此，特印发县、团级以上党委学习。这个文件是当时讲话的一篇记录稿，毛泽东同志最近看了后，觉得还不大满意，同意下发征求意见。请各级党委对文件的内容提出意见，汇总报告中央，以为将来修改时参考。”

改造学校教育

让学生接触社会实际^{〔1〕}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一岁到七岁，接触事物很多。二岁学说话，三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

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浙江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的一部分。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毛泽东的秘书。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艾思奇，哲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关锋，当时任《红旗》杂志哲史组组长。

手书叶剑英《七律·怀远》^{〔1〕}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远 望

在大连棒棰岛

忧患元元忆逝翁，
红旗缥缈没遥空。
昏鸦三匝迷枯树，
回雁兼程溯旧踪。
赤道雕弓能射虎，
椰林匕首敢屠龙。
景升父子皆豚犬，
旋转还凭革命功。

十月十六日《光明日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七十二岁生日时手书叶剑英《七律·怀远》送给前来祝寿的儿子毛岸青、儿媳邵华。毛泽东手书时，将原标题《怀远》改为《远望》，并在标题右下方加写作者作诗地点“在大连棒棰岛”。叶剑英这首七律，发表在这年十

月十六日《光明日报》。叶剑英，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

毛泽东等祝贺古巴解放 七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哈瓦那

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

古巴共和国总统奥斯瓦耳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同志：

在古巴解放七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古巴人民、古巴共产党和古巴革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古巴革命的胜利，是古巴人民团结起来、艰苦奋斗、英勇斗争的结果，是美帝国主义的一次可耻的失败。它证明了，革命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我们祝愿，英勇的古巴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捍卫民族独立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中古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是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为基础的，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共同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古巴人民相互支持，共同前进。

祝中古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根据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

《人民日报》刊印。

在《哲学研究》 一九六五年第四期上的批注

（一九六五年）

一

一九六五年，《哲学研究》第二期^{〔1〕}。

赵纪彬，《论语新探》^{〔2〕}。

二

孔门充满矛盾论。^{〔3〕}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一期刊登了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教授赵纪彬《关于“一”“二”范畴的形成过程问题》一文，这是作者撰写的《释一二》一书初稿的第二章。《释一二》一书副题为《先秦矛盾观的发展》。该书就《经》、《子》中“一”“二”及其孳乳各字的演进史迹，探索先秦辩证法观与形而上学观的斗争及发展规律。全书共分十一章。

〔2〕《论语新探》，赵纪彬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出版。

〔3〕这是毛泽东在《哲学研究》一九六五年第四期第四十四页赵纪彬《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文标题旁的批注。这篇文章论述了六个问题：（一）春秋末期阶级斗争的发展与“和”“同”字义的转化。（二）有若、樊迟思想中的“和”“同”新字义。（三）从“民不服”看“举贤”“德治”的阶级斗争意义。（四）“仁”的矛盾调和原理与“一以贯之”的方法论。（五）“闻一知十”与“闻一知二”两种矛盾观的对立。（六）孔门的支派萌芽及其思想斗争的逻辑前景。这篇文章是作者《释一二》一书初稿的第三章。有若、樊迟，均为孔子的学生。

重读《长冈乡调查》时 写的批注^{〔1〕}

（一九六五年）

一

乡村的工人是手工业工人，如建筑（泥水匠）、打铁、造纸、裁缝、木匠、篾匠、剃头师父等，人数很少，叫他们单独组织工会，领导广大农民，农民是不服气的。他们因为不能不为农业服务，出外当红军，脱产做政府工作的也较少。除造纸业有几人至十几人的工场手工业外，其余都是个体工人，自有工具，有些还是半农半工的人；土地改革中，工人怕失业，分了一些的土地，他们大体相当于贫农，所以农民不认为他们是自己的领导者。工人方面，也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可以领导广大的农民。反而觉得怕农民不请工，或者少请工，自己有失业、半失业的危险，所以他们在土地革命中坚决要求分田。只是因为当时“左”倾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一定要在乡村中及在落后的小城镇中（那里只有手工业，没有机器工业），命令工人领导农民，而工农双方都不理解这个大道理，因而始终没有真正实行过。这件事闹了多少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以后，才没有再闹这种笑话了，因为那时的领导路线改变了。（一九六五年 毛泽东注）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者们^{〔2〕}，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但是这是难免的，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重读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写的《长冈乡调查》时，在“此次选举”一节中“选民登记”这段文字后的批注。本篇二是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的“此次选举”一节旁的批注。

〔2〕中央的领导者们，指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底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中共中央领导人。

七 律

洪 都

(一九六五年)

到得洪都^{〔1〕}又一年，
祖生击楫至今传。
闻鸡久听南天雨，
立马曾挥北地鞭。
鬓雪飞来成废料，
彩云长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
江草江花处处鲜。

根据《毛泽东诗词集》刊印。

(有毛泽东手稿)

注 释

〔1〕 洪都，指江西南昌。

在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的批注^{〔1〕}

（一九六五年）

第一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武器

第三章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

第一节 两种对立的发展观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

关于发展的
两种见解

在认识史上，同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还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是两种对立的发展观。……由于发展观的不同，各个哲学派别在解决哲学根本问题时的论证方法和彻底程度也就不同。发展观是构成一定哲学体系的必要的有机的成分，是世界观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毛泽东同志把这两种不同

发展就是诸对立物 (Anorises)^[2] 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 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 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 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 我们的任务是加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 (可以有十几种), 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 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等〈此〉类推。

的发展观表述为互相对立的宇宙观 (即世界观), 就表明这两种发展观对立的问题也是哲学上极为重要的问题。所以, 我们在论述哲学根本问题之后, 必须论述两种发展观对立的问题。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 都把发展观概括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列宁说: “两种基本的 (或两种可能的? 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 发展 (进化) 观点是: 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 是重复; 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 (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3] 前一种观点就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 后一种观点就是辩证法的发展观。在这一节里, 我们将论述这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这种对立的历史根据以及这种对立同哲学根本问题的关系。

两种发展观互
相对立的焦点

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 集中地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不必抄斯大林

第一，孤立观点和联系观点的对立。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第三章第一节“两种对立的发展观”上的批注。本篇左侧用宋体排印的，是毛泽东的批注。李达，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学会会长。

〔2〕括号中的英文是毛泽东写的。

〔3〕这段文字，引自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见《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408页。作者的引文有个别文字出入。

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 复信稿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一月六日）

很好。最好能早日交给苏联驻华大使。

毛 泽 东

一月六日上午十一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康生、吴冷西一九六六年一月三日报送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来信的复信稿给毛泽东的信上。苏共中央的来信对《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文章进行攻击。中共中央在复信中反驳说：“我们的文章，用大量的事实，以无可辩驳的论证，从各方面揭穿了你们玩弄的所谓‘联合行动’的骗局，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复信于一九六六年一月七日发出。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冷西，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成立二十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人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继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阿尔巴尼亚解放日之后，在阿尔巴尼亚人民生活中又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二十年来，勤劳勇敢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阿尔巴尼亚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目前，阿尔巴尼亚人民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正在满怀信心地为实现今年开始的第四个五年计划而努力。中国人民为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深信，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

的前进道路上，必将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人民，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坚决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旗帜，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对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影响越来越大，国际威望越来越高。

中阿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促进世界人民革命的事业中，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中，一向紧密合作、互相支持，结成了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我们这种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友谊和团结，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并将放射出越来越灿烂的光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日

根据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一日

《人民日报》刊印。

给章士钊的信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

行严^{〔1〕}先生：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惠书及附件均已收读，极为感谢！《三国志》^{〔2〕}一部亦已收到，可作纪念，便时乞代致谢意。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3〕}，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有当，请酌定。顺颂
春安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

附件两纸，另康生同志来信^{〔4〕}一件，均附上。又及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行严，即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三国志》，西晋陈寿撰写的一部纪传体魏、蜀、吴三国史，分魏志、蜀志、吴志，共六十五卷。三志原本各自独立，后世将它合为一书。

〔3〕《柳文指要》，是章士钊所著的一部专门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文集的著作。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毛泽东曾将这部书稿批转

给康生阅读。《柳文指要》一书，后经作者修改，一九七一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4〕来信，指康生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五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因此书有些人已知道主席看过，所以我提了几点意见，用纸条标出。请主席看看，是否须要作词句的删改”。毛泽东的评价，见本册第117页《给康生的信》。

给周世钊的信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东园^{〔1〕}兄：

数接惠书及所附大作诗词数十首，均已收读，极为高兴。因忙，主要因懒，未及早复，抱歉之至。看来你的兴趣尚浓，我已衰落得多了，如之何，如之何？谨复，顺颂安吉！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东园，即周世钊，又名东园，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湖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

对有关《海瑞罢官》问题 七个材料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

江青：

这批材料^{〔2〕}阅后，暂存你处。

毛 泽 东

二月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彭真一九六六年二月一日报送的有关《海瑞罢官》问题的七个材料的目录上。《海瑞罢官》是历史学家吴晗创作的新编历史剧，一九六〇年底完成，一九六一年初开始上演。一九六五年初，江青在上海同张春桥秘密策划，由姚文元执笔写成《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对《海瑞罢官》的学术批判发展为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政治批判运动。这个批判运动，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直接导火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吴晗，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兼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经中

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作出决定，为吴晗冤案平反。张春桥，一九六五年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宣传部部长。姚文元，一九六五年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文艺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内部理论刊物《未定文稿》主编之一。

〔2〕这批材料，指许立群一九六六年一月分几次报送彭真的有关《海瑞罢官》问题的七个材料。它们分别是：（一）《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人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二）《汇报张春桥同志电话中的意见》。（三）《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四）《关于郭沫若同志一封信的汇报》。（五）《关锋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写的一篇杂文》。（六）《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七）《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许立群，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关锋，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郭沫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邓拓，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

对中共中央给波兰统一工人党 中央复信稿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

同意。照办。

退康生、吴冷西。

毛 泽 东

二月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康生、吴冷西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报送关于中共中央对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来信的复信稿给毛泽东的信上。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的来信建议召开华沙条约成员国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最高级会议，讨论在越南问题上的“联合行动”。中共中央复信说：我们历来希望，社会主义各国同我们一样地采取坚决支持越南人民反美爱国斗争的立场。但是，苏共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真实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回击美国对越南的侵略，而是企图把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引进美国制造的和谈圈套，企图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纳入美苏合作的轨道，企图利用“联合行动”的口号，孤立和打击中国。中共将不派

代表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建议召开的华沙条约成员国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最高级会议。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冷西，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关于重新印发毛泽东在 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二月六日、十二日）

一

彭真同志：

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2〕}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点，别地不发）。看来此问题很大，要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王任重同志的修改^{〔3〕}是好的。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二月六日

二

彭真同志：

都已看过，照此办理。

毛 泽 东

二月十二日二时四十分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七千人大会，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各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等问题的重要讲话。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我读了一遍。我认为重新印发给县委一级，由县委组织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学习，有迫切的意义。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是引导这个高潮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本篇一写在王任重的来信上。本篇二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一日报送的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修改稿的批语。彭真在送审报告中写道：“我们大家（任重同志参加）讨论了两次，提了些小的修改意见，供参考。请核定。”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一九六二年四月十日作为中共中央绝密文件印发，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发至县团级党委，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2〕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3〕王任重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对毛泽东的讲话稿提出六条文字方面的修改意见。彭真二月十一日送审的这个讲话修改稿中，吸收了王任重的修改意见。

对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 机械化的设想》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月）

—

任重同志：

此件^{〔2〕}看了，觉得很好。请送少奇同志，请他酌定，是否可以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研究。^{〔3〕}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各省、市、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的计划，从少数试点，逐步扩大，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至于二十五年以后，那是无止境的，那时提法也不同了，大概是：在过去二十五年的基础上再作一个二十五年的计划吧。目前是抓紧从今年起的十五年。已经过去十年了，这十年我们抓得不大好。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同意。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王任重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四日报送的中共湖北省委二月五日《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的通知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报送的彭真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的批示》上的批语。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印发毛泽东的批语和刘少奇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给周恩来、邓小平的信以及湖北省委的这个文件。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此件，指中共湖北省委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设想指出：实现农业机械化，农业生产就会出现革命性的飞跃，农业落后于工业的矛盾才能获得解决。而农业的大发展，又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巩固的基础，这对于巩固工农联盟、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阵地，对于备战、建设、防修，都关系极大，因而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我省，实现农业机械化，要走孝感县金星大队的道路，也就是大寨的道路，即是在开展“四清”运动的同时，自力更生，勤俭创业，用本省生产的农业机械，来实现农业机械化。我们要发扬大寨精神，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在保证增产和增加社员收入的原则下，采取以集体办机械为主、国家扶助为辅，“以机养机”、分期购进，国家扶助、无息贷款等办法，逐步实现机械化。要做好这一工作，关键

在于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今年一定要办好十七个公社的试点工作，并作出全面规划。规划不光是指标要求，而且是组织一个革命飞跃的行动纲要。从今年算起，我们要力争在五年、七年、十年内（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就是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在全省实现农业机械化。

〔3〕刘少奇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给周恩来、邓小平的信中说：“我赞成将湖北省委这个文件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研究，主席批语也一并转发。此外，中央还可加一个批语。”四月十日，中共中央的批语指出：“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指出了我国农业的发展道路，是要在集体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他最近又提出各省、市、自治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农业机械化计划，争取从今年起，用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这个任务是同他指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紧紧联系着的。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到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局部地区的灾荒无论哪一个省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毛泽东同志的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战略思想紧密联系起来，这样才能动员广大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奋斗。中央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非常适时，非常重要。机不可失，我们应当立即抓紧这项工作。”“中央认为，实行农业机械化的具体步骤，应当由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直

接负责，特别是省一级要有必要的主动权。湖北现场会议以后，各地党委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农业机械化计划的初步草案，内容包括分批分期、分别轻重先后缓急、由点到面、由低到高、土洋并举等措施，并同国家统一计划相结合。这种计划草案经过酝酿，然后提交今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

听取叶剑英、杨成武 汇报时的谈话^{〔1〕}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一

诱敌深入，过去灵，过去对日本人灵，现在在越南不灵了。敌人不会轻易长驱直入，要做两手准备。它不深入怎么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诱敌深入第一阶段灵，第二阶段就不灵了。

诱敌深入，怕不灵。可以搞小的诱敌深入，例如几十公里之内。第一线要顶几个月。我看美国不会走日本、希特勒^{〔2〕}的老路。像日本、希特勒长驱直入的办法，美国不敢搞，它没有多少兵，它怕死人，怕我们消灭它，所以要有第二手准备。完全不让它上岸也不行，我们海岸线那么长，这里不能登陆，那里可以登陆。过去德国人在青岛设了防，日本人就是从龙口登上来，从背后占领青岛的。

诱敌深入，我们搞了几十年。第五次反“围剿”吃了没有诱敌深入的亏。现在大家都相信了。因为再没有其它办法。日本人长驱直入，除西北、西南地区以外，差不多交通要道都占了。今后诱敌深入，可能不灵。不管怎样，我们在第一线总得顶几个月，使后方有所准备。

二

诱敌深入有两个深度，差不多了，还要看形势。这是还没有同敌人打仗以前的想法，打起仗来，你晓得敌人怎么搞，现在可以这样设想。反正要在第一线顶几个月、半年的时间，使后方有所准备。还要考虑顶不住。我们不能一点空子也没有，你设想得很周密，但敌人不从你设防周密的地方来，它钻你的空子上来。它要钻你的空子怎么办？

三

利用城市打，也是个办法。采取斯大林格勒的办法。总不能把城市空起来，上海人口七百万，搬到哪里去！工厂要搬出一些。沿海城市要多修几层工事，它突破一层，还有一层。还要注意城市翼侧的设防。战争开始，可以采取这个方针，打几个月，看情况再说。美国搞空降，只能搞近距离的空降，远距离的空降，它没有把握，力量也不行。

四

一个国家要消灭另一个国家，只要军队存在，人民大部存在，敌人就没有办法。因为要消灭一个国家，首先是消灭军队，然后是征服人民，强占土地。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
审定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至四是毛泽东于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二十二日上午分两次听取叶剑英、杨成武汇报军事工作时谈话的一部分。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将这个谈话纪要报送毛泽东审阅。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纪要上批示：“此件看了，记录得不错，就照这样吧。”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杨成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2〕希特勒，德国纳粹党党魁、法西斯德国元首、第二次世界大战头号战犯。一九三三年一月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并兼任总理，实行法西斯统治。一九三九年九月派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六月大举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苏联红军攻入柏林时自杀。

对余秋里考察三线建设 《汇报提纲》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此件^{〔2〕}已阅。退周总理。

毛 泽 东

二月二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七日报送余秋里考察西南、西北大三线建设的《汇报提纲》给毛泽东的信上。周恩来在信中说：这是余秋里同志考察回来后向政治局常委同志写的《汇报提纲》，值得一看。他已在常委会上做了口头说明，对主席所关心的西南、西北地区在一九七〇年钢的生产能力争取到四百三十万至五百五十万吨、二线争取达到六百五十万到七百万吨、一线争取达到一千一百四十万吨，已在开始进行新的布置。小三线的建设，也在争取加快，并加多品种和产量，以利独立作战。随信附有《一九六八年钢铁生产能力和产量的设想》、《一九七〇年钢铁生产能力和产量的设想》。余秋里，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全面领导计划工作。

〔2〕此件，指余秋里一九六六年二月六日的《汇报提纲》。《汇报提纲》说：我们在去年十一月底离开北京，到西南、西北了解三线建设的情况，把西南的主要工程摸了一下。铁路建设的任务，看来是最艰巨的，但是工程进展得很快，一九六五年的施工效率，下半年都比上半年提高一倍左右。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经中央批准新建的一批工厂，主要建设任务都可以在一九六六年完成，比原计划提前一年多时间。贵州的六枝、盘县、水城三大煤矿区，已集结施工队伍五万人，总的建设速度比过去快一倍。钢铁工业，一九六五年施工的项目，建成和部分建成的占一半，为军工配套的钢厂，到一九六七年可以基本建成。攀枝花钢铁基地，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把水、电、路搞通了，第一期电厂、水泥厂、砖瓦厂已先后建成投产，为下一步展开施工创造了条件。机械工业，由一线搬迁到三线的项目，计划三年搬迁二百二十一个，一九六五年底已经全部搬完九十一个，部分搬迁三十个，速度是快的。三线建设投资完成情况也较好。总的说，大三线的建设在主席和中央战略方针的鼓舞下，不论西南、西北，都是热火朝天，广大职工的干劲很大，工程进展快，质量比较好，建设中有许多新的创造。《汇报提纲》总结三线建设进展较快的原因：一是突出了政治。二是老厂包新厂，从筹建、施工到建成投产，一包到底。三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分期分批，搞一个成一个。四是依靠地方大力协同。五是领导干部亲临前线。关于三线建设的重点，《汇报提纲》说：现在看来，三线建设中，加工工业是上得快的，突出的问题还是钢铁工业跟不上，钢铁工业的核心又是矿山建设问题。这就要抓两手，一手是抓紧攀枝花和酒钢的建设，另一手是抓好新探明的几个建设条件较好的富矿。我们总的想法是，三线建设必须坚持中央提出的“以钢为纲”的方针，尽快地把钢铁工业搞上去，把三线真正建成一个过得硬的战略基地。酒钢，酒泉钢铁公司的简称。

给人民大会堂服务员罗丽华的题词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要注意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分析自己和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对王任重关于政治挂帅问题 发言稿及中央批语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月）

一

少奇^{〔2〕}同志：

此件请你看，是讲政治挂帅的。

毛 泽 东

二月二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同意。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王任重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会议上关于政治挂帅问题的发言稿上的批语。王任重的发言指出：现在农村有许多地方是工分挂帅，不是政治挂帅；许

多工厂、商业单位则是奖金挂帅，其实质是物质刺激。对这些不合乎毛主席思想和生产发展的制度都可以改。工厂可以把奖金加到工资里去，只要不超过工资总额就可以。原则有两条，一条是不增加国家开支，另一条是工人的实际收入不减少。以后只搞精神鼓励，不搞物质刺激。农村的基本办法是搞底分制，按人评底分，反对搞烦琐哲学，主要靠政治挂帅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搞政治挂帅，要有一系列的措施跟上去，否则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本篇二是毛泽东在周恩来、彭真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报送的中共中央转发王任重同志关于政治挂帅问题发言稿的批语上的批语。四月十日，中央批转王任重的发言稿。中央的批语指出：“任重同志的发言，是讲政治挂帅的，他的意见提得很好。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现在实行的一些奖金制度等，是不符合政治挂帅精神的。我们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是靠工资、工分以外的物质奖励，而是靠毛泽东思想，靠政治挂帅，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之是靠人们的政治觉悟的不断的提高。但是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牵涉的方面和问题很多，需要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全面考虑，通过群众路线，逐步解决。请中央有关各部委和各省市区党委找几个工厂、商店、生产队等单位，选择条件比较成熟的问题，在今年试点，以便取得典型经验，逐步全面解决这个问题。”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2〕少奇，即刘少奇。

同毛远新^{〔1〕}谈教学问题

（一九六六年二月）

科学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但讲课不能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三千多年，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

讲原子物理，不必要从最早的那个学派的理论讲起。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你们学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刊印。

注 释

〔1〕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曾是哈尔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生。

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

给刘少奇的信^{〔1〕}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

少奇同志：

三月十一日信^{〔2〕}收到。小计委^{〔3〕}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农业机械化五年、七年、十年的方案，并参观那里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试点，这个意见很好。建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也各派人去湖北共同研究。有七天至十天时间就可以了。回去后，各做一个五、七、十年计划的初步草案，酝酿几个月，然后在大约今年八九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才有可议。若事前无准备，那时议也恐怕议不好的。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等方面，对原材料等等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也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也要中央确有原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后再说。为此，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例如超出一倍以上者），在超过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类，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又此事

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4〕}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

以上几点意见，是否可行，请予酌定。又小计委何人去湖北，似以余秋里^{〔5〕}、林乎加二同志去为宜。如果让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派人去的话，似以管农业书记一人、计委一人去为宜。总共也只有大约七十人左右去到那里开一个七天至十天的现场会。是否可行，亦请斟酌。^{〔6〕}

毛 泽 东

三月十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在这封信的打印稿上，毛泽东曾经批示：“未发，拟不发，待讨论。”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在《对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的批示》中，转述了毛泽东这封信的主要内容。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毛泽东诞辰八十四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封信。

〔2〕信，指刘少奇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设想的文件和主席批语已印发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并发给包括计委、经委在内的各有关部委及华北局有关同志研究，准备意见。后来，在有各在京副总理参加的中央常委会上谈了这个问题，大家意见，要小计委就这个问题对有关各方面情况先摸一摸，提出一个方案，中央再来讨论，并要提交下次中央工作会议加以讨论，以使各地方的努力更加符合实际。恩来同志已要小计委派人到湖北，同省委共同研究他们提出的方案，先在湖北进行试验。

〔3〕小计委，是中共中央一九六五年一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一个工作机构。主要任务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等。组建时，成员有当时的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建筑工程部部长李人俊、浙江省委主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林乎加、北京市委主管工业的书记处书记贾庭三、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陈伯达。后来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由小计委负责同志正式主持国家计划委员

会的工作，不再用小计委的名称。陈伯达，当时还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毛泽东的秘书。

〔4〕见《论语·颜渊》。

〔5〕余秋里，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全面领导计划工作。

〔6〕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对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的批示》指出：为了推动农业机械化工作和交流经验，“中央和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商定，于今年四月下旬或五月初在湖北召开现场会议，除各中央局派人参加外，每个省、市、自治区党委参加会议的同志是管农业的书记一人、计委一人，或者再去一位主管农业机械工作的同志，西藏去一人即可。会前，中央将派小计委的同志到湖北先进行调查研究，同湖北省委一道，着手现场会议的准备工作。会议的具体时间，届时另行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也可先派一二人到湖北参观，同时各地可以总结本地区若干单位农业机械化的典型经验和一般农机具的生产、供应、修配、管理情况，带到现场会议上交流经验”。

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的批语、批注和修改^{〔1〕}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月）

一

江青：

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毛 泽 东

三月十七日

二

江青：

各件^{〔2〕}都看了，都同意。只在《纪要》内的几处，增加少数文字，或者改了几个字。请酌定。现在原件退还给你。

毛 泽 东

三月二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三

已阅，同意。

退彭真同志。

四

此件〔3〕未经本人看过，据说本人还要研究修改。

五

去掉一句。〔4〕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六

毛主席的这四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5〕

七

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

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八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6〕作出要在全中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九

这样较妥。〔7〕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十

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8〕

十一

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9〕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

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十二

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十三

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也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盲目的模仿。盲目的模仿不能成为艺术。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十四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其他重大战役的文艺创作，

要趁着领导、指挥这些战役的同志健在，抓紧搞起来。

十五

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

十六

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对人家说我们简单粗暴要有分析。我们有的批评基本正确，但是分析不够，论据不充分，说服力差，应该改进。有的是认识问题，先说我们简单粗暴，后来就不说了。但对敌人把我们正确的批评骂做是简单粗暴，就一定要坚决顶住。

十七

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十八

以上整个座谈纪录所说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江青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至二十日在上海主持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的批语、批注和修改。这个纪要原标题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这个座谈会纪要，并将标题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审阅修改座谈会纪要后写给江青的两个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在彭真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报送的中央转发这个座谈会纪要的指示稿上的批语；本篇四、八、十二、十八是毛泽东在座谈会纪要中加写的文字；本篇五、九是毛泽东在座谈会纪要上的两个批注；本篇六、七、十、十一、十三至十七是毛泽东对座谈会纪要的修改，其中用宋体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对这个座谈会纪要，毛泽东还作了一些其他修改，主要有：把“在伟大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把“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改为“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删去“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高峰”、“解放军是主席亲手缔造的”等语句。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座谈会纪要。一九七九年五月三日，经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报请中央批

准同意，撤销了这个座谈会纪要，并对因座谈会纪要影响而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予以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各件，指报送毛泽东第三次审阅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江青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关于送审座谈会纪要给林彪的信，林彪三月二十二日关于送阅江青三月十九日的信和座谈会纪要给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的信。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科学小组组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

〔3〕此件，指《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到的《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这篇谈话经过整理，一九七九年九月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4〕《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讲到江青这次“同我们一起交谈，一起看影片、看戏”，“大家一致认为等于进了一次短期训练班”。毛泽东审阅时，删去“大家一致认为等于进了一次短期训练班”一句，并写了这个批注。

〔5〕四篇著作，指《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

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到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一句，原为“够我们无产阶级用几百年的了”。

〔6〕十中全会，指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7〕《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讲到近三年来出现了许多“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毛泽东审阅时将其改为“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并写了这个批注。

〔8〕这句原为“文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

〔9〕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对王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的错误不再定性为“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而定性为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等。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1〕}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在上海同康生、赵毅敏等谈学术批判问题时的谈话节录。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学术批判文章不要送审。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去年九月工作会议，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赵毅敏，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对中共代表团与日共代表团 联合公报草案的修改^{〔1〕}

（一九六六年三月）

一

两党代表团一致确认，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的计划，全世界人民和反帝力量团结起来，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最广泛的（不是狭隘的）最真实的（不是虚伪的）国际统一战线，是极其重要的国际任务。其中，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团结最为广泛，又最为真实，因为他们是要真正革命的，因此我们对此要特别加以注意。

二

双方还认为，为了加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需要加强国际民主运动方面的活动，并且一定要坚持反映全世界革命人民愿望的真正革命的方针。

三

正如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

年声明^{〔2〕}强调指出的，反对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同时一定要坚决反对并且克服我们两党自己内部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而最主要的是要坚决反对我们两党内部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思潮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如若不注意，并采取措施加以克服，那是十分危险的。以苏联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在反对我们的时候，不说我们是修正主义者，而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这种说法，正是指的真正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国际革命党派和革命人民的团结，而不是别的。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以日本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为团长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于一九六六年二月至四月访问中国。三月上旬，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等同日共代表团举行三次会谈，由双方代表团起草小组根据双方会谈内容起草了联合公报草案。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对周恩来、彭真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报送的公报草案的修改，其中用宋体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毛泽东对公报草案还有一些其他文字和内容的修改。后来这个公报草案未能达成协议。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一九五七年宣言，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宣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各国共产党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任务，规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之间关系的准则，并要求各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民主德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苏联、越南、蒙古、朝鲜和中国等十二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一九六〇年声明，指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一日在莫斯科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闭幕大会上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声明就国际局势、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迫切问题，分别作了阐述，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民族解放运动是防止世界战争的重要力量，并重申了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宣言的正确性。

对《记者简报》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四月）

已阅。退江青。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江青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报送的《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三月三十日编印的《记者简报》上的批语。这期简报刊登了一些历史学家对三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的戚本禹等人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该批判》的反应。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这篇文章分析不够全面，说“让步政策”不是翦伯赞的主要问题，事实上翦伯赞对“让步政策”谈得并不多，也不强调这个问题。翦伯赞是在一九五一年第一次提出了“让步政策”，但事实上，早在一九四一年陈伯达就在《解放》杂志上提出了“让步政策”，后来影响到许多人都用上了。戚本禹，当时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翦伯赞，历史学家。当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毛泽东的秘书。

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 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

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2〕}，读二十四史^{〔3〕}，读诸子百家^{〔4〕}，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譬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一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极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从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

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一些从事过一二次“四清”运动^{〔5〕}从工人农民那里取了经回来的人，他们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干劲，这就好了。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泯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6〕}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

毛 泽 东

四月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编印的《文电摘要》第一六八号上。这期摘要刊登的《在京艺术

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介绍了中国音乐学院抽调一年级学生和部分教师分别到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北京分公司试行在工厂办学、到北京市海淀区温泉公社试行半农半读的情况。

〔2〕五经，中国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的合称。在封建社会，五经成为统治阶级宣传宗法封建思想的理论依据。四书，中国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从南宋淳熙以来，四书成为封建社会学校的教科书和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

〔3〕二十四史，指清朝乾隆皇帝钦定的中国历代王朝的二十四部正史。起于《史记》，止于《明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明末共四五千年的中国历史。

〔4〕诸子百家，先秦至汉初各个学派的总称。诸子，指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儒家的孔子、孟子，道家的老子等，亦指其代表作；百家，指各个学派。

〔5〕“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五月先后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运动。

〔6〕这是唐代诗人章碣写的七绝《焚书坑》。原诗是：“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对全国政协一届会议 开幕词中一段话的批注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

这一段话〔1〕讲得准确，请同志们经常地讨论这个问题。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一段话，指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的一段话：“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一九六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关于机要保密工作的一些指示编印在一起，准备发给参加全国机要保密会议的人员学习。毛泽东审阅时，在这段话后面加括号写了这个批注。

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六年四月）

—

有一些修改^{〔2〕}，请斟酌。送恩来、小平、彭真、康生同志。

毛 泽 东

四月十四日上午

二

江青：

送上北京来件^{〔3〕}二份，请你们研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请康生、伯达^{〔4〕}诸同志于今日或明日去上海同你们共同讨论一次，然后由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接来此地作报告，最后定案。

毛 泽 东

四月十四日上午八时半

三

恩来、小平、彭真同志：

四月十二日的信及附件，收到阅悉。

请康生、伯达同志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组同志于今天（十四日）或明天去上海，同上海同志商量一下文件问题，然后请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或十七日上午来此地。

你们可于十六日来此。

各中央局是否要来人，请你们酌定。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上午九时

根据手稿刊印。

四

已阅。

退康生办。^{〔5〕}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五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6〕}，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六

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七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

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根据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八

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九

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十

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一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

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7〕}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哪一个文件是错误的，哪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哪些成绩，有哪些错误。

根据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1〕中共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经多次修改后，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后通称“五一六通知”），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在《人民

日报》发表。本篇一至四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时的批语。本篇五至十一是毛泽东对这个通知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一九六四年七月七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设立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组成。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自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以来学术批判的形势、性质、方针、队伍等问题，会后整理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通称为“二月提纲”），报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这个汇报提纲。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吴冷西，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晗，历史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兼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因写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受到错误批判。一九六九年十月被迫害致死。一九七九年三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为这个冤案平反。

〔2〕有一些修改，指毛泽东对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从北京报送他的中共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稿）的修改。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这时毛

泽东在杭州。

〔3〕北京来件，指中共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稿）。

〔4〕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5〕康生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在报送中共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四月十七日修改稿）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通知》第四页第七条末句，按主席指示，作了修改，请审阅。”第七条末句，原文是“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的大学阀”，改为“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6〕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公布重新设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这个名单，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过多次变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后简称中央文革或中央文革小组。

〔7〕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十五日被先后解除这两个领导职务。

对高教部党组部署深入开展 学术批判运动情况简报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此件好，发各同志^{〔2〕}看。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毛 泽 东

四月二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教育办公室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九日关于高教部党组召开座谈会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情况简报上。简报说：高教部党委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七日召开北京、天津十所高校党委书记、宣传部长会议，讨论和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问题。会上，北京大学等学校汇报了前一时期学术批判情况，提出目前在批判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领导思想落后于实际，从学术观点上批判得多，从政治观点上批判得少，没有自觉地认识到这是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会上对今后深入开展这一运动作了如下部署：（一）各院校领导必须明确，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艺教育战线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也是教育战线彻底清

除资产阶级专家垄断教育的斗争，是夺教育领导权的斗争。（二）目前高校的所有工作都要和当前学术批判结合起来，通过学术批判来推动教育革命和教学改革。（三）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师生和教职员工积极参加这场战斗。

〔2〕各同志，指正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同志。这次会议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在浙江杭州召开。会议主要批判彭真，同时讨论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汇报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市长。

对《毛主席诗词》（注释本）中 几个问题处理意见的请示信 的修改和批语^{〔1〕}

（一九六六年四月）

—

一九三〇年六月，中央红军由福建汀州（长汀）进军江西。七月，又从江西向湖南进军，准备第二次攻取长沙，结果未能攻入。在当时敌我力量对比的条件下，敌人已有准备，进攻长沙是不正确的。但当时由于蒋、冯、阎在河南大混战^{〔2〕}，南方湘赣诸省在半年之内，除长沙、南昌诸城之外，其余地方都无强敌。所以红军乘此机会，攻取了大片地区，扩大了部队，为粉碎第一次敌人的“围剿”准备了条件。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说服，中央红军的干部终于改变作战方针，分兵攻取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吉安、峡江、新喻^{〔3〕}等地，使红军力量和农民土地革命斗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首词是写红军在进军中的豪情壮志的。^{〔4〕}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二

可以。

三

已阅。退乔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胡乔木一九六六年四月五日关于《毛主席诗词》（注释本）中几个问题处理意见的请示信的修改和批语。请示信说：在主席诗词注释本中，有两三处比较重要的问题需要请示。（一）对《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根据总政几位同志的建议，参照《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其注释，作了一个题注，不知是否适当？请批示。（二）《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据袁水拍同志告主席意见，仍作“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三）《七律·送瘟神》一诗中的“千村薜荔人遗矢”，据读者来信和查阅有关典籍，拟改作“千村薜荔人遗矢”。以上两处正文的更动，未知可否？请一并指示。本篇一是毛泽东对胡乔木的请示信第一项内容（题注）所作的修改，其中用宋体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本篇二是毛泽东对胡乔木请示信第二、三两项内容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在胡乔木请示信信封上的批语。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蒋，指蒋介石。冯，指冯玉祥。阎，指阎锡山。一九三〇年四月，阎锡山、冯玉祥分别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副总司令名义，通电反蒋，爆发了一场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大规模军阀战争。这次战争从五月正式开始，至十月基本上结束，历时半年，战区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陇海、津浦、平汉各铁路沿线，双方共死伤三十万人以上。史称“蒋冯阎大战”，亦称“中原大战”。

〔3〕新喻，今江西新余。

〔4〕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中，对这条题注稿作了修订。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又对个别文字作了修改。现在的文字是：“一九三〇年六月，红军第一军团（开始称第一路军）由福建省汀州（长汀）进军江西省。八月，从江西向湖南进军，在浏阳东北同彭德怀领导的红军第三军团会合，并决定共同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九月，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未克。守敌强而有备，红军不宜攻坚。同年夏由于蒋、冯（玉祥）、阎（锡山）正在河南等地混战，数月之内江西、湖南一带，除长沙、南昌等大中城市外，都无强敌。因此，毛泽东说服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改变当时立三路线的党中央指示的夺取湘鄂赣三省省会的冒险方针，分兵攻取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吉安、峡江、新喻（今新余）等地，占领了大片地区，扩大了部队，为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准备了条件。这首词写的是红军六月、七月进军中的豪迈心情。”

对林一山关于修建长江三峡 工程综合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四月）

已阅。

需要一个反面报告。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一九六六年三月九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关于修建长江三峡工程的综合报告的批语。综合报告说：长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研究，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按照主席所指示的“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和“有利无弊”的方针进行工作。三峡水利资源综合利用效益极大，但要积极开发，就必须解决建设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问题。三峡水电站是一个特大型水电站，这个矛盾就显得更加突出，这也是有人反对近期建设三峡的一项重要根据。最近几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们着重研究了建筑物防护、水库淤积和分期建设等三个问题，进一步认识到分期建设更符合于“有利无弊”的方针，大大增加了近期建设三峡工程的可能性。三峡水利枢纽的规划设计原则是：综合利用，合理安排防洪、发电、航运，充分利用水利资源，除害兴利，在其

他防洪工程配合下，逐步达到根治长江的目的。在实现各项水利目标的程序上，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逐步实现。分期建设可以用较少的投资额、较短的工期，尽早地发挥效益，有利于国家资金的合理使用，同时也有利于工程防护。报告在对三峡工程的防淤、防空等问题进行了具体论证后提出，根据当前国家经济发展情况，三峡工程宜早不宜迟，建议中央将这一工程列为第三、四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项目。四月十日，王任重将林一山的这个综合报告及所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设计简要报告》和《水库长期使用报告》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综合报告的批语，写在王任重的送审报告上。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 农副业生产报告给林彪的信^{〔1〕}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十四日）

—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2〕}，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3〕}；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

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有手稿）

二

林彪同志：

此件〔4〕如你同意，即可印发中央军委以及此次会议〔5〕，让他们带回去，加以讨论，如无意见，即可执行。印时，要请

中央加个批语^{〔6〕}。请你酌办。

毛 泽 东

五月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在审阅林彪一九六六年五月六日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五月二日给中共中央军委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的信。因毛泽东的信写于五月七日，后来通称“五七指示”。本篇二是在审阅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对总后勤部报告的批示和阅看康生、陈伯达五月十三日给毛泽东的附信后给林彪的信。附信说：我们同杨成武同志读了一遍，对批示分了段，对总后勤部报告，删了一段，并作了个别文字修改，请审核。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杨成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

〔2〕总后勤部的报告，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报告说，从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好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二）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三）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四）全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

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总的想法是：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

〔3〕社教四清运动，指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五月先后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4〕此件，指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给林彪的信》。见本篇一。

〔5〕此次会议，指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6〕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五月七日给林彪的信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报告，并加批语指出：“中央认为，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这一思想，不仅对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可能的进攻，加强国防、贯彻人民战争思想方面，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对《评〈前线〉、〈北京日报〉的 资产阶级立场》清样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五月）

字太小，改印五号字，今日印好，中午交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送审的戚本禹《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文清样的批语。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七期，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转载。戚本禹，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印发张恩慈对北京大学 “四清”运动意见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一日）

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2〕}

毛 泽 东

五月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对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干部、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张恩慈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写的《我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的批语。张恩慈对北大“四清”工作队、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对北大“四清”运动的领导，以及北大贯彻教育方针等问题，提出了不少尖锐意见。毛泽东批示印发时，将标题改为《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

〔2〕少奇，即刘少奇。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三日，刘少奇批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此件请即印发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同志。”这次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北京举行。

对章士钊关于暂不出版 《柳文指要》来信的批语和批注^{〔1〕}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

—

刘、周、邓^{〔2〕}阅。送康生^{〔3〕}同志，与章先生一商。一是照原计划出版；二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二者择一可也。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不可能这样快。^{〔4〕}

三

此语说得过分。^{〔5〕}

四

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6〕

五

何至如此。〔7〕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对章士钊关于暂不出版《柳文指要》来信的批语。本篇二至五是毛泽东对章士钊来信的批注。《柳文指要》是章士钊所著的一部专门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文集的著作。章士钊，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一九六五年，章士钊将这部书稿送毛泽东审阅。同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复信提出意见（见本册第87页），并于八月五日将书稿批给康生阅读（见本册第117页）。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将书稿连同康生的意见和来信一并退给章士钊（见本册第202页）。五月十日，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信，提出暂不出版《柳文指要》。信中说：连日读到各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详细记载，“我的思想不期受到绝大的震动。而将自己的笔墨工作，仔细检讨，觉得最近提交中华书局准备出版的《柳文指要》，应当撤回重行检查”。《柳文指要》一书，

后经作者修改，一九七一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2〕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4〕这个批注写在章士钊信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开一阖速战速决”一句旁。

〔5〕章士钊的信中说：“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毛泽东在其中的后半句旁画了一条竖线，并写了这个批注。柳子厚，即柳宗元，字子厚。

〔6〕章士钊的信中说：《柳文指要》“这一类著作，放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令体无完肤”。毛泽东在“痛加批判”四字旁画了一条竖线，并写了这个批注。

〔7〕章士钊的信中说：自己因著《柳文指要》一书而“成为大众向上的绊脚石。换言之，即不啻此次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反而不知不觉间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膺惩”。毛泽东在其中的“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膺惩”一句旁画了一条竖线，并写了这个批注。

关于同意派临时工作组 去人民日报社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日）

同意这样做。

毛 泽 东

五月三十日二十三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刘少奇、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日给毛泽东写信说：两个月来，《人民日报》的威信大大下降，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由于报社编委会不能改变现在的局面，许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组去。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的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五月三十一日即进报社工作。报社内部进行整风、学习文件，也可以继续写大字报。一部分态度较好、愿意积极工作的编辑人员，要集中力量维持每日版面。在报纸版面改观后，再进一步解决内部问题。信末还附有临时工作组在京人员名单。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

关于播发《宋硕、陆平、彭珮云 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大字报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

康生、伯达^{〔2〕}同志：

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毛 泽 东

六月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上。这期简报刊登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勇、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写的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这张大字报，新华社六月一日全文播发，《人民日报》等报刊六月二日刊载。宋硕，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陆平，

当时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北京大学校长。彭珮云，当时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此后不久，他们均被错误地撤销领导职务。聂元梓、赵正义，当时分别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宋一秀、夏剑勇、杨克明、高云鹏、李醒尘，当时均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

〔2〕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对《首都工作组会议 纪要》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

总理：

此件已阅，很好。

毛 泽 东

六月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报送《首都工作组会议纪要》给毛泽东的报告上。《首都工作组会议纪要》介绍五月二十六日召开的这次会议研究了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提出首都工作组是组织领导确保首都安全工作的，直接对周恩来和中央常委负责，并决定如遇紧急情况需要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周恩来在首都工作组会议上说：加强首都卫戍工作牵涉到全局，从今天起，就要狠抓，不能放松，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首先要组织落实，把卫戍司令部调整健全起来，调部队、调人不能讲价钱。卫戍部队政治工作的口号是“保卫首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总政治

部、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都要抽调力量，深入部队作政治思想工作。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对外交部关于周恩来 率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 请示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

拟同意。请刘、邓^{〔2〕}酌定。

毛 泽 东

六月十六日二十三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外交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报送的关于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的活动安排和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上。方案建议同罗方着重会谈国际形势、中苏关系和中罗关系三个问题。

〔2〕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关于暂不发表毛泽东在七千人 大会上的讲话等问题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

少奇、小平^{〔1〕}同志：

来电^{〔2〕}早已收到。经过考虑，那篇讲演^{〔3〕}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王任重^{〔4〕}同志也不赞成现在发表。另外，请告伯达、康生、陶铸^{〔5〕}同志，将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二条草案^{〔6〕}，扩成为二十条左右。因为十二条草案中有许多条混淆不清，有若干条，每条可分为两三条，使每一条只说一件事，明白晓畅，读者易懂，较为适宜。希望在一星期内，在北京讨论几次，并草成第二稿，给我送来两份为盼。另外，华东局二十一日给中央报告华东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部署那些方面^{〔7〕}，值得参考。

毛 泽 东

六月三十日二时

根据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少奇，即刘少奇。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务院副总理。

〔2〕来电，指刘少奇、邓小平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党的诞生四十五周年将届，为了更好地推进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帮助各级党委和干部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改进工作，书记处建议并得到几个常委同意，拟将主席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七一”这一天发表。当时毛泽东在湖北武汉。

〔3〕那篇讲演，指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通称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后来，这篇讲话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

〔4〕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5〕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6〕中共中央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二条草案，曾扩展为二十三条，最后确定为十六条，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十六条”）。

〔7〕中共中央华东局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给中央、毛泽东并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华东局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报告》中说：六月三日至六日，华东局召开书记处会议，传达和讨论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关于进一步推进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坚决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在运动中，要进一步组织工

农兵和干部大学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会议研究了以下政策和部署：（一）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二）坚定地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和打击右派。对于只有个别缺点的左派，应加以保护，不要混淆斗争目标。要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或写过一些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要注意把资产阶级“学阀”、“权威”，同有一般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对于右派，要抓要害，抓要害的单位、要害的人物，特别是要首先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报上点名公开批判要慎重、要准确。干部的撤职免职以及在报上公开批判的，均应按照干部管理的范围，由上级批准。（三）重新组织革命的文化队伍。（四）“四清”运动要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五）加强党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各级党委的领导，应当采取重点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对各单位的运动，派不派工作组，什么时候派工作组，应当根据情况的发展需要来考虑。报告最后指出，当前各级党委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文化大革命，全面安排工业、农业、财贸、小三线建设等项工作。七月六日，中共中央转发华东局的这个报告。

七 律 有 所 思

(一九六六年六月)

正是神都有事时，
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
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
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
故国人民有所思。

根据《毛泽东诗词集》刊印。

(有毛泽东手稿)

必须组织和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

（一九六六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组织、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并且依靠他们发动群众，团结群众，教育群众。^{〔1〕}

根据《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九期刊印。

注 释

〔1〕这是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的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中，在“毛主席教导我们”后引用的一段文字。七月三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社论。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工交企业和基建单位如何开展 文化大革命运动通知稿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日）

少奇、小平^{〔1〕}同志：

六月三十日给我的信和通知^{〔2〕}，已经收到看过。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

毛 泽 东

七月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少奇，即刘少奇。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信和通知，指刘少奇、邓小平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给毛泽东的信和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草稿）》。刘少奇、邓小平的信中说：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

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好，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完不成。在京同志讨论后认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教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交、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即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编者注）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拟了一个通知，请审核。刘少奇、邓小平报送的通知草稿指出：目前各地党委需要用很大力量领导正在开展的文化教育方面的革命运动，同时也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特点。中央认为，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根据各地原来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通知要求，各地党委必须抓革命、保生产，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的单位，要以主要力量抓革命，同时也要组织一个班子，专门抓生产建设工作。七月二日，中共中央下发这个通知。

给江青的信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江青^{〔1〕}：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2〕}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3〕}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4〕}，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5〕}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6〕}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7〕}，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8〕}，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9〕}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

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10〕}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11〕}，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12〕}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13〕}，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

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14〕}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根据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2〕魏，指魏文伯，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陈，指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3〕那里，指上海。

〔4〕两次外宾接见，指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在武昌会见尼泊尔王国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七月十七日在武昌会见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和一些国际组织的观察员。

〔5〕武林，指浙江杭州。

〔6〕西方的一个山洞，指湖南韶山的滴水洞。

〔7〕白云黄鹤的地方，指湖北武汉。

〔8〕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讲政变问题的长篇讲话。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转发这篇讲话。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9〕见《晋书·阮籍传》。原文为：“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10〕见《后汉书·左周黄列传》。原文为：“‘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11〕四月杭州会议，指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在浙江杭州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12〕北京五月会议，指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3〕一九七二年五月，毛泽东的这封信曾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印发。一九七二年十月一日、一九七三年九月二日和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人民日报》曾先后发表这封信的部分内容。

〔14〕 一群海岛，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岛、澎湖列岛及其周围的大小岛屿。

对陶铸、张平化关于中宣部的 组织和工作问题请示信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

陶铸同志：

同意你们的意见。请中央常委最后决定。

毛 泽 东

七月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陶铸一九六六年七月七日报送他和张平化七月五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于中央宣传部的组织和工作问题的请示信的报告上。请示信的主要内容是：（一）彻底改组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二）新的工作方针。今后最根本的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宣传毛泽东思想。（三）目前工作的抓法。计划在七、八两月，组织对处长以上重点对象的批判，并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发扬民主，揭露问题，结合扩大队伍，把文化革命搞深搞透。同时，抽出一部分力量，抓在九月召开的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一些日常工作。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张平化，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对北京语言学院七名学生 来信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

伯达、康生^{〔1〕}酌处。

此件^{〔2〕}已阅，请你们看一下。他们所谈问题，确实重要，应在运动中解决。请你们通知他们：信已收到，看到，并注意了。

毛 泽 东

七月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会议文件刊印。

注 释

〔1〕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2〕 此件，指北京语言学院七名共青团员、青年学生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我们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过去他们在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经受了考验，不愧为英雄好汉。现在他们当了“官”，做了“老

爷”，政治上有了地位，生活上有了特殊待遇，革命性也就远不如以前高了。长此以往，他们就会逐渐失去在革命道路上前进的“自由”，就会逐步蜕化成特殊阶层、修正主义者。为此，我们认为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革：（一）降薪，取消各种特殊待遇。（二）革命干部应该经常地参加劳动。（三）凡是违犯党纪国法，做出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应一律予以制裁。（四）尽快在全国普及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五）在假期，青年学生经常组织起来，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劳动，或者到部队去当兵。毛泽东的批语和这封信，曾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

畅游长江时的谈话^{〔1〕}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

—

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

二

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根据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上午在武汉畅游长江时的谈话。毛泽东畅游历时一小时零五分，游程近十五公里。

对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 的文件稿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月）

一

伯达同志：

此件看过，很好。工作组开一二次会，然后经政治局会议（有各中央局及上海、北京两市负责同志参加）开两三天会，讨论通过，即可用中央委员会名义公开发表。以在八月一日发表为好。后两叶^{〔2〕}有点修改^{〔3〕}。

毛 泽 东

七月二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七月二十六日修正稿^{〔4〕}。

供讨论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三

伯达同志：

改得很好，可即印发。^{〔5〕}

毛 泽 东

八月三日下午九时

四

伯达同志：

《决定》中“无名小卒”，以改为“无名青少年”较妥，请酌定。^{〔6〕}

毛 泽 东

八月七日下午二时

五

即送伯达同志：

同意修改之处。在第十页上改了几个字，请酌定。^{〔7〕}

毛 泽 东

八月七日下午十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毛泽东写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

的若干方针问题》七月十六日草稿上。本篇二毛泽东写在陈伯达七月二十六日晨送审的标题改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政策问题》的修改稿上。这两次稿的内容均为二十三条。之后几经修改，在七月二十九日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时，标题又改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内容压缩为十六条。本篇三毛泽东写在陈伯达八月三日晚送审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修正稿上。陈伯达在给毛泽东的送审报告中说：“今日上午，康生、陶铸、王任重、张春桥等同志和我，考虑小组会上的意见，对这个稿子，又作了些修改。请审阅批示！”本篇四毛泽东写在经陈伯达再次修改的八月三日修正稿上。本篇五毛泽东写在陈伯达八月七日晚八时四十五分送审《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修正稿的报告上。报告说：您改的地方，很好，已照改。今晚开小组会，大家提议修改几处（第四页、第六页、第七页、第九页）。请审正。其中，加了一句“路线的错误”，请您考虑是否妥当。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张春桥，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2〕古代汉语书面语中，“叶”通“页”。

〔3〕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送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草稿），共十九页。在第十八页，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一句，改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在第十九页，将

“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和“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两句中的“最高指示”四个字，都改为“行动指南”；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一句，改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取得伟大的胜利。”

〔4〕七月二十六日修正稿，指陈伯达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晨送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政策问题》修改稿。毛泽东在这次修改稿第七页“各单位党的领导要善于倾听群众的各种意见”和“党的领导要同群众一起”两句中的“党的领导”后，分别加上了“和革命群众中的骨干分子”十一个字。此外，在其他地方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

〔5〕毛泽东对陈伯达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晚送审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修正稿的内容有比较多的修改。一、加写的整段内容有：（一）“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三）“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四）“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二、改写的主要内容有：（一）将“当前开展的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一句，改写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二）将“在当前，它必须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改革教育制度和教育方针方法，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一句，改写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三）将“同对待其他革命运动的态度一样，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是能不能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标志”一句，改写为：“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6〕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伯达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七日晚十一时批示印发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修正稿第二页上，将“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无名小卒成了勇敢的闯将”一句中的“无名小卒”，改为“无名青少年”。

〔7〕陈伯达一九六六年八月七日晚送审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修正稿第十页写道：“对一般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划这样一条大杠杠，是必要的。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不断改造。”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的“划这样一

条大杠杠，是必要的”一句，并将“对一般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改为“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将“可以帮助他们不断改造”改为“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八月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这个决定。随即，毛泽东再次审阅全会通过的这个决定，并在“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一句中的“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前，加写“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十四个字。八月九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十六条”）。决定中有几段文字收入经毛泽东审定、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中。这几段文字是：（一）“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二）“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三）“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四）“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此外，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论《伟大的战略措施》中，在“毛主席指出”后，刊登了决定中的以下一段文字：“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关于不要用“顶峰”、 “最高指示”一类语言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八月四日）

—

陶铸同志阅后，退张平化^{〔2〕}同志：

此件^{〔3〕}看过，可用。在第五页上将“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毛 泽 东

七月二十五日

二

可发各省、市、区党委注意掌握。^{〔4〕}

毛 泽 东

八月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对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陶铸送审的新华社电讯稿《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会议愤怒声讨文艺界黑线总头目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的批语。七月二十九日，这篇电讯稿在《人民日报》发表。本篇二是对陶铸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的批语。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又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周扬，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地指控为所谓“文艺黑线”的代表。一九七九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文化部党组的决定，指出解放后十七年根本不存在什么“文艺黑线”和以周扬等为代表的“黑线代表人物”问题，凡因所谓“文艺黑线”等错案受到打击和诬陷者，一律予以彻底平反。

〔2〕张平化，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3〕此件，指《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会议愤怒声讨文艺界黑线总头目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的新华社电讯稿。毛泽东将此稿第五页“他竭力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文艺创作的最高指示”一句中的“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

〔4〕陶铸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说：七月二十八日上午，中央宣传部召集首都各报负责人，传达了主席七月二十五日的指示，作了讨论。大家建议采取如下步骤：（一）在代表党政领导机关的发言和文件中，在报纸的社论、标题、按语和新闻导语中，都不用这类语言；在群众稿件中有这类语言的，还应当保留一个时期。（二）外国朋友赞扬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应按照他们的原话报道，不要用推论的方法去“加码”。有些不符合主

席此次指示精神的话，仍可报道，但不要用在标题上。（三）“反党黑帮”必然会利用我们改变提法的机会向党反攻，从根本上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应当揭露他们的阴谋。以上意见是否可行，请中央指示。如认为可行，目前应传达到什么范围，亦请中央考虑决定。八月四日，中共中央将陶铸的报告发至省军级。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红卫兵的复信和批语^{〔1〕}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一日）

—

各同志^{〔2〕}：

请考虑此件及附件^{〔3〕}是否正确。有错误，请指正。

毛 泽 东

七月三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4〕}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诉，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

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根据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关于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复信及对他们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七月四日《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审改的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复信。毛泽东的复信和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两张大字报，作为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毛泽东的复信虽然没有发出，但已在社会上迅速传布，此后大中学校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这两张大字报，后来刊登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一期，标题分别改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转载。

〔2〕各同志，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王任重、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关锋、戚本禹、李雪峰、吴德等十五人。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又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王任重、张春桥，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王力、姚文元、关锋、戚本禹，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3〕此件，指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复信》。即本篇二。附件，指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写的大字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七月四日写的大字报《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4〕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报送江青审阅，并请江青转报毛泽东，请求批示。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1〕}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2〕}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3〕}，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写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北京日报》上并经过两次修改的一段文字。这一天的《北京日报》转载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毛泽东在第一次

修改时，加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标题。这张大字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到县团级，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这张大字报标题中所说的“司令部”，实际上是指“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性的所谓以刘少奇为“总头目”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大字报中所说的“在五十多天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实行白色恐怖”，是指“文化大革命”初期向一些单位派工作组一事，后来被错误地指责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指导运动，是我们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种做法，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同志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2〕指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勇、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写的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聂元梓、赵正义，一九六六年七月前分别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宋一秀、夏剑勇、杨克明、高云鹏、李醒尘，当时均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宋硕，一九六六年六月前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陆平，一九六六年七月前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北京大学校长。彭珮云，一九六六年七月前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3〕评论员的评论，指《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发表的本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一文中加写的批注^{〔1〕}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是《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为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而刊发的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此文时，毛泽东在其中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句后，加括号写了这个批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的批注和这篇文章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到县团级。聂元梓，一九六六年七月前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

对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公报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九日、十一日）

一

康生同志：

改得好。我只在第五页上去掉一句^{〔2〕}。

毛 泽 东

八月五日

二

康生同志：

有些修改^{〔3〕}，请酌定。其他都同意。

毛 泽 东

八月九日下午

三

康生同志：

可照此印发。

毛 泽 东

八月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四

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所进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正在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活动。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貌似强大，实际上是很虚弱的。从长远看来，他们都是纸老虎。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五

八届十一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师生、科学技术人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六

我们一定要百倍地提高警惕，防止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

突然袭击。如果它们胆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七亿中国人民，就一定要打断侵略者的脊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们消灭掉。

根据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对康生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送审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对康生八月九日送审的这个公报稿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对康生八月十一日送审的这个公报稿的批语。本篇四是毛泽东在八月九日送审的这个公报稿中加写的一段文字。本篇五是毛泽东对八月九日送审的这个公报稿中一段文字的修改。本篇六是毛泽东对八月五日送审的这个公报稿中一段文字的修改。本篇五、六中用宋体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个公报于八月十二日经全会通过，八月十四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2〕去掉一句，指毛泽东在康生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送审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第五页上删去了一句。这句是：“全会热烈拥护刘少奇同志代表我国发表的声明。”这里所说的声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发表的关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援越抗美的声明。

〔3〕有些修改，指毛泽东对康生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送审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的修改。除本篇四、五外，还将“全会强

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我国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划时代的新发展”一句中的“划时代的新发展”，改为“一个发展”。

对李达来信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

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

毛 泽 东

八月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收到李达七月十九日请求毛主席解救他的来信后的批语。同日，陶铸接到毛泽东的批语后，立即批示：“即送任重同志。”八月二十四日，李达被迫害致死。李达，原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武汉大学校长。当时被错误地打成所谓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头目”，戴上“叛徒”、“地主分子”的帽子，并被开除党籍。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党籍。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在中央群众接待站 会见首都群众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

根据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晚七时十五分，毛泽东来到中南海西门外中共中央的群众接待站，会见前来庆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八月八日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首都群众，向大家说了这句话。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闭幕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

关于第九次大会的问题，恐怕要准备一下。第九次大会什么时候召集的问题，要准备一下。^{〔1〕}已经多年了，八大二次会议^{〔2〕}到后年就十年了。现在要开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会来筹备这件事，好不好？

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3〕}，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

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1〕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

〔2〕八大二次会议，指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3〕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和批准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际国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措施，讨论和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通称“十六条”）。全会还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朱德、李富春、陈云等十一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是新增选

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中林彪名列第二位，刘少奇则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之后只有林彪被称为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央副主席职务均不再提及。

对陈伯达、康生关于李雪峰 不再兼任北京市委书记 请示报告^{〔1〕}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

林、周、陶、刘、邓^{〔2〕}、雪峰同志阅，请林主持开会谈一下。雪峰市委〔书记〕暂时似可名义上不动，实际工作交与吴德^{〔3〕}主持，需要华北局支持时去支持一下，似较好，请酌。

毛 泽 东

八月十五日二十二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陈伯达、康生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给毛泽东的关于李雪峰不再兼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请示报告说：“我们请主席考虑，雪峰同志是否可以集中力量管华北局，不必再兼北京市委书记，市委书记可由吴德同志接任。”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北局第

一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2〕林，指林彪。周，指周恩来。陶，指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吴德，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理市长。

给刘少奇的信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

少奇同志：

给续范亭信^{〔1〕}及我在信上建议改写的话，印象都不深了，如找到，请再给一阅^{〔2〕}，阅后送还，可否请酌。

毛 泽 东

八月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给续范亭信，指刘少奇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就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给正在延安养病的续范亭的信。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毛泽东读了刘少奇给续范亭的信后，对其中的一些观点和提法批注了自己的意见，并于十二月十七日给刘少奇写信说：“一气看完了你这一篇，前后看了三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见。”“我也没有研究透彻，不能说我批的全都无错，还请你看后告我。”毛泽东对刘少奇给续范亭信的批注主要内容，见《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81—84页。续范亭，一九四三年时任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

〔2〕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刘少奇将他给续范亭的信和毛泽东的批注一起报送毛泽东。

对林彪三篇讲话稿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

林彪同志：

这三件都看了，都赞成。

毛 泽 东

八月十六日下午七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报送毛泽东审阅他的三篇讲话稿中的八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上。报送的其他两篇讲话稿是：八月八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时的讲话稿、八月十二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稿。

为北京大学新校刊题写 的刊名和批语^{〔1〕}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

—

新北大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聂元梓同志：

如不好，可再写。

毛 泽 东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应聂元梓的请求给北京大学新校刊题写的刊名。本篇二是毛泽东关于题写刊名的批语。聂元梓，一九六六年七月前任中共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后来先后任北京大学革委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一九七一年初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被逮捕。一九八三年三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在庆祝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 同林彪的谈话^{〔1〕}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根据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出席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革命群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在检阅庆祝游行队伍时同林彪的谈话。

革命靠自己^{〔1〕}

（一九六六年）

革命靠自己。

根据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这是周恩来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革命群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的讲话中引用的毛泽东的话。

为《中国妇女》杂志题写的刊名^{〔1〕}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

中国妇女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应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蔡畅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的请求，为《中国妇女》杂志题写的刊名。八月二十五日，刊名在《人民日报》发表。

对薄一波来信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印发常委、文革小组及薄一波同志。

请一波同志将一个请求和一个设想，先用书面告我，然后谈话，可以缩短谈的时间。你是一个爱讲长话的人，我有点害怕听三四小时那样的长话。

毛 泽 东

八月二十一日夜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薄一波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八月十八日天安门上主席跟我握手并亲切勉励要我好好革命时，我深受感动。”“最近主席如果有时间，希望找我谈一次。我想主要谈两个问题：（一）工交各部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情况；同时检查我在运动中所犯的错误；及我的一个请求。（二）我对改革工业体制的一个设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工业交通办公室主任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因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遭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错误结论，使他们得到了平反昭雪。

对谢富治《关于公安部 精简机关的设想》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研究。我看这个设想是好的，应在下一次会议上谈一下。

毛 泽 东

八月二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谢富治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报送毛泽东的《关于公安部精简机关的设想》报告上。报告说：根据今年四月主席在杭州关于公安部应砍掉三分之二的指示精神，我们在五月间发动处以上干部就精简问题进行了鸣放辩论。经过几个月的酝酿，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解决精简问题已完全成熟了。目前公安部有行政编制一千四百多人，机构庞大。根据公安工作主要是依靠党、依靠群众的根本路线和上虚下实的原则，我们设想，把现在的十二个局合并为六个，九十个处合并为三十多个，行政编制由一千四百多人减到四百多人。企事业单位现有七千多人，分别交给有关单位。我们还设想，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彻底革

命，力争把行政编制减到二三百人。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内务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长。

关于传阅文件问题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陶铸^{〔1〕}同志：

传阅文件，应注明退何人存档。

毛 泽 东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二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革命青少年 要向解放军学习》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已阅。

退陶铸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陶铸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送审《人民日报》社论稿《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的报告上的批语。报告说：对当前的运动，需要从正面讲清楚一些政策问题。《人民日报》为此写了一篇强调要用文斗的社论。文革小组讨论了，觉得还可以用。《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广大革命青少年，决心在这个斗争中，进一步向解放军学习，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十六条指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不仅适用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且也适用于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篇社论于当日发表。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对李富春关于国务院八个口机关 文化大革命问题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各同志。此事应当讨论一下。

毛 泽 东

八月二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李富春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关于国务院八个口机关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报告上。报告汇报了国务院八个口（外事、文教、科学三口除外）机关两个多月来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对这些单位如何贯彻“十六条”，搞好文化大革命问题提出了十条意见。在八月二十九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此发表意见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它去搞。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对关锋、戚本禹反映北京市 文化大革命情况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此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委以及薄一波、陶鲁笳^{〔2〕}各同志。此事应当讨论一下。

毛 泽 东

八月二十八日上午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江青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报送的关锋、戚本禹八月二十六日反映北京市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报告上。报告说：北京市的红卫兵在八月十八日百万人大会后有了很大发展，各大、中学普遍建立了组织。当前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但也有一些缺点，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例如捉人、打人的现象很多，特别是捉了、打了一些好人和中间群众；抄家的范围宽了一些；对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干预得多了一点。北京新市委的一些领导人对红卫兵的活动采取消极观望态度，不敢积极出来领导运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别人利用某些学校的红卫兵对抗“十六条”，破坏文化大革命；（二）有些院校红卫兵的领导权落到了保皇派手里，他们实行没

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报告提出了新北京市委应站到运动第一线去领导运动、对工作组的路线应进行批判等四点建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关锋、戚本禹，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2〕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工业交通办公室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陶鲁笳，当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对章士钊反映被抄家情况 来信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

送总理酌处^{〔2〕}。应当予以保护。

毛 泽 东

八月三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章士钊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反映被抄家情况的来信上。章士钊在信中反映八月二十九日晚被抄家，请求毛泽东帮助，祈盼“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最要紧在不发生重复搜索”。据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所著《风雨情》一书第一章“我与父亲章士钊”中记载，九月一日，毛泽东给章士钊回信说：“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章士钊，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转来的信件和批语后，当即办理，并于八月三十日下午二时在信封上批注：“已办。周注”。同时，他还亲笔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领导干部和著名民主人士的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

蔡廷锴、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和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两高（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

对林彪在接见北京和来自 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退林彪同志：

这样修改^{〔2〕}，很好。

毛 泽 东

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十一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林彪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送审的在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稿上。同日下午，林彪和周恩来分别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2〕 修改，指林彪在送审的讲话稿中加写的文字。林彪在稿中“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这段文字之后，加写：“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1〕}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月五日）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二

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根据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
《人民日报》刊印。

三

即送陶铸同志：此件看过，照发。

毛 泽 东

九月五日二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二是《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社论《用

文斗，不用武斗》中引用的毛泽东的两句话。此前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过：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本篇三是毛泽东在陶铸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用文斗，不用武斗》上的批语。九月五日，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 成立二十一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

河内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越南人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英雄的越南人民，在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在抗美救国的伟大斗争中，不断地取得辉煌的胜利。中国人民对于兄弟的越南人民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感到无限的高兴。

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斗争，是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巨大支持和鼓舞。越南人民的胜利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美帝国主义不过是一只纸老虎，是完全可以被打败的；觉醒起来、敢于斗争、坚持斗争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现在，美国侵略者已陷入了越南人民战争的火海之中。越南人民万众一心，英勇善战，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把美

国侵略者打得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美帝国主义妄图以扩大侵略战争和玩弄“和谈”骗局来挽救它的失败，但是英雄的越南人民是吓不倒、骗不了的，美国侵略者无法逃脱它必然失败的命运。

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中国人民一贯坚决地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最近胡志明主席发表的号召书，再一次表达了越南人民抗战到底的坚强意志，中国人民表示最坚决和最热烈的支持。中国政府已经重申，中国七亿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中国辽阔的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中国人民下定了决心，做好了准备，随时随地同越南人民一道，共同打击美国侵略者，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祝中越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

根据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

《人民日报》刊印。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通知稿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

退总理。此件不发。

毛 泽 东

九月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总理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稿上。通知稿的主要内容是：（一）在运动中，对于党和国家的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必须坚决进行保护。（二）对上述部门和单位，如发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破坏，必须依法处理。（三）重要档案应加以封存。（四）此通知发至县团级，内部掌握，不对外公布。

对总政关于全军军以上 机关暂缓开展文化大革命 运动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

照办。

毛 泽 东

九月一日下午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林彪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送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八月三十一日关于全军军以上机关暂缓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报告上。报告提出：全军军以上机关原拟从九月份起，以两至三个月的时间开展文化大革命。鉴于不少省市的领导班子已经瘫痪，有些省市领导干部向部队告急，要求军区派人帮助，这时如部队各级同时进行大烧大整领导机关，一旦地方有事，则部队无人控制。为了使军队能够担负起保卫国防和保卫地方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的任务，决定各大军区和驻大中城市的军、省军区、警备区等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暂缓进行，待地方文化大革命稍稳定

以后，再继续进行。已经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军种、兵种和技术院校仍继续进行。

对傅连璋来信的批语和复信^{〔1〕}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十二月二十八日）

—

送陶铸同志酌处^{〔2〕}。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

毛 泽 东

九月三日

二

傅医生：

前后送来各件都看到了。政治安排问题，很多人同样，现在还谈不到，等将来再说。

毛 泽 东

十二月二十八日

对自己的一生，要有分析，不要只见优点，不见缺点。

毛泽东又及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对傅连璋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来信的批语。傅连璋在信中向毛泽东反映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帽子，请求给予保护。本篇二是对傅连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来信的复信。傅连璋在来信中讲到自从对他进行斗争以来，所有的政治待遇（包括全国政协常委的待遇）都被取消，文件不能看，报告不能听。如何安排，请主席考虑。傅连璋，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华医学会会长。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一九六八年三月被迫害致死。

〔2〕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陶铸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即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望告总后勤部，按主席批示，对傅加以保护。”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对中央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告 西北局的两份电报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

照发。

毛 泽 东

九月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
抄件刊印。

注 释

〔1〕这是对周恩来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报送的两份中共中央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西北局的电报的批语。同日，这两份电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电报分别指出：“中央根据民族政策，决定对赛福鼎采取保护方针。王恩茂同志正确执行了中央决定，并非包庇赛福鼎。此事可正式向群众宣布。并向北京学生们解释新疆是少数民族占多数地区，此地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是加强维汉民族的团结，防止苏修和少数民族主义者的挑拨利用。”“为了保障边境安全，不使苏修有机可乘，中央决定伊犁、塔城、阿尔泰等边境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在学校、机关、企事业等单位可以运用‘四大’（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编者注）进行鸣放，揭露问题。解决问

题由区党委负责通过自上而下调整领导，以满足群众要求，不要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办法。特别要劝阻外地学生，不要进入这些地区进行串连。已去的外地学生，应经过说服，动员他们离开。此事望你们严格掌握。”赛福鼎，当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新疆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王恩茂，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 学生运动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2〕}各同志：

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3〕}，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4〕}，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5〕}，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

谭启龙^{〔6〕}和这个副市长^{〔7〕}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

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毛 泽 东

九月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有手稿）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

长、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报告上。报告说：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党委，“不是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而是“要工人农民对学生进行教育，说吃着农民的饭，穿着工人做的衣服，不能去胡闹”。“对学生不是叫他们游泳中去学游泳”，而“是说服教育不准进城”。“这是和中央对立的”。报告认为学生批判的方向是对的，“组织工人农民支援”批判对象，“这是方向的错误”。

〔2〕 恩来，即周恩来。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经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批准，陈伯达因病仍在休养中。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任重，即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在陈伯达养病期间代理组长职务。

〔3〕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批语和王效禹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等，并对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作出四条决定。

〔4〕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

〔5〕 郭影秋，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6〕 谭启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委第

一书记。

〔7〕这个副市长，指山东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

对党政干部任免审批手续 暂行规定（草案）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

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2〕}、北京市委各同志。
此事应在近日讨论一下。

毛 泽 东

九月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议讨论提出的《关于党政干部任免审批手续的暂行规定（草案）》给毛泽东、林彪并政治局常委的报告上。周恩来在报告中说：常委碰头会议关于干部任免的审批手续问题，议了几条临时办法，请审阅，并拟在主席处议一议。

〔2〕 文革小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简称。

对四位美国专家 的一张大字报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

林彪、总理、陈毅、陶铸、伯达^{〔1〕}五同志：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2〕}，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毛 泽 东

九月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总理，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2〕这张大字报，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调查组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抄录的阳早等四位美国专家给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写

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说：我们坚决反对政治、生活上的特殊待遇，坚决要求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定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和考验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决不容许成为修正主义分子。为此，我们要求：（一）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二）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三）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四）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五）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六）我们的孩子和中国人的孩子受到同样待遇和严格要求。（七）生活待遇和同级工作人员一样。（八）取消特殊化。

关于驻外机构 “来一个革命化”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退陈毅同志：

这个批评文件^{〔2〕}写得很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

毛 泽 东

九月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陈毅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报送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组九月八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情况简报》第九号上。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

〔2〕批评文件，指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组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情况简报》第九号刊登的一位奥地利人写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信。信中除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的行为表示赞赏外，还对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奥地利商务代表处代表的衣着和用车过于高级豪华提出批评，

希望“向有关当局报告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随这期简报一同报送毛泽东的，还有共青团中央机关文革筹委会、临时书记处九月八日印发的《一坦桑尼亚群众来信对我外事活动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提出尖锐批评》的材料，批评我驻坦使馆在外交活动中讲排场、摆阔气。

对中央关于国庆节挂像、抬像办法 和口号的通知稿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九月）

一

陶铸同志：

标语、口号太多，是烦琐哲学，要大精简，各有十几条就够了，至多总共不要超过三十条。多了，谁也不记得，不看作一回事了。请再议削，印出交来。

毛 泽 东

九月十日

二

陶铸同志：

省得多了，不知送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没有？如未，请送他们议一下。

毛 泽 东

九月十二日

三

林彪同志阅后退陶铸同志照办。

毛 泽 东

九月十四日下午

凡事要思索，不宜仓猝作出决定。凡大事要征求较多同志的意见。请陶、周、任重^{〔2〕}注意。标语、口号由一百条改为二十三条，较好，是一教训。毛又及

根据手稿刊印。

四

同意。

五

同意。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陶铸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挂像、抬像办法和标语、口号的通知》稿上的批语。通知稿除了提出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挂像、抬像的三条规定外，还列出标语六十条、口号四十条，共一百条。毛泽东在审

阅时，对标语作了大量的删减。本篇二是毛泽东在陶铸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报送第二次修改的通知稿的报告上的批语。修改后的标语、口号合在一起，共三十条。本篇三是毛泽东在陶铸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报送第三次修改的通知稿的报告上的批语。报告说：“遵示送文革小组讨论，又修改了一次，特再送陈审阅。”这次修改稿的标题改为《关于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挂像、抬像办法和口号的通知》，其中口号压缩为二十三条。本篇四是毛泽东在陶铸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晨二时报送第四次修改的通知稿的报告上的批语。这次修改稿对二十三条口号作了两处修改：将第二条“向工农兵和一切革命人民致敬”，改为“向工农兵、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和一切革命人民致敬”；将第十五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改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本篇五是毛泽东在陶铸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报送第五次修改的通知稿的报告上的批语。这次修改稿加写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工农联盟！”两条口号。最后定稿为二十五条。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将这个通知下发到县团级。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2〕陶，指陶铸。周，指周恩来。任重，即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

关于接见北京和来自 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一事给林彪等的信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

林彪、总理、陶铸^{〔1〕}同志：

卧病三天，尚有微温，今天略好。可在明天（十四）或后天（十五）上午十时或下午五时在天安门开七十万人大会。我能起床，即去见见群众，不能起床，则请你主持，我不去了。^{〔2〕}

毛 泽 东

九月十三日十九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总理，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2〕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接见人数达一百万。

对刘少奇《在北京各工作组 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 提纲（草案）》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

少奇同志：

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1〕}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2〕}，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毛 泽 东

九月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
铅印件刊印。

注 释

〔1〕 中央文化小组，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2〕 根据毛泽东在信中提出的意见，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九日，刘少奇的检讨提纲以草案的形式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北京市委各同志，请他们讨论并提出意见。十

月二十三日，刘少奇根据修改后的检讨提纲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发言，就指导“文化大革命”中犯的所谓路线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

对林彪在接见北京和来自 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

—

很好。改了一点，请林酌定。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

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根据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1〕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林彪和周恩来分别发表讲话。本篇一是毛泽东对陶铸九月十五日晨二时送审的林彪讲话稿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对这个讲话稿中一段文字的修改，其中用宋体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对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和来自 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

—

同意。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可以由两个人讲。

毛 泽 东

十五日上午十点半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对陶铸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晨二时送审的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会上的

讲话稿的批语。周恩来九月十四日将这份讲话稿送陶铸时批注：“陶铸同志：我仍主只由林彪同志一人讲即可，已函请主席批示。”陶铸在报送毛泽东审阅时批注：“我意明天还是由林总与总理两个都讲较好。请主席批示。”本篇二是毛泽东对周恩来、陶铸所提意见的批语。九月十五日下午，周恩来根据这个讲稿在接见大会上作了讲话。讲话说：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起来的冲天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中去！”“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革命学生要尊重工农群众，信赖工农群众，相信工农群众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把革命搞好。”“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已经到来。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和勤劳的品质。”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对《人民日报》社论 《向工农兵致敬，向工农兵 学习》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

照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陶铸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零时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向工农兵致敬，向工农兵学习》上的批语。社论指出：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应当按原来的“四清”运动部署结合进行。农村在秋收大忙的时候，可以把运动暂时停一下。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不必要到工厂、农村去进行革命串连，干预那里的部署。这篇社论于九月十五日发表。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关于印发、讨论 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提纲 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

退总理照办。小平的，我不看了，待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以后再看。

毛 泽 东

九月十七日下午四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总理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关于印发、讨论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提纲的请示报告上。请示报告说：遵照主席给少奇同志信中提的意见，将少奇同志的检讨提纲以草案的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委各同志，请他们讨论并提出意见。少奇同志提出，在他的检讨发言稿上印上毛主席的批示。小平同志的检讨发言，前已送上，现再附一份，准备同时印发，请予审阅。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对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十月七日）

照样开会。惟会期三天不够，需要七天。

毛 泽 东

十月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一九六六年十月七日十一时给毛泽东的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问题的请示报告上。请示报告说：“昨日林彪同志要我们请示主席，是否主席还在考虑目前就开全国工作会议的利弊。”“如主席认为无需更动，即照通知进行。究如何为好，请主席批示。”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于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

对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稿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月）

一

即送陈伯达同志：

看过，可用。未完部分请送来一阅。看过的这几部分，有几处有少数文字方面的修改^{〔2〕}，是否妥当，请酌。建议：你讲过之后，印发给到会各同志，讨论几天，提出修改意见。

毛 泽 东

十月十五日下午八时半

二

退陈伯达同志：

可用。只在第二页改了几个字^{〔3〕}。建议全文立即付印，以便一面讲，一面发给听众。

毛 泽 东

十月十五日夜

三

即送陈伯达同志：

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4〕}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二本。

毛 泽 东

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三时

四

退陈伯达同志：

第一步似以发至县、团级为宜。待县、团级以上多数干部思想通了，再往下发。究竟如何处理为好，请你们商量酌定。

毛 泽 东

十一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共四个部分：（一）形势大好。（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三）去掉几“怕”，放手发动群众。（四）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这

个讲话稿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这个讲话成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题报告。本篇一是对陈伯达十月十五日送审的讲话稿前三部分的批语；本篇二是对陈伯达十月十五日午夜送审的讲话稿最后一部分的批语；本篇三是对陈伯达十月二十四日送审的讲话修改稿的批语；本篇四是对陈伯达十一月五日送审的讲话修改稿的批语。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几经修改后的这个讲话印发至县团级。

〔2〕陈伯达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第三页说：“九月二十五日，我同文革一些同志接待一批各地来的学生，曾经有个建议：如果高干子弟在各学校、各单位的文化革命中占有领导岗位的话，最好让普通工农兵和普通干部（江青同志提议加普通干部，比较完全）的子弟来担任。”毛泽东审阅时将括号内的“江青同志”改为“有同志”。讲话稿第七页说：高干子弟“有许多是好的、比较好的，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有一些是不大好的，或者很不好，甚至要走修正主义的道路，蜕化变质为修正主义的代表”。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蜕化变质为修正主义的代表”。此外，毛泽东还在其他几处作了个别文字修改。

〔3〕陈伯达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午夜送审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第四部分第二页说：“各地流行着一种所谓‘自来红’的谬论。宣传这种谬论的人，他们利用小孩子们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惑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毛泽东审阅时把其中的“小孩子们”改为“一部分年轻人”。

〔4〕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修改稿第三部分的末尾加写了一段文字：“我们各地区各部门的同志，广大工农群众，广大青少年，都必须掌握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注意《決定》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而在工作中尽自己的最大革命义务。”

对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的初步检讨稿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小平同志：

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2〕}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3〕}上“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毛 泽 东

十月二十二日上午四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邓小平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报送毛泽东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初步检讨》稿上。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就指导“文化大革命”中犯的所谓路线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根据毛泽东所提意见，邓小平将“补过自新”改为“补过

于万一”，并在之后加写以下一段“积极振奋的话”：“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的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3〕题目，指邓小平送审稿的标题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初步检讨》。随后，邓小平将标题改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我讲几句，讲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2〕}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3〕}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4〕}那个时候。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

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5〕}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6〕}，就是在上海发表的。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7〕}；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8〕}；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9〕}。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

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

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10〕}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

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

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胜利，开始谁

也不知道怎么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内。从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二一、三一、四一到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年。我们自己也是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

自从去年十一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11〕}，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12〕}，批判胡适^{〔13〕}，等等，更不用讲了。

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14〕}，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对。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

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原则上你又理解，具体问题又不得解决，是什么道理？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

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比如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就根本没有开，有些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假如有十个书记，就要有七个或者八个去接见红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又没有准备回答什么问题，以为表面上一应付，表示欢迎，就解决问题了。人家有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处于被动。这个被动也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为主动的。

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讲上次会议讲过的话了，说这一次会等于不开，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局、省、地、县这几级，还不讲县以下广大的干部，全部都那么快地就通了，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我讲这么两件事。一件事是历史，讲一线、二线的问题。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

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说，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有一位同志，他家里有四个红卫兵，就是他的儿女，分成四派，还有他们的同学，有很多人到他家来，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个吧！他接触了那么一点人。另外也有接触几十个人的，也有接触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触很有益处。大的接触，一百五十万人，我们一个钟头就搞完了。这也是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15〕}。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对陈伯达送审的这个讲话记录稿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并批示：“退陈伯达同志。就照这样吧，我改了几个字。暂不发出。”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2〕马林科夫，一九五三年三月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至一九五三年九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五五年二月改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电站部部长）。一九五七年六月，苏共中央通过《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马林科夫被撤销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同年七月，被撤销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电站部部长职务。

〔3〕十一中全会，指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4〕“二十三条”，指当时指导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形成有一个过程。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当前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议在十二月下旬形成《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十七条，并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这期间，毛泽东同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中央停发十七条。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修改整理出共有二十三条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通称“二十三条”。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下发这个纪要。印发纪要的通知说：“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5〕吴晗，历史学家。原任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兼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因写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受到错误批判。

〔6〕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指《文汇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和

张春桥在上海密谋策划，由姚文元执笔起草的。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7〕批发了一张大字报，指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批示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写的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由新华社全文播发，在全国各报刊发表。见本册第271页。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这张大字报，六月二日在《人民日报》等报发表。

〔8〕一封信，指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复信》。见本册第301、302页篇二。

〔9〕写了一张大字报，指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见本册第304页。

〔10〕参见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有关内容。见本册第313、314页。

〔11〕批判《武训传》，指一九五一年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

〔12〕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指一九五四年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对红学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批判运动。

〔13〕批判胡适，指一九五四年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

〔14〕通知，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称“五一六通知”）。

〔15〕刘少奇，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被错误定性为所谓以刘少奇为“总头目”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后又被错误地指责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即被打倒。一九六八年

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错误地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凭借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逝世。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议指出：根据复查结果，“根本不存在一条以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总头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存在一批以刘少奇同志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指导运动，是我们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种做法，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同志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议认为：“原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同志强加的‘叛徒、内奸、工贼’三大罪状，以及其他各种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蓄意陷害。八届十二中全会据此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是错误的。”“过去对于刘少奇同志的污蔑、诬陷、伪造的材料以及一切不实之词都应完全推倒。”为此，全会决定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加给刘少奇同志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相应地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邓小平，原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同刘少奇一起向一些单位派工作组，被指责为制定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错误地当作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受到批判和迫害，随即被打倒。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二月，先后恢复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等职。一九七五年一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1〕}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我们祝贺你们的代表大会圆满成功！

以恩维尔·霍查^{〔2〕}同志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坚定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红旗。

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3〕}集团，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贼集团，比起你们来，他们都不过是一抔黄土，而你们是耸入云霄的高山。他们是跪倒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奴仆和爪牙，你们是敢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战斗、敢于同世界上一切暴敌战斗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在那些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当权的国家，已经或者正在改变颜色，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从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英雄的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顶住

了这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逆流。你们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采取了一系列革命化的措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你们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独立自主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你们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们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们和你们都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不是那种两面派。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

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在我们一边。国际无产阶级在我们一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在我们一边。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在我们一边。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不怕孤立，也绝不会孤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一小撮反华、反阿尔巴尼亚的可怜虫，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正处在新的觉醒之中。美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害人虫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掘墓人，他们被埋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当然，我们前进的道路绝不会是笔直的、平坦的。请同志们相信，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两党、两国人民，一定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中阿两党、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

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根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这个贺电，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康生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宣读。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2〕恩维尔·霍查，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

〔3〕铁托，当时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南斯拉夫总统。

对萧华关于大军区机关 文化革命问题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

同意。

退林彪。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林彪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报送的萧华十月三十日关于大军区机关文化革命问题的报告上的批语。报告提出：（一）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军队干部回去后要认真传达、学习这次会议的精神。（二）各大军区机关的文化革命运动即于十一月份展开，到明年春节前后告一段落。（三）军的机关暂按师以下部队的做法，进行正面教育。（四）省军区可以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进行文化革命。（五）军队院校的文化革命运动，目前正处在高潮中，各军区必须有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六）军以下部队目前仍然要保持秩序稳定，加强正面教育。萧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对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批注^{〔1〕}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七日）

一

同意这样修改^{〔2〕}。另外有些个别字句的改动^{〔3〕}，请酌定。

毛 泽 东

十一月四日上午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思想、意识两词不宜联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三

林彪同志：

同意这样修改^{〔4〕}。在第六页、第十页上我作了一点修改^{〔5〕}，请酌定。

毛 泽 东

十一月七日下午六时半

根据手稿刊印。

四

去掉十一字有利。

五

这是陈伯达同志写上的，我只是同意他们写上。

六

对冯定^{〔6〕}的批判我没有与闻。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至六是毛泽东对林彪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批注。本篇一是在林彪十月二十五日讲话修改稿上的批语；本篇二是在林彪十月二十五日讲话修改稿上的批注；本篇三是在最后付印前送审的讲话修改稿上的批语；本篇四至六是在最后付印前送审的讲话修改稿上的批注。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这个讲话印发到县团级。

〔2〕林彪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夜送审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修改稿）》，是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修改的。主要修改

是在第十二页的两段中加写了以下文字（加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或属于这个阶级，属于这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或属于那个阶级，属于那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什么抽象的、独立的个人，是没有的。只记得自己，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是损人利己。他们为了自己发财，自己得利，而不惜让千百万人破家荡产。从为自己、为私的观点出发来看世界，就是从资产阶级的观点上来看世界，而不是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来看世界。”（二）“我们就是需要培养为公的人。为公也有不同的阶级性。我们所说的公，是人民的公，无产阶级的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公。”在修改稿上，陈伯达向林彪报告说：“根据主席的指示，十二页作了重要的修改，请审阅，并请报告主席。”林彪向毛泽东送审时写道：“您的指示很好，我完全同意，现将伯达同志修改稿送上，请再审阅指示。”毛泽东“同意这样修改”的批语，就是针对这两段中加写的文字而写的。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3〕林彪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夜送审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修改稿）》中，多处用了“思想意识”一词，毛泽东审阅时均作了修改，有的改为“意识形态”，有的改为“思想领域”，还有五处删去其中的“意识”二字。为此，毛泽东写了一个批注，即本篇二。对于这个修改稿，毛泽东修改的文字还有：在第十一页，将“共产主义就是无私”改为“共产主义就是为公”；在第十三页，将“毛主席创造了一个新型国家”改为“毛主席领导我们创造了一个新型国家”；在第十四页，将“毛主席无论是在实践经验方面，在马列主义的理论方面，个人的天分方面，哪一方面都是不但比我们强，而且在世界上，现在还找不出第二个”一句中的“现在还找不

出第二个”，改为“也是有影响的”；在第十五页，删去“毛主席的路线已经胜利了”一句。此外，还有个别文字修改。

〔4〕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修改稿）》在最后付印前曾再次送毛泽东审阅。这个稿子除照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审改稿进行修改外，又作了一些文字修改。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

〔5〕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修改稿）》第六页写道：“毛主席在今年三月间，修改我们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写上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重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种经典的观点，把它当成国家大事，当成政治问题。”毛泽东审阅时，删去其中的“我们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十一个字，并写了一个批注，即本篇四；在其中“写上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一句之前，加上“同意”二字，并写了一个批注，即本篇五。在第十页讲到“近年来对杨献珍、冯定的批判”处，毛泽东删去冯定的名字，并写了一个批注，即本篇六。

〔6〕冯定，哲学家。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一九六四年受到错误批判。

对一些中央和其他方面 负责人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1〕}

根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和十一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二百多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这是他十一月十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参加接见的一些中央和其他方面负责人说的一句话。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串连问题的 通知稿和补充通知稿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十二月二日）

—

退总理照办。

毛 泽 东

十一月十六日二十四时

二

退总理照办。

毛 泽 东

十二月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写在周恩来总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稿上。通知稿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到明

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目前正在水陆交通沿线等候车、船外出串连的各地革命师生，可劝说他们返回原地。”“今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并且更好地实现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需要在今冬明春集中一切交通力量，加速物资运输。”本日，中共中央下发这个通知。本篇二写在周恩来总理十二月一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稿上。补充通知稿在十一月十六日通知的基础上，对外地来京和在外地串连的师生、红卫兵离京与返回原地问题作出四条具体的补充规定：（一）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到北京的外地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必须妥善安排，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按免费乘火车次序完全离开北京返回原地。（二）所有在外地进行革命串连的外地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也必须妥善安排，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返回原地。（三）解放军派出人员对已被接见的未离开北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仍应继续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并帮助他们尽早离开北京返回原地。（四）凡准备返回原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一律开给直达票，中途不要停留；必须在北京中转的也要开给直达票，按照规定返回原地，不得延误。毛泽东审阅时，将文中“毛主席”之前的定语“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删去。本日，中共中央下发这个补充通知。

关于派军队干部 训练学校师生的谈话^{〔1〕}

（一九六六年）

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2〕}，学三八作风^{〔3〕}，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4〕}，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刊印。

注 释

〔1〕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中，在“毛主席最近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时，向林彪同志多次提出”之后，引用了这段谈话。

〔2〕四个第一，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3〕三八作风，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八个字。

〔4〕三大纪律，指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指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对江青在文艺界大会上的 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

一

改了一点^{〔2〕}，供小组^{〔3〕}同志们参考。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退江青：

又有点修改^{〔4〕}，似较妥当些。

毛 泽 东

十一月二十八日一时

根据手稿刊印。

三

事实上，多少年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方面新旧斗争的变化，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文学艺术，以与旧的文学艺术相对抗。就是号称最难改革的京剧，也出现了新的作

品。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毛主席则在二十多年前，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出了推陈出新的问题。推陈出新，就是要有新的、人民大众的内容，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

四

这时，我才充分地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队这个形式是错误的，他们的工作内容尤其是错误的！他们不是把锋芒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反动的学术权威，而是对准革命的学生。同志们，朋友们，斗争的锋芒对准什么，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据说我们的毛主席早在今年六月间，就提出过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队的问题，可是有的同志没有请示毛主席，就急急忙忙地派出去了。但要指出，问题不在工作组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组，依靠原来的领导人进行工作，也同样犯了错误。也有一部分工作组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没有犯错误的。这就可以说明，问题究竟在哪里。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送审的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对江青十一月二十七日送审的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

稿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对江青二十四日送审的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稿中一段文字的修改；本篇四是毛泽东对江青二十七日送审的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稿中一段文字的修改。本篇三、四中用宋体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北京举行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发表了这个讲话。

〔2〕除本篇三外，毛泽东对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送审的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稿还作了一些修改。讲话稿第六至七页写道：“北京京剧一团的同志们，朋友们，你们给我的信，我倒是都看了。只是因为工作太忙，身体也不太好，没有能够亲自到你们团去，但是，你们团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始终是关心的，重视的。”毛泽东审阅时，将其中的后一句话改为：“只是因为工作忙一些，身体也不太好，没有能够到你们团去，但是，你们团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是关心的。”第七页写道：“北京京剧一团是首先接受我提出的京剧改革光荣任务的一个单位。这是你们团里一批想革命的演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和我一块努力的结果。”毛泽东审阅时，在其中的“和我一块努力”后，加上“在别人首创的基础上加工或改制”十四个字。此外，毛泽东对这个送审稿还作了一些其他文字的修改。

〔3〕小组，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4〕除本篇四外，毛泽东对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送审的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稿还作了一些修改。在讲话稿第一页，将“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文学艺术”，改为“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在第三页，删去“忠于毛主席”五个字；在第七页，将“北京京剧一团是首先接受我提出的京剧改革光荣任务的一个单位”，改为“北京京剧一团是北京首先接受京剧改革光荣任务的一个单位”；在第十页，将“对于我们党内的反对毛主席的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改为“对于我们党内以反对毛主席为首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外，毛泽东还作了一些其他文字的修改。

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 二十二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在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你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阿尔巴尼亚已经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为具有现代工业、集体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革命化措施，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大大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任务和制定的宏伟纲领，为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开辟了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阿尔巴尼亚人民正满怀信心地沿着劳动党所指引的方向，英勇地向前迈进。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人民，一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红旗，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阿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人民，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英雄的阿尔巴尼亚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坚强堡垒。

中阿两党、两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这种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让我们共同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红旗，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起，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决进行到底。

祝中阿两党、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报》刊印。

对中央关于刘澜涛出狱问题的 复电稿和张闻天有关 证明材料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九六七年二月）

—

照办。

二

张闻天^{〔2〕}关于一九三六年处理北方局领导人，要求中央批准履行“简单手续”，以便早日释放关在北平监狱中的干部，给中央的信及附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军委常委及中央文革小组）

汪^{〔3〕}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二时

报送中共中央关于刘澜涛出狱问题给西北局的复电稿及西北局来电和刘澜涛来信给毛泽东的报告上的批语。周恩来在报告中说：“送上西北局来电和刘澜涛来信”，“因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现拟电如另纸。如妥，请批发。”周恩来代拟的中央给西北局复电指出：“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刘澜涛，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西北局第一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一年在天津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被捕。一九三六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刘澜涛和薄一波等共六十一人履行简单手续后集体出狱。“文化大革命”中，刘澜涛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得到平反。本篇二是毛泽东在张闻天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给毛泽东等的信上的批语。张闻天在信后附送了一份证明材料。材料说：“刘少奇初去北方局（一九三六年春）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不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他信中提议即办此事。”“他还附带寄来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觉得不要什么代价就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的工作干部问题，岂不很好”，“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中组部的报告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薄一波同志等

在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的出狱手续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

〔2〕张闻天，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负总责。

〔3〕汪，指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办公厅警卫局局长。

对《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新闻稿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

退总理：

已作修改，请再酌。

毛 泽 东

十二月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报送的《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新闻稿上。周恩来在报告中说：“这一报道已经文革小组通过，并经林彪同志同意，现送请主席审批。在第七、九、十三页中，有三处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适，请主席批告。”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三处所点的一些领导人的名字，包括：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齐燕铭、夏衍、田汉、阳翰笙。十二月三日，周恩来旁批：“伯达、康生、江青三同志速阅转唐平铸同志办，请照主席的修改发表。”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唐平铸，当时任中共人民日报社委员会第一书记、《人民日报》代理总编辑。十二月四日，这篇新闻稿在《人民日报》发表。

对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草稿）》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退总理办。

请林彪同志主持开会通过，旋即发出^{〔2〕}。

毛 泽 东

十二月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报送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草稿）》给毛泽东、林彪的报告上。周恩来在报告中说：“通过这一文件的手续，请主席考虑，是在主席处约集常委和文革小组的少数同志一谈，还是仍采用上次方式请林彪同志主持召集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各同志一议，究以何者为好，请主席批示。”周恩来报送的中共中央意见草稿共十条：（一）坚决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狠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二）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十

六条”），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十条、二十三条的原则进行。必须是群众当家作主、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一般不派工作队。可以考虑派些少而精的观察员。

（三）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四清”问题和“四清”复查的问题。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文化大革命也要纠正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贯彻实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

（四）在农村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五）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如不称职，可以随时改选或撤换。经过群众讨论，健全或改选领导生产的班子，负责生产、分配、收购、供应工作。

（六）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参加民兵。在农村中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一般不要担任红卫兵的领导职务。在外地工作和学习的地富子女，不要回原籍进行串连。要像土改时那样，采取回避政策。

（七）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农村文化大革命，但不要包办代替。在斗争中，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坚持文斗，不要武斗。防止坏人挑起宗派斗争。

（八）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向领导上提意见、贴大字报的革命群众，不许打击报复，不许扣工分。因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破坏分子”等的革命群众，应当

平反。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专政的对象，绝不允许他们造无产阶级的反，绝不允许他们造贫下中农的反。（九）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半农半读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应当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根据具体情况，妥善安排。农村小学的文化革命，和所在社、队一起搞，由所在社、队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十）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经过文化大革命，把农村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2〕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草稿）》，并将标题改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同日，中共中央下发这个指示。

关于不要公开引用 《炮打司令部》等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关锋同志：

都不要引用。

毛 泽 东

十二月二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关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江青的请示报告上。报告说：“《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稿，引用了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还引用了主席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批注”。“请您考虑引用主席这些话，公开发表出来，是否妥当？”随后，《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一期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没有引用毛泽东的大字报和批注。

对李雪峰《在华北局机关的 检讨要点》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

一

伯达^{〔2〕}同志：

此件^{〔3〕}不知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都有没有？请你们议一议，此件是否是正确的，是否有发给各地作参考之用的价值？因为各地很多同志至今还没有如实地诚恳地作自我批评的决心，极有帮助他们的必要，你看如何？

毛 泽 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

二

退李雪峰同志：

修改得好，可照此发出。^{〔4〕}

毛 泽 东

十二月二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对李雪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华北局机关的检讨要点》的批语。本篇二是在李雪峰十二月二十七日送审的《在华北局机关的检讨要点》修改稿上的批语。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2〕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3〕此件，指李雪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华北局机关的检讨要点》，主要是检讨从六月初至七月中旬大约五十天时间内，他在领导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

〔4〕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转李雪峰《在华北局机关的检讨要点》。中央的批语说：“中央认为，李雪峰同志在十二月十六日所作的检讨，是好的、诚恳的。根据毛主席指示，给大家参考。”

对黑龙江省三级干部会议 情况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陈伯达^{〔2〕}同志：

请你和小组^{〔3〕}同志们看一看这个文件是否可以转发到县、团级作参考材料用。我看似乎比雪峰同志那个检讨^{〔4〕}还要好一些。文尾所说附件^{〔5〕}还未收到。

毛 泽 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黑龙江省委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给中央并东北局《关于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上。报告说：我省于十一月十四日到十二月七日召开了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集中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和怎样正确对待自己这三个主要问题。会议分为四段：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发扬民主，鸣放辩论；打通思想，统一认识；总结会议，安排工作。每段各有重点又互相联系，步步深入。打通思想，挽救干部，纵贯会议始终。整个会议过程，都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过程。十二月二

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转这个报告。

〔2〕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3〕小组，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4〕雪峰同志那个检讨，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华北局机关的检讨要点》。见本册第411页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对李雪峰〈在华北局机关的检讨要点〉的批语》；参见本册第412页注〔3〕。

〔5〕附件，指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省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路线错误的检查和今后运动意见》。

对黑龙江省关于城市街道 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 请示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伯达^{〔2〕}同志：

（一）应复电，同意按他们意见去做；（二）请省委在再做一段工作，取得更多经验后，写出具体条文若干条，报告中央。

以上请酌办。

毛 泽 东

十二月二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黑龙江省委文化革命办公室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报送中央文革小组的《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急需明确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上。请示报告说：当前随着城乡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多数城市街道的文化大革命也将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有许多问题急需明确。主要是：（一）街道运动的重

点。我们意见应该是斗争党内（街道办事处以上的负责干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二）街道居委会的主任，我们认为不能算作当权派。（三）在街道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认为应该依靠工人、贫农、下中农家庭出身的职工家属和革命群众，团结其他劳动人民。（四）街道文化大革命要结合“四清”进行，市委、区委可以派人巡视，了解情况，但不予干涉、领导。（五）街道中的阶级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些不良分子已参加并把持了群众组织，对他们采取什么政策为好？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给黑龙江省委复电，同意按他们的意见去做，并告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2〕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要保护和支左派，建立 和扩大左派队伍

（一九六六年）

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1〕}

根据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发表署名任立新《〈二月提纲〉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黑纲领》的文章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句话。文章说：“毛主席在开始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多次指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

对刘少奇关于北京建工学院 红卫兵要他去公开检查 的来信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总理：

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2〕}。

毛 泽 东

一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对刘少奇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来信的批语。信中说：“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来信，要我在一月七日四时以前到该院作公开检查。另有该院八一团红卫兵来信，也要我到该院作检查。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毛泽东阅信后批“即送周总理”。

〔2〕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凌晨接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两派学生代表，制止了他们逼迫刘少奇到该院作检查的行为。

对《文汇报》、《解放日报》 夺权事件的谈话^{〔1〕}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

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根据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在该报发表《告读者书》，宣布接管《文汇报》；一月六日，解放日报社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在该报发表《告读者书》，宣布接管《解放日报》。这是毛泽东一月八日召集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开会，对这两个报社的造反派夺权问题的谈话。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的社论，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王力、关锋、戚本禹，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

伯达同志及小组同志们^{〔1〕}：

(一) 此两件^{〔2〕}很好；(二) 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3〕}，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之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毛 泽 东

一月十日上午五时

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4〕}不要发了，上海这个^{〔5〕}就很好。但需要写一篇解释文章^{〔6〕}。又及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小组同

志们，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成员。

〔2〕两件，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江青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报送的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文汇报〉〈解放日报〉记者评述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这两篇电讯稿在《人民日报》发表。

〔3〕之后起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发出。

〔4〕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指陈伯达、江青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稿。这个通知之后所署日期为一月十一日，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一月十三日印发。

〔5〕这个，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的《紧急通告》。

〔6〕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

对《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 贺电》等五份材料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

总理、伯达、江青^{〔1〕}同志：

两件及另三件^{〔2〕}已阅，很好。请林彪同志主持，在今日下午或明天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有文革小组^{〔3〕}及其他某些同志参加，将五个文件讨论、通过，然后发出。如同意，请告林彪同志。

毛 泽 东

一月十一日上午二时

二

同意这三个文件^{〔4〕}，一并在今天或明天的政治局会议通过。

毛 泽 东

一月十一日二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总理，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2〕两件，指周恩来、陈伯达、江青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稿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稿《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一月十二日，这两篇稿子均在《人民日报》发表。另三件，指陈伯达、江青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稿和中共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稿。《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说：当前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转移斗争目标，挑动不明真相的少数人大闹经济主义，不但要恢复而且要扩大过去关于工资、福利制度中的一些错误措施，煽动一些群众要求晋级加薪，提出不合理的经济要求，企图把一些群众引向经济主义的邪路。中央认为，必须立即制止这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立即制止这种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说：最近有少数党政负责人为了抵制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判，腐蚀革命群众，任意给群众组织大批金钱物资。中央认为，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做法，必须坚决制止。《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说：广播电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凡是发生两派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管，停止编辑和播送本地节目，只转播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已经进入广播电台的革命群众，应当立即退出。之后，这三件日期均署为一月十一日，一月十三日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发出。

〔3〕文革小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简称。

〔4〕这三个文件，见本篇注〔2〕。

对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 指向军队的通知稿等 三个文件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十三日）

—

同意。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恩来^{〔2〕}同志：

因是重要文件，应当由政治局通过^{〔3〕}，请你酌办。

毛 泽 东

一月十二日下午五时

三

已请总理^{〔4〕}酌处。

毛 泽 东

一月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在陈伯达、江青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为送审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起草的三个文件给林彪的报告上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在陈伯达、江青一月十二日为送审这三个文件给他的报告上的批语。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起草的三个文件是：（一）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稿。通知稿写道：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有一些地方党委，借保证党和国家机密安全及党内文电正常传递为名，把文化大革命中整革命群众的材料塞进军事机关，甚至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事机关，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党纪国法绝不允许的。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下发这个通知。（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稿。规定稿指出：“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为此，规定稿作出依法惩办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六项具体规定。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这个规定。（三）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稿。通知稿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曾三令五申，军队（包括医院、疗养院、招

待所等)决不能成为防空洞,窝藏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庇护那些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以及逃避群众斗争的人。但是,至今仍然有一些单位没有这样做,甚至有的参与了压制、打击和镇压革命群众的行动。”“各级党委对此必须引起严重注意,立即采取坚决措施,杜绝类似情况的继续发生。”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2〕 恩来,即周恩来。

〔3〕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和中央军委《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三个文件。

〔4〕 总理,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对《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 起来》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

伯达同志：

写得很好。

毛 泽 东

一月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陈伯达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送审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稿上。陈伯达送审时在稿上写有：“王力和关锋两同志给《红旗》写了一篇评论，请顺阅！”《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文，后以本刊评论员的名义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上发表。这篇文章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文字：“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同日，《人民

日报》转载。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王力、关锋，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关于将贵州各方代表找来北京 研究问题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总理^{〔2〕}：

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若〈约〉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3〕}商量决定。

毛 泽 东

一月二十一日

每一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副政治委员李再含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给总政治部并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电报上。电报说：贵州造反派红卫军负责人及其总部一小撮人，最近把斗争矛头进一步指向军队、绑架放哨战士并夺走武器弹药，扬言接管公安局、法院、检察院，长期扣压当权派干部，并随意扣压大量一般群众和基层干部，在中央重申“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后，

仍然大量调动工人日夜开会，严重影响生产。特此请求对他们实行专政。

〔2〕总理，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3〕文革小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简称。

在延边自治州党委请求 中央文革小组制止冲突 电报上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总理^{〔2〕}：

应当把延边反革命派手中的权力夺过来，请你部署一下。
毛远新^{〔3〕}去延边工作一个月，那里大有起色。他今天去哈尔滨，如尚未走，可找他谈一下。

毛 泽 东

一月二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吉林省延边自治州委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东北局、吉林省委的请求中央文革小组制止冲突的电报上。电报说：十八日下午三时，延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司令部同延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大军因为《延边日报》的接管问题发生武斗，已造成伤亡，规模很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州委三次派人到双方做工作，要求他们派出代表协商解决，均未成功。现

在他们不信任州委，州委无法进行工作，事态发展又十分严重，急请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双方来电话或电报，制止冲突。

〔2〕总理，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3〕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当时是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

对南京军区党委 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 的请示电报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林彪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

毛 泽 东

一月二十一日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2〕}，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又及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党委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给林彪并中共中央军委的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电报上。电报说：“顷接安徽军区报告，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向安徽军区提出，二十二日到二十三日，在合肥召开十五万到二十万人大会”，“要安徽军区派出三百到五百名部队

警卫会场。他们提出，如派部队就是支持文化大革命，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军区二十一日十四时前答复。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

〔2〕重新发出命令，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参见本册第 435 页注〔1〕。

对《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照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上的批语。根据毛泽东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精神，这个决定作出五条指示：（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二）积极支持广大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三）坚决镇压反对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五）在全军深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这个决定。

要节约闹革命

(一九六七年)

—

要节约闹革命。^{〔1〕}

根据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刊印。

—

要进一步节约闹革命。^{〔2〕}

根据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发表的社论《节约闹革命，保护国家财产》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社论写道：“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节约闹革命。’”

〔2〕《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发表的社论《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社论写道：“我们伟

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最近又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要进一步节约闹革命。”

关于研究军队夺权范围 等问题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林彪同志：

此件反映群众提出，究竟哪些机关可以夺权，哪些不能夺权；夺了权的人们对待不同意见的群众应取什么态度（应争取多数，不能排斥）。请加以研究^{〔2〕}。

毛 泽 东

一月二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全军文化革命小组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五号上。这期要报刊登的《关于夺权的若干情况和问题》材料，反映了部队一些已被夺权单位的情况，并提出以下几个需要研究加以统一规定的问题：（一）什么样的院校领导权可以夺，什么样的院校领导权不能夺？（二）各个左派组织是单独夺，还是联合夺？（三）警卫分队的权交给谁？（四）机关科研单位能否夺权？（五）医院、文工团等单位是按照机关还是按照院校对待，能不能夺权？

〔2〕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规定指出：（一）军队可以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机要学校、尖端技术学校、飞行学校和有外训任务的班系除外）、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只限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区 and 军种总医院、教学医院）、军事工厂（有尖端技术试验任务的工厂、海军基地所属工厂和绝密工厂除外）。在这些单位中，哪些要夺权，哪些不需要夺权，要看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二）夺权必须是由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进行，不准联合本单位以外的革命组织参加夺权。在夺权斗争中，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之间发生争执时，要通过民主协商来解决，绝不能武斗。（三）各院校、军事工厂等单位的警卫、通信、练习、勤务和运输分队的权不能夺，也不准参加夺权。（四）除第一条规定可以夺权的范围以外，其他一切大小单位都不准采取自下而上的办法进行夺权。

对《中央军委命令》稿 和中央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月）

一

所定七条，很好，照发。

毛 泽 东

一月二十六日

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

冲击领导机关问题。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

此文件经过讨论修改^{〔2〕}后，再发出。

来北京开会的同志，停一周后再回去。

又及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二

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毛 泽 东

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三

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四

总理^{〔3〕}：

同意，照办。

毛 泽 东

二月二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五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林彪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送审《中央军委命令》稿的报告上的批语。林彪在报告中说：昨天下午，徐

向前同志来谈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些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接着，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同志来继续谈了这些问题。大家一致认为，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要使军队文化大革命更有序地开展，一方面要去掉一些使军队发生不稳现象和不适用于作战部队与指挥机关的具体作法。因此，需要发出新的指示，使运动能正常开展。他们在这里谈了大意后，即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开会，与文革小组成员、周总理、陈毅共同讨论，写出七条规定。本篇二、三是毛泽东一月二十八日在《中央军委命令》修改稿上的批语和对修改稿第五条的修改。本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这个命令，通称“军委八条”。《中央军委命令》指出：（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

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本篇四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二月三日送审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命令》的通知稿上的批语。在这个通知稿开列的“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的机关名单中，毛泽东加写了“各级银行”。本篇五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二月二十二日三时送审的《中共中央通知》修改稿上的批语。《中共中央通知》下发时，日期署为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通知指出：中央认为，军委的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为此，通知还作了五点具体说明，并要求各地将此通知连同《中央军委命令》，在所有基层单位普遍张贴。徐向前，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科学小组组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杨成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

〔2〕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开会，讨论《中央军委命令》^原稿的修改问题。

〔3〕总理，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在章伯森反映湖南问题 报告上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总理：

湖南也应照贵州那样予以处理^{〔2〕}。章伯森是去年运动初期在省委坚持工作、没有逃跑的唯一省委书记。似可找他来商量一下，看有无别的较好干部以及造反派领袖，可以找来共同商量？请酌处。

毛 泽 东

一月二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章伯森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给周恩来、陈伯达的反映湖南问题的报告上。报告说，我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向中央反映两点情况：（一）目前湖南文化革命运动形势越来越好。造反派在政治上已完全取得优势，保守派正在分化瓦解中。但省委工作暂时处于瘫痪状态，领导机关的工作也基本停顿。如何依靠造反派，团结大多数，建立新的革命秩序，这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二）目前有很多单位要求对犯错误的干部罢官、开除党籍。自一月

中旬以来，要求开除党籍的更是络绎不绝，如果这样处理下去，后果很难设想。章伯森在报告中还请求中央批准他到北京作一次汇报，并请中央对以上两个问题给予指示。章伯森，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湖南省副省长。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2〕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关于将贵州各方代表找来北京研究问题的批语》中指出，似应将贵州有关各方的代表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见本册第 429 页。

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 几个单位情况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

林彪、恩来^{〔2〕}同志：

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

毛 泽 东

一月三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谭震林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给毛泽东等并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报告上。报告对农垦部、农业部、水产部等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出现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农

林办公室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2〕 恩来，即周恩来。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 《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

—

林彪同志：

此件我看了，认为很好，并作了一些修改，请你看一下，退还陈伯达同志。

毛 泽 东

一月三十日

如有修改，请告伯达。又及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必须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克服自己头脑中和自己团体中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所有这些违背毛主席教导的、妨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思想和行

动，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都是当前尖锐的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映。这些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根据毛主席一贯提倡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多做自我批评，而不要互相攻击。

三

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不相信，这是不对的。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

四

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立功赎罪。^{〔2〕}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五

各级干部，都要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劳，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自以为了不起，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自己只看见过去的功劳，而看不见今天的革命大方向。对新的革命小将则又只看

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改过来。

六

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例如，所谓“中国工农红旗军”，所谓“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被修正主义分子组织起来的名为“革命派”，实是保字派的组织，就是这种反动组织。这些组织中的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是应当争取教育的。但是，这些反动组织的一小撮头头，却处心积虑地炮打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暗害革命群众，收买职工，停止生产，中断交通，破坏和抢劫国家财产。他们趁火打劫，妄想变天。这种反动组织，有的就是在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挥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这种反动组织，是建筑在沙滩上的，一旦被群众识破，就会立即土崩瓦解，一小撮头头就会被群众揪出来。

七

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3〕}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伟大的人民解

放军，热烈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人民解放军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社会主义事业创立新的伟大的功劳。这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

根据《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
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对陈伯达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送审的社论稿《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批语。陈伯达在送审稿上写道：“王力、关锋二同志为《红旗》杂志准备了一篇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请审阅！”本篇二至七是毛泽东对社论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这篇社论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提前转载。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王力、关锋，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2〕“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立功赎罪”一句，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中，作为毛泽东的话用黑体字排印。

〔3〕这一句在《红旗》杂志社论发表时，是用黑体字排印的。

关于发表《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 总指挥部通告》等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恩来^{〔2〕}同志：

这个通告很好，你看是否可以发表？新近搞的那个文件^{〔3〕}，待他们回去商量修改后，可以再发表，作为第二篇。如何，请酌。

毛 泽 东

一月三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贵州省革命造反派主编的《新贵州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刊登的《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上。通告宣布毛泽东思想贵州省红色工人战斗团等四十个造反组织，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名义，于一月二十五日接管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和中共贵阳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一切领导权。通告提出：一切权利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坚决反对经济主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动用武器、弹药，盗窃或泄露国家机密者，依法查处。《人民

日报》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转载这个通告，并发表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

〔2〕恩来，即周恩来。

〔3〕那个文件，指《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十项通令》。通令指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乘胜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把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夺过来。革命造反派必须模范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抓革命，促生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必须接受革命造反派的领导和监督，听候处理，不准乱说乱动。对待当权派，应从他们的具体情况出发，区别对待，作不同的处理。通告宣布：西南局和前贵州省委、贵阳市委所发出的一切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无效。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的一切通告和通令，必须坚决执行。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这个通令在《人民日报》发表。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给新疆电报稿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照发。

毛 泽 东

一月三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新疆军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并自治区革命夺权总指挥部的电报稿上。电报指出：（一）立即劝阻人民内部的一切武装冲突。凡是有群众的场面，我武装部队绝对不准开枪。（二）新疆军区领导机关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机要部门和武装部队，任何人、任何组织均不准冲击，不准夺权。（三）石河子地区的武装冲突问题，待中央派人调查处理。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1〕

根据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发表的社论《做革命大联合的模范》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一句，并写道：“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提出的战略口号。”

关于说服红卫兵让王任重 就医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

林、周^{〔2〕}阅后，交文革小组^{〔3〕}商处。

毛 泽 东

二月二日

我意应说服红卫兵，让他就医。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王任重的妻子萧慧纳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王任重病重垂危，现被揪斗，不知去处，朝不保夕，请求给予治疗。二月三日，中共中央在给湖北省委并武汉军区党委的电报中指出：“王任重最近以来病情加重。为了使他进一步检查错误，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建议能让王就医一段时间，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请武汉军区党委协助省委办理此事。”王任重，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一九六七年一月受到错误批判后被打倒。

〔2〕 林，指林彪。周，指周恩来。

〔3〕 文革小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简称。

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节录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1〕}

根据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会见希斯尼·卡博、贝基尔·巴卢库等的谈话节录。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这个报告四月十四日在九大全体会议上通过，四月二十八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希斯尼·卡博，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贝基尔·巴卢库，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

在西藏军区党委一份电报上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八日）

一

林彪、恩来、叶、聂、徐^{〔2〕}各同志：

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3〕}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

有些问题处理太慢了。新疆问题应当快点解决。^{〔4〕}

毛 泽 东

二月七日

另有一些重大问题处理太快，不经常委从容讨论，似乎不妥。又及

二

已办，存案。

毛 泽 东

二月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西藏军区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上。电报说：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认为张国华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说军区党委是“保皇派”、“黑窝子”，群众因不明真相，动荡很大，军区机关一部分干部和驻拉萨部队的部分干部战士也出现了思想混乱。此种状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后果是严重的。为此建议中央对张国华尽快表明看法。二月十二日，中央军委复电西藏军区。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又给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等复电，指出中央军委的电报是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的，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拥护这个电报所说的：张国华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尽管他在工作上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个好同志。望军区党委同志向革命群众做些工作。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

〔2〕恩来，即周恩来。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徐，指徐向前，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3〕周仁山，当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决定，张国华同志回北京休养一个时期。张离藏期间，工作由周仁山同志代理。王其梅，当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

〔4〕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和八日，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

徐向前同新疆自治区负责人谈新疆问题，决定对新疆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管。

对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

一

有一些修改。

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总结经验，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

毛 泽 东

二月九日上午

二

林彪同志：

又改了一些，请酌定。此件应在总理^{〔2〕}主持的党、政、军联席会上讨论通过，然后发出。

毛 泽 东

二月九日下午

根据手稿刊印。

三

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 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

各军区、各军兵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在支持真正的（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已经遇到各种复杂情况，以至发生武装冲突事件（如新疆、内蒙）。因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对徒手的群众，不管属于哪一派，都不能开枪。

（二）对徒手的保守派、右派、反革命派，可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在必要时，可以逮捕他们的头目，但不要开枪。

（三）略

（四）对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等现行反革命分子，确实查明无误者，如敌人拒捕、顽抗和武装暴乱，在说服无效时，可开枪镇压。

（五）要相信，即使是反革命组织，大多数群众仍然是好的，是可以教育争取的，坏人只是少数个别分子。

（六）要沉着应战，即使有几万人向我军示威、包围、冲击、打人、抓人、侮辱人，也不要紧。若不沉着，怕字当头，就是大错。

以上规定，大部分要向全军指战员认真进行宣传教育。但第三条（诱敌深入、迂回包围）只能临战时下达，事先必须保密。〔3〕

中 央 军 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对林彪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稿和规定修改稿的批语。规定稿原为四条，毛泽东审阅时加写了第五、第六两条。同时，将标题改为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并作了一些别的文字修改，见本篇三。其中用宋体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二月十日，这个规定发出。

〔2〕总理，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3〕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叶剑英致信林彪说：“《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我们把六条作为五条发出，第三条只在会议上念了一遍（发稿呈上），会后各军区请〔求〕将第三条单独发给他们再读一遍，以便掌握，我们已单独打印发给他们，说明看后收回（已经收回）。请报主席。”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

关于播发《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 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

伯达^{〔2〕}同志：

请与小组^{〔3〕}同志研究，此文可否公开发表，并予广播？
是否有要修改的地方，也请酌处。

毛 泽 东

二月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三九〇期上。这期简报刊登的一篇题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的材料，介绍黑龙江省造反派在夺权斗争中的经验是：（一）根据当地的具体斗争情况，鲜明地体现党的方针政策，团结省委内部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和军队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二）在夺取省委的领导大权之前，首先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喉舌报社、电台和专政机关公安局掌握在左派手中，为最后夺取省委大权作好舆论准备，坚决镇压反革命，保证夺权斗争的顺利进行。（三）坚定地依

靠被夺权单位内部的左派力量，团结中间力量，打击反动力量，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四）夺权斗争的根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左派队伍，左派队伍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了夺权斗争。二月十日，这篇材料在《人民日报》发表。

〔2〕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3〕小组，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对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 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稿 和补充规定稿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二月）

—

照办。如昨夜会议上有修改，照修改稿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送总理照发。

毛 泽 东

二月十一日二十二时

根据手稿刊印。

三

照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叶剑英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报送林彪审阅的《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送审稿上的批语。叶剑英在送审报告中说：“遵照主席在上次常委会上的指示，起草《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今天上午召集三十二人参加的会议，进行讨论和修改。特呈上请审查批示。”二月十日，林彪将叶剑英报送的这个送审稿转报毛泽东审阅。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本篇二是毛泽东在周恩来总理二月十一日送审的十日晚中央碰头会修改通过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上的批语。这个规定于同日发出，共七条：（一）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的命令（参见本册第441页注〔1〕），是个重要的文件，必须广泛宣传，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学习讨论，认真抓好活思想，务使大家深刻认识颁发这个命令的伟大意义，提高执行命令的自觉性，要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二）军以上机关（各总部、军种、兵种，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区空军、海军舰队）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进行“四大”（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编者注）。由军委决定已经开展“四大”的单位，除因必要暂停进行的以外，要继续充分发动群众，坚决依靠真正的而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军委决定暂时不开展“四大”的单位，必须进行正面教育，何时开始，必须听候军委命令。（三）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的基地以下单位，海、空军的飞行学校，北京卫戍区，上海、天津、旅大警备区，以及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绝对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借口到这些单位进

行串连。（四）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帝、修、反加紧反华，我军更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保持高度集中统一和不间断的指挥。因此，各级军事领导机关（包括司、政、后及其他领导部门）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五）根据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党委个别成员问题严重的可以撤换，党委不能领导的可以改组，但都必须经过上级批准。军队领导机关必须保持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已经成立的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必须以行政单位进行改组。这些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对党委有批评和建议之权，但不能代替、监督党委和行政领导行使职权。（六）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一定要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敢字当头，到群众中去，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同群众紧密结合，一道闹革命，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应该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别对待。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立功赎罪。凡是没有上级命令停职、罢官的领导干部，应该坚守岗位，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七）在运动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要加强运动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本篇三是毛泽东在林彪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送审的《关于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

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补充规定》稿上的批语。中央军委二月二十七日下发的这个补充规定指出，为了保持军队领导机关严密、完整的指挥体系，进一步贯彻军委指示，特决定：凡继续开展“四大”的单位的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应以基层行政单位进行改组，所有超越基层行政单位的文化革命联合战斗组织，如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各大单位的造反总部、联络站等，应一律撤销。所有文化革命战斗组织所使用的宣传工具，如有线广播、宣传车、印刷用具等，应一律移交各单位党委文革办公室。

对关于成立西安地区革命 造反委员会等情况汇报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

林彪、恩来^{〔2〕}同志：

排斥交通大学一派，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应当继续做调查工作，不必急于公开表态。破坏工厂，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不主张破坏工厂。以上请酌。并告文革小组^{〔3〕}。

毛 泽 东

二月十四日上午九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编印的《要事汇报》第八号刊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昆关于处理西安地区造反派冲突的电话汇报记录上。王明昆说：（一）昨天晚上，我们向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发的电报，看法有问题。原来的观点倾向于西安交通大学，现在看来交大有问题，我们犯了错误。现在纠正错误观点，站到西安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这边，把西安交大排除在外，成立了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今晚开会发表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声明。

(二) 西安东郊二八工厂十日被该厂保守派破坏，估计半年可能修复生产。今晚又有一二万人开大会，可能是要砸八〇三厂或者冲击省军区机关。有谣传说，要在二十日以前把东郊的工厂都砸掉。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处理，请中央文革小组迅速予以指示。

〔2〕 恩来，即周恩来。

〔3〕 文革小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简称。

关于派人调查总结北京 两所中学军训经验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

林彪同志：

请派人去调查一下，这两校军训的经验是否属实？核实后，可以写一千字左右的总结，发到全国参考。又大专学校也要作一个总结，发往全国。请酌。

毛 泽 东

二月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新华社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特刊《文化革命动向》刊登的《北京两个中学实行军训的情况》一文旁。文章说：驻京部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最近在北京二中、二十五中进行集训革命师生的试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两个学校的军训都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以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为主要教材，发动群众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友，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消除各群众组织之间的

隔阂。第二阶段以毛主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为主要教材，引导师生深入批判阻碍革命派大联合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挖私心，大破个人主义、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实行革命组织大联合、大夺权。

对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

林彪同志：

已阅，同意。

毛 泽 东

二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林彪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送审的《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上。规定指出：（一）军队可以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机要学校、尖端技术学校、飞行学校和有外训任务的班、系除外）、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只限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区和军种总医院、教学医院）、军事工厂（有尖端技术试验任务的工厂、海军基地所属工厂和绝密工厂除外）。在这些单位中，哪些要夺权，哪些不需要夺权，要看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二）夺权必须是由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进行，不准联合本单位以外的革命组织参加夺权。在夺权斗争中，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之间发生争执时，要通过民主协商来解决，绝不能武斗。（三）各

院校、军事工厂等单位的警卫、通信、练习、勤务和运输分队的权不能夺，也不准参加夺权。（四）除第一条规定可以夺权的范围以外，其他一切大小单位都不准采取自下而上的办法进行夺权。本日，这个规定发出。

对怀仁堂会议记录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二月）

退陈伯达^{〔2〕}同志。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定议程是谈“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余秋里等在会上对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谭震林责问张春桥为什么不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到北京来？在张春桥表示回上海同群众商量时，谭震林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是，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说完，他站起来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又说：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余秋里拍桌子说：这样对老干

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李先念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会后，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和成员王力、姚文元整理了怀仁堂会议的记录稿，主要集中了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的发言，并于当晚十时向毛泽东作口头汇报。本篇批语写在这份会议记录稿上。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主任。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徐向前，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财政部部长。余秋里，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

〔2〕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 《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二十二日）

—

退总理^{〔2〕}：

同意你的意见，讨论后再发表，并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3〕}再则，以后重要社论都应这样做。

毛 泽 东

二月十八日下午八时

根据手稿刊印。

二

照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转报陈伯达二月十七日送审的《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

上的批语。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一些修改。社论稿第八页讲到对犯错误干部的使用问题时指出：“有的干部，还可以吸收他们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将其中的“有的干部”改为“有许多干部”。在社论稿的末尾，毛泽东删去了以下三句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此外，还有一些别的文字修改。本篇二是毛泽东在陈伯达、关锋、王力二月二十二日送审的社论修改稿上的批语。陈伯达等在这次送审稿上写道：“总理主持下开会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我们又做了一次修改。”这篇社论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人民日报》二月二十三日提前转载。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关锋、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2〕总理，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3〕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在向毛泽东转报这篇社论稿时写道：“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我看写得还不错。提议在党、政、军、文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在社论稿第二部分“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中的三段文字旁，周恩来画了竖线，并批注：“在这一部分，可以把地方上的三结合和机关内部三结合加以解释和阐明”。二十二日的送审修改稿上，在这一部分的最前面加写两段文字。一段文字是：“经验证明，在需要夺权的省、市，必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种‘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在需要夺权的工矿企业，也必须建立由革命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代表（老工

人、青年工人)和民兵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需要夺权的党政机关,则必须实行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级干部和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原则。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有权威的领导班子,率领广大革命群众,胜利地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战斗任务。”另一段文字是:“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当前必须着重解决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的问题。”

对北京卫戍区关于在大中学开展 军训的两个总结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三月二十三日）

一

林彪同志：

（一）此两件应即转发全国。（二）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上课以后，在军训的二十天中，军训时间每天不要超过四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每天相应减少时间四小时。（三）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二十天。以上请酌办。

毛 泽 东

二月十九日

此两件总理^{〔2〕}阅后送林彪同志。

二

都不要发表。各地经验已超过北京。我的批语也有些不适应新情况。因此都不宜发表。

毛 泽 东

三月二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根据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关于派人调查总结北京两所中学军训经验的批语，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二月十八日写出关于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在北京二中、二十五中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政训练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由林彪二月十九日报送毛泽东审阅。本篇一写在林彪的送审报告上。三月四日，陈伯达、王力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大中学的军政训练，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同志主张在报上发表。主席批示的两个关于北京的军政训练的文件，他们也主张修改后发表。请主席决定。”本篇二写在陈伯达、王力的报告上。北京卫戍区的这两个总结报告，后来没有公开发表。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2〕 总理，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对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等 四篇新闻稿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

伯达、王力^{〔2〕}同志：

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请你们在四份材料一律改过来。

毛 泽 东

二月二十日

可分两天发表。第一天发前三件，后一件在第二天发。^{〔3〕}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陈伯达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送审的《贵州革命造反派举行盛会庆祝贵州省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新闻稿上。同时，送审的还有《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告全省人民书〉》、《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经验》三篇新闻稿。陈伯达在送审报告中说：“贵州省材料四份，内容较丰富，关于‘三结合’的经验也说得好。请主席审阅。如认为可以发表，名称是否简称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请批示！”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

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2〕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3〕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贵州革命造反派举行盛会庆祝贵州省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告全省人民书〉》、《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三篇新闻稿；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经验》新闻稿。这四篇新闻稿中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一词，发表时均改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

对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 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

林彪同志阅后，退汪东兴^{〔2〕}照办。

毛 泽 东

二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等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送审的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上。同日，中共中央下发这封信，要求在农村中宣读和张贴。信中指出：贫下中农是农村中抓革命、促生产的主力军。当这春耕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号召你们，党中央号召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要善于同贫下中农一起商量，同一切劳动群众一起商量，掀起一个春耕生产的高潮。党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犯过错误的干部只要这样做，贫下中农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对他们的批评，要采取毛主席历来指示的“惩前毖

后，治病救人”的态度。绝对不许地、富、反、坏、右分子乱说乱动，破坏生产，破坏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挑动宗派纠纷。他们必须在贫下中农监督下，认真地继续进行劳动改造。在“四清”运动中下台的干部，必须积极参加劳动，改造自己，不许反攻倒算。建议你们考虑立即开一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干部会议，布置春耕生产工作。建议你们开好生产队全体社员会议，讨论春耕生产工作。同时，还建议人民解放军驻当地部队和各级军事机关大力支持、帮助春耕生产工作。

〔2〕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办公厅警卫局局长。

对中央关于改变 上海人民公社名称为上海市 革命委员会复电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照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送审的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张春桥、姚文元的复电上的批语。复电同意张春桥、姚文元二月二十日来电所述关于改变上海人民公社名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布置。此前一月二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去上海，负责向中央反映上海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对在上海一月“夺权”后径直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提出批评，说：人民公社这样大事，你们不拿出来，不讨论，别的大事，也不讨论。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直压着没有发表，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各地都叫人民公社，势必冲击中央，那就要改国号了，

改政体，叫中华人民公社。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实质是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不管怎么样，总要有一个核心组织，光是红卫兵、工会、造反司令部不行。学校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工厂叫革命委员会。上海公社还是改过来，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之后，张春桥、姚文元返回上海，对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布置。二月二十四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直压着没有发表，是指未让《人民日报》转载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刊登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姚文元、王力、戚本禹，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关于了解广东省委领导干部 情况等问题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二十八日）

—

总理^{〔2〕}：

请告广州军区，查一查赵紫阳、区梦觉二人政治态度如何，其他省委书记、常委如何，是否可找赵、区二人来京和陈郁、黄永胜一道谈一次，加以开导。

毛 泽 东

二月二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
铅印件刊印。

二

总理：

同意这样做。

毛 泽 东

二月二十八日一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关于广州夺权斗争的新形势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报告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上的批语。报告说：昨日与广东来京同志座谈了一天。广东方面同志有黄永胜、陈郁、赵紫阳、陈德、区梦觉等七人。今晚，我们在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广东问题，一致建议：广东立即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目前以黄永胜为主、陈德为副，主持广东全省工作，帮助省委同志检讨，估计有一些同志可得到群众通过。云南情况，与广东颇似，拟亦先行军管，准备三结合的条件。黄永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陈郁，当时任广东省省长。赵紫阳，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三政治委员。陈德，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政治委员。区梦觉，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2〕总理，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关于公开报道贵阳棉纺厂 按行政系统搞联合等问题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伯达、王力^{〔2〕}同志：

此件似可公开报道。又，《文汇报》有一篇题为《革命不分先后》的社论^{〔3〕}，略加修改后，似可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北京其他报纸早已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政治嗅觉，似不甚强。

毛 泽 东

二月二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编印的《快报》第一三三四号上。这期快报刊登的《大联合中的又一新形式，贵阳棉纺厂按行政系统联合效果好》的材料说：贵阳棉纺厂在夺权以后，按车间等行政单位搞联合，对文化革命和生产都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他们把这种联合的方式叫作归口大联合，是大联合中的又一新形式。三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材料，标题改为《用毛泽东思想作为大联合的灵魂！贵阳棉纺厂

按行政部门搞联合，组织纪律性大大加强，革命和生产出现新面貌》。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的社论。

〔2〕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3〕《革命不分先后》的社论，指的是《文汇报》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发表的社论，原题为《造反不分先后》。二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已转载。社论指出，革命有早有迟，造反有先有后。我们的态度是：不管革命迟早，不分造反先后，真革命、真造反，我们总是热忱欢迎的。今天造反，今天欢迎；明天造反，明天欢迎。对于一切愿意革命的干部来说，应该遵循毛主席“只争朝夕”的教导，立即起来造反。任何歧视、排斥干部起来造反的论调都是错误的，必须痛加驳斥。

对《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林彪同志：

可以登报并广播，军队同志就看到了，不必再印发。如你同意，请退文革小组^{〔2〕}。

毛 泽 东

二月二十七日十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林彪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转报陈伯达、王力、关锋二月二十五日送审的张日清文章《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上。这篇文章说：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伟大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无产阶级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边，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人民解放军责无旁贷的神圣义务。山

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实行了革命群众组织、革命领导干部和人民解放军的“三结合”。在联合夺权的斗争中，人民解放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坚决支持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着重抓三方面的工作：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抓革命，促生产；帮助革命群众组织整风。陈伯达、王力、关锋在给林彪的送审报告中说：“这篇文章，是《红旗》杂志约张日清同志写的。我们认为很好，拟最近发表，并想建议军委把此文印发军级干部会议各同志参考。”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和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王力、关锋，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张日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2〕 文革小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简称。

对《北京政法公社在天津小站公社 支持了谁?》的材料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

毛 泽 东

二月二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编印的《快报》第一三三二号刊登的《北京政法公社在天津小站公社支持了谁?》的材料上。材料说：一月二十六日，北京政法公社燎原长征队在天津小站公社坨子地大队，支持以“四清”运动中下台干部为背景的燎原红色战斗队抢走大队的大印，从此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实行反攻倒算。二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在把这期《快报》报送毛泽东时写道：“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革命群众要记者给主席反映情况。现在把材料送上，请顺便一阅。”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在沈阳军区《组织机关干部 到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情况 简报》上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

林彪、恩来^{〔2〕}同志：

此件可印发军级会议^{〔3〕}各同志。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沈阳军区派遣大批人员进厂做宣传和做调查的办法是很好的。二十七军在无锡，五十四军在重庆，二十三军在伊春、苇河^{〔4〕}等处也有好的经验。总之，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毛 泽 东

三月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给中共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小组并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等的《组织机关干部到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情况简报》上。简报说：沈阳军区领导机关及驻沈各军事机关，于二月下旬共抽调七百八十名

干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沈阳市一百二十二个大中型工厂和部分大专院校，运用有线广播、口头讲解等办法，反复宣传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十六条”、“工业十条”、“八项命令”以及中央、军委的其他有关通知、指示，党的政策一经讲清后，部分工厂由于少数人闹事而产生的不正常现象，逐步得到纠正，生产普遍上升，武斗基本制止。“十六条”，指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工业十条”，指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八项命令”，指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发出的《中央军委命令》。

〔2〕 恩来，即周恩来。

〔3〕 军级会议，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二十五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干部会议。

〔4〕 苇河，今属黑龙江尚志市。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论革命的“三结合”》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

林彪同志阅后，退文革小组^{〔2〕}。

毛 泽 东

三月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根据《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
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陈伯达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送审王力和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稿《论革命的“三结合”》上的批语。陈伯达在送审报告上写道：“革命的三结合方针和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得到广大群众拥护。同时，有些人也在利用这个问题，搞复辟活动。针对这种情况，王力、关锋同志拟了一篇社论，阐说主席的革命三结合方针，以便引起注意。”本篇二是毛泽东在这篇社论稿中加写的一段文字。这篇社论，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人民日报》三月十日提前转载。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王力、关锋，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2〕文革小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简称。

在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 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 的报告上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2〕}各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毛 泽 东

三月七日

根据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人民日报》
刊印。（有手稿）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警备区司令员郑三生等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关于天津市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给北京军区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报告上。报告说：天津市延安初级中学在部队进校前，到校人数很少，组织多而乱，有武斗现象。经过一个月的军政训练，改变了面貌，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大联合，建立了“三结合”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整顿、巩固和发展了红卫兵组织。三月一日复课后，掀起了抓革命、促教学的新高潮。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批语和这个报告印发给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并拟题为《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指示》。因这个批语写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因此又简称为“三七指示”。

〔2〕 恩来，即周恩来。文革小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简称。

关于转发渡口驻军支左 经验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1〕}：

此件^{〔2〕}似可转发全国全军，参照执行。请酌处。

毛 泽 东

三月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 恩来，即周恩来。文革小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简称。

〔2〕 此件，指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党委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转发的四川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关于“首要的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的经验报告。报告说：以铁五师为主组成的支左部队来到渡口后，把支持左派的工作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下功夫到群众斗争中去识别真正的左派。在对左派的支持上，又坚持首先从政治思想上帮助他们成长壮大。具体做法是：（一）帮助他们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二）帮助他们抓好活思想，做好团结教育工作，使之成为思想统一的有战斗力的集体。（三）帮助他们保持清

醒头脑，坚持斗争大方向。铁道兵党委在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首先要从政治上支持，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法。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批语、渡口驻军的经验报告和铁道兵党委的批语转发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并在转发的指示中指出：“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很重要的问题，并且创造了很好的经验”，“是值得全国全军学习的，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都应参照执行”。

对贵州省军区支援左派 工作经验材料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戚本禹^{〔2〕}同志：

此件看过，不错。但有些问题写得不具体，例如第一个问题没有举例，究竟怎样解决的，看不明白。是否请他们写一个较具体的可供发表的报导送来，请酌处。

毛 泽 东

三月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全军文化革命小组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十七号刊登的《贵州省军区关于怎样做好支援左派工作的经验》材料上。材料说：贵州省军区党委在二月一日至三日召开有各师、军分区主要领导和军区机关处以上干部参加的座谈会，在讨论怎样搞好支援左派工作时，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一）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中央的决定已经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实行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这就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过去由于认识不清，

所以一接触实际，就迷失了方向。（二）善于发现左派是我们采取支持行动的前提。具体方法是：善于通过分析各派的特点来发现左派；注意从各派与上面的联系来发现左派；到群众中去，倾听各方面意见，防止片面性。（三）克服“怕”字，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广大群众夺权。

〔2〕戚本禹，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 建立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三月）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1〕}

根据《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
第五期刊印。

注 释

〔1〕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的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中，在“毛主席提出”后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文字。三月十日，《人民日报》提前转载《红旗》杂志这篇社论，并以语录形式发表了毛泽东的这段文字。

对北京市夺权筹备工作 请示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

总理：

工人代表大会还没有开，中学和农民的代表大会还无消息。开全市代表大会并选举革委会，似以在三月下旬为宜，请与谢富治同志酌处。^{〔2〕}

毛 泽 东

三月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总理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报送的谢富治、郑维山、傅崇碧三月五日给毛泽东、林彪等的《关于北京市夺权筹备工作的报告》上。报告说：中央文革指示我们几个人负责筹备北京市的夺权工作。经过一个月的酝酿协商，准备在最近成立九十多人的临时权力机构——北京市临时革命委员会。如主席、中央同意，我们拟在本周召开会议，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郑维山，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当时任中

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2〕根据毛泽东的批语，北京市先后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革命职工代表会和中学红卫兵代表会后，于四月二十日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谢富治任主任，吴德、郑维山、傅崇碧、聂元梓任副主任。

关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 程序问题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

各省、市亦宜照此〔1〕办理。凡条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条件成熟，然后举行。处于无政府状态者，则先实行军管。

毛 泽 东

三月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指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关于毛泽东三月九日对成立革命委员会程序问题的指示落实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昨夜得到主席关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前要先开工人、农民、中学生代表会或群众大会的指示，我已告谢富治并给常委和文革小组各同志传阅，他们都很赞成。今早，我照此方针，以电话告天津解学恭，要他考虑先开大学、中学、工人、农民、机关革命派代表会议，然后再开全市革命组织协商会议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程序。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解学恭，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给章士钊的信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

行严^{〔1〕}先生：

惠书敬悉^{〔2〕}。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3〕}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

毛 泽 东

三月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行严，即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 章士钊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部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作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

〔3〕 个别人，指刘少奇。

关于推迟成立天津市 革命委员会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三月）

以推迟到三月下旬成立，照总理十日意见^{〔2〕}办理为宜。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报告说：天津市革命学生组织多已趋向联合，五日已开红代会会议。工人革命组织已按口分系统组织，多已组成，达十七万人。中学生革命组织较差。在本周内，他们拟开各方协商会议，商定革委会及其常委会名单。群众大会预定十二日开，在会上宣布成立天津市临时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并发表宣言等。

〔2〕总理十日意见，指周恩来总理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关于毛泽东三月九日对成立革命委员会程序问题的指示落实情况的报告。参见本册第511页注〔1〕。

对中央转发北京卫戍区 对一些厂矿实行军事管制的 布告指示稿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送审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一九六七年三月关于对一些厂矿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的报告和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个布告的指示稿上的批语。布告的主要内容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奉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对×××厂（矿）实行军事管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组成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一）军事管制委员会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首先要从政治思想上支持。也就是要帮助他们认真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掌握党的政策，使他们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壮大，依靠革命群众自己的力量，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二）厂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生产和业务工作，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应当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中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批转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命令的通知和中央有关的政策规定。

（三）厂矿全体人员，必须坚守岗位，积极生产，努力工作，遵守劳动纪律，服从上级指挥。建立革命秩序，严格出入制度。（四）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强调摆事实，讲道理，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五）坚决响应毛主席提出的“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减少脱产人员，反对铺张浪费。坚决同经济主义进行斗争，坚决同破坏国家财产的行为进行斗争。（六）为了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提倡厂矿内革命群众组织，逐步做到按生产系统和行政单位编组。（七）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在本单位或本市内进行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必须在业余时间进行。任何革命组织联合厂矿外革命组织召开大会，必须经过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八）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成立筹备组织，推动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九）厂矿一切外出长期不归的人员，限一个月内回到本单位，如在规定时间内仍不回厂矿者，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十）厂矿全体革命同志必须提高警惕，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加强安全保卫工作，不许地、富、反、坏、右分子乱说乱动。对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破坏国家财产、破坏生产的人，要依法惩处。（十一）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人员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从事生产，从事群众工作，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加强调查研究，发扬民主作风，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并参加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十二）厂矿全体革命同志，

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破“私”字，大立“公”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厂矿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三月十五日，周恩来将北京卫戍区的这个布告报送毛泽东、林彪时写道：“这一文件经过北京卫戍区起草、文革小组同志修改，并在今晚钓鱼台碰头会上修改通过。现在送上请予审阅，并请主席批准。在批准后，并拟发给全国参考。”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级党委，各军区、军分区党委，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的指示说：“现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起草并经中央批准的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转发你们参照执行。这种布告不登报，不在全市广播，只在有关厂矿张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卫戍区的这个布告。

对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职工、干部的信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送审的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职工、干部的信上的批语。信中要求：全国厂矿企业职工、干部应该巩固劳动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和文化大革命的良好秩序；应该按照党中央的规定，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在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坚持文化革命，不许在生产时间内，擅自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要同一些无故旷工、敷衍了事的不良现象作斗争；应该按照党中央的规定，在文化革命中，促进自己的思想革命化，多快好省地进行生产，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产品的高质量，要同一些不顾质量、浪费国家资材的不良现象作斗争。信中指出：一切厂矿职工，都必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研究精兵简政的经验。既要大大减少脱离生产的人员，又要大大提高工作的效率。要注意节约闹革命。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一切厂矿职工，都必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提高国家主人翁的伟大责任感，好好保护国家财产。如有破坏国家财产的人，必须按照国家的法律严格惩办。党中央号召，一切在厂矿中工作的革命干部，应该带头做好各项工作，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和国家建设计划，尽最大的努力。党中央相信，一切厂矿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应该严格进行自我批评，应该在文化大革命中，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当好群众的小学生，在工作中改造自己，将功补过。犯过错误的干部只要这样做，工人群众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对他们的批评，要采取毛主席历来指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混进厂矿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绝对不许乱说乱动，破坏生产，破坏职工之间的团结，制造和挑动派别纠纷。对他们的处理，可以根据他们的政治立场、劳动态度和厂矿的具体情况，分别对待。党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大力协助地方，支持工业生产工作，你们应该很好地同人民解放军的同志合作。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这封信，要求在一切实厂矿和基本建设单位中宣读和张贴。

对《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 严重混乱》材料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

林彪、恩来^{〔1〕}同志：

此件^{〔2〕}请阅。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切好的铁路局，也应派出军代表，吸取那里的好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此事请研究酌处为盼！

毛 泽 东

三月十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
铅印件刊印。

注 释

〔1〕 恩来，即周恩来。

〔2〕 此件，指派往齐齐哈尔记者写的《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的材料。材料说：齐齐哈尔铁路局管辖线路阻塞现象严重，每天都接到全国各地发来大批请求运送物资的告急书。要满足这些需要，每天必须运出五千一百多个车皮，而目前他们每天只

能装运一千七百至一千八百个。外地运来的物资，每天也有二百多个车皮卸不下来。铁路局的事故大大增加，到三月十五日，已发生行车事故三百二十六起，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十。这样短的时间内，事故之多，损失之重，是该局历史上罕见的。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一）纪律涣散，不听指挥，职工可以随便不到职、不出勤。（二）派别多（全局二百多个组织），不但增加了脱产人员，而且经常争论，影响工作。（三）有些人强调破框框，而把一些必须执行的规章制度随便破除了。例如，废除了接发列车中的扳道、信号、检查线路等规定。（四）领导干部“怕”字当头，放弃领导。罢官的干部靠边站后不管事了，没有罢官的干部不敢管事，结果造成指挥系统长期瘫痪。三月十八日，该局军代表介入文化大革命，成立了“三结合”的抓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并计划在各分局也成立指挥部，代替长期瘫痪的领导机构。但全局军代表只有四十多人，困难仍很大，他们迫切希望驻军派更多的干部去加强领导。

对中央《关于停止全国 大串连的通知》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上的批语。通知指出：目前各地各单位正集中力量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同时在外串连的学生、群众刚刚返回，本地本单位斗、批、改的任务很繁重，因此中央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今年春暖后大串连的计划，望向学生和群众妥为解释。周恩来在送审这个通知时附信说：“为争取早一点发表，特以传阅件送上，请予审批。”同日，毛泽东批示后，中共中央发出这个通知。

对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 国防科研机构等问题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

退总理照办。

毛 泽 东

三月二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总理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关于对国防工业部门和国防科研院、所实行军管的报告上。周恩来在报告中说：对国防工业各部门的研究院、所和科学院所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拟同意聂荣臻同志意见（见附件），交国防科委实行军管。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亦实行军管，其办法如对国防工业各部。聂荣臻三月十一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说：据了解，现在国防工业各部的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许多单位领导瘫痪，研究工作陷于停顿，三线建设也存在许多问题。这种情况必须迅速予以改变。建议对这些单位实行军事接管，接管工作由国防科委组织进行。按照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的精神，迅

速恢复科研和生产工作。接管后，将遇到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强烈提出的改变现行领导体制的问题，建议一面恢复生产，一面即着手将国防工业部门及中国科学院的有关国防科研机构，结合批改，通盘考虑，进行一次全面的适当的调整和改组。报告中还提出了调整改组的五条原则：（一）把直接进行武器装备研究设计及其紧密配套的科研单位，划入军队序列。在现有基础上，合理调整，合并重复部分，弥补空白环节。（二）为保证这些武器装备研究院实验试制的需要，必须配备一套必要的实验试制工厂或车间。除各院原有者外，必要时，从工业部门调整少数小型工厂或车间，划归这些研究院领导。（三）抽出一定力量，加强和充实国防工业部门的研究设计工作。（四）属于接管单位的三线建设，由于问题较复杂、牵涉面广，拟与国防工业各部及有关部门专门商量解决。（五）进一步健全各军兵种的科研机构，以便加强武器装备的发展方向、战术技术论证、使用维修等研究，以及指导部队装备的技术革新工作。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18

1965.2

1967.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欢迎关注中央文献出版社官方网站及微信公众号

网址: <http://www.zywxpress.com>

微信公众号: zywx5073

ISBN 978-7-5073-4985-6



9 787507 349856 >

定价: 1500.00元 (全二十册)